

运河惊蛰

说几句话吧

——序《运河惊蛰》

文军

想说的话太多，要说的话太多，但无法上会上桌，不能见诸报刊，不能现身荧屏，不许诉诸讲台，不准串联交流，甚至连想和说的性格脾气也不让有；所以，只能闷在肚子里，憋在肚子里，烂在肚子里，死在肚子里了。是否因此而不得不得癌症，不得不全部切除胃和脾脏，可能还要切除肝胆，成为无肝无胆没有脾气胃口的躯壳，尽早结束这条叫人头疼的生命，世事太平。其实，我并非这一个。这世界，这人类社会，五千年来，一万年来，甚或是几十万几百万年以来，憋死闷死的何只一两个万亿个，而是无数无数，永远也无法统计，测算不清。虽然人们并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要奈何，就只有战到阶级消灭、政党消亡、国家消失的共产主义明天了。

现在，有此小小的机会，他们要我说几句话，我也就想说几句；也只能把想说要说不说不敢说而又不得不说的许许多多，道说几句，眼泪一样欲滴而不能滴出，更无法溢流地含在晶体之周，饱受苦痛的折磨。

真理是朴素的，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共产党、真假社会主义、真假政治路线，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说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与两个阶级的斗争，或者说是革命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等等，等等，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多数

和少数的关系，就是对待工农兵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的态度。因为直接创造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群众，永远是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永远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动力，永远是真正的英雄。

那么，以这个基点、基石、基线、基数为基准，或圆心和原点，当做一切出发点、立脚点、思维、观念、屁股和态度，就会十分清楚泾渭分明。回顾十七年、三十年、五十年，毛泽东生前或者死后，一切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或者是群众运动的焦点，无不是在这个多数和少数的分歧之中。毛泽东始终如一地考虑着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的根本利益、全人类都解放的根本利益（并非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最广大和人民的内涵颇为蹊跷）。而他的对立面和反对者，总是在寻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和根据，搬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借口，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把事情闹得复杂曲折而又幽深混浊，不得不改弦易辙变更初衷，而后又把责任推在他的头上，从而改变阵线，易换方向道路。包括庐山会议、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等等。然而，不少善良的人们，却喜欢听信谎言蜜语、鸣冤叫屈，倾心于恻隐和同情；或者为了自己和小圈子的眼前利益，评头品足、指手画脚或愤愤不平，反而造成好事劣果，好心恶报，出乎所料。文革亦然了。

由此而推及对待群众运动的立场观点和认识与态度，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布的1927年3月到而今，几近八十年来，“糟的很”和“好的很”、“痞子运动”和“革命先锋”的矛盾斗争；反对否定泼冷水、或镇压绞杀无所不能，积极热情鼓励支持或引导帮助欢呼促成；

运动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是指责诽谤污蔑嘲弄或幸灾乐祸，还是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更进一步；是看其方向和主流，还是抓住把柄以偏概全彻底否定；是熄灭泄气打掉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还是保护鼓励发扬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由此也推及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是用积极分析的方法和路线斗争的观点，看其本质关键核心主流，看其主要方面呢，还是以个人恩怨人品德行而不管方向路线正确与否，且以次要方面为其好坏的标准。人品人性和个人的道德行为，不能代替阶级共性和信仰追求，更不能决定其路线正确与否。任何个人，包括最反动最恶毒和最污浊的坏家伙，有时候在某些地方或某个人身上都会做出一点好事情。就是汪精卫、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等身上，也不会一无是处。林彪更是战功赫赫打遍多半个中国的常胜将军。反过来，有多少战犯都曾屠杀过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但最终却成为人民的功臣或公仆。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不是么？

共产党区别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之一，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农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和功劳，就是证明，史不可没。可是，害怕群众，遏制群众，管理群众，甚或镇压群众，算什么共产党呢？而今八亿农民的种种表现和佐证，同样历历在目，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了吗？为何？

共产党是造反起家的。反对和仇恨造反派，镇压和扼杀一切造反思想和行动，算什么共产党呢？入党誓言是不惜牺牲一切个人利益，要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生，以至生命。然而当自己造反成功

掌权以后，却为什么不再艰苦奋斗勇于牺牲，不再继续革命立新功，而要吃老本图安逸求稳定享太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护自己特权阶层的特殊地位，反过来敌视造反派，甚至拥护党内走资派和党内的资产阶级，绝对不愿把权利交给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而且还要反对自己紧跟并膜拜过的毛泽东，敌视自己依靠过的人民群众。死后还要争得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难道这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么？

宰相肚里能撑船。封建君臣尚且如此大度和宽容。然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对于造过自己反的革命群众，或者是批斗过自己的造反派，竟恨之入骨要秋后算帐并置之死地而后才快活。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就是这样耿耿于一己之利的一箭之仇么？不少人都在控诉和诽谤一切群众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平反的受屈者据说有40万左右。且不说谁在主持操作这个运动，完全有悖于毛主席的初衷和苦心；且不说历次运动中，真正受害的群众有多少，他们没有话语权和申诉能力，无人过问无法平反，好似被无形的皇土给活埋了。就只说这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受害的革命群众何止几十万几百万，恐怕要用千万甚至近乎亿的数字了。当真史无前例，大概是空前绝后。我相信而后的历史，不会再有这样的惨剧发生了，恐怕再也无人敢于那么干了。更为可悲的是，那几千万惨遭镇压的革命群众，也包括各行各业大大小小遍布全国凡有人烟的各个角落的造反派头头，怕都是党和国家民族的真正的骨干栋梁先锋和精英，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精英，有无限创造力的精英，推动历史前进的精英，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

精英。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无论那一派的大小头头，都是其所在范围群众选择的代表人物，因此而能在没有任何国家机器和权力工具的情况下，却能够一呼百应千应万应千百万应。历史上统治阶级，哪一个政权和权力或权威，能有这样深入广大的群众基础。可是在文革以后，几乎全被处死逼死“活埋”了。谁为他们伸冤鸣屈，谁为他们平反哭诉。他们自己，也不会哭诉，反而甘于牺牲。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革命的必需。那些哭哭啼啼者，只不过是自私鬼懦夫或者是叛徒和软骨症患者，没出息没血性。那些恻隐和同情之心，也实在是太可怜而又太可悲了。为什么不为成千上亿的受害者哭诉，不为那些没有话语权也没有申诉能力或不愿哭诉的最大多数哭诉，而只为个别和少数权贵们哭诉得没完没了。这难道不是历史的一大悲剧，反而还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么？太不清醒也太可笑。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问话时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和探索，亲自领导和发动了许多次群众运动，皆因党内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的破坏干扰，改弦易辙，收效很少。但终于找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大民主的方法，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明确了大方向大目标——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方向这个方法这种战略这种形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全世界；不仅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

命，而且适用于受压迫受剥削受侵略受凌辱的一切地域和民族；不仅适用于今天而且适用于以后以至无穷。特别是在现代高科技和剥削压迫更隐晦更残酷的条件之下，这种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的群众运动，最灵验也最适用，一切统治手段和工具都会失效。这才是毛泽东真正的伟大之处，这才是对马列主义的真正发展和创造，这才是中国共产党光荣伟大和正确的铭碑，永远竖立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然而不料，反对最烈的，恰是他的同辈和风雨同舟的战友。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意丧失特权，只想求稳求安求福求荣，甚至自觉与不自觉地走到劳动人民群众的反面，变成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或其同路人了。有的打根子就是混进来钻进来和打进来楔进来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和反革命。他们似乎得逞了，情不自禁地自我表白胜利了。甚至疯狂地连“四大”也处死了。大鸣大放几乎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大字报大辩论从几十万几百万年前的摩崖石刻和壁画，直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历代文人骚客的庙堂题书和对歌吟咏；这文明古国的一大风景，都被他们肃杀了。又是一个空前绝后。难道这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干的事情么？这还有社会主义民主一丝一毫的味道和颜色么？这样如何跳出周期律，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呵！社会主义政权和事业，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任何小机构小范围的监督，都可能进入交易所。

这样残杀民主的结果，一切都由个人负责，一把手说了算数。一把手的权力，比垄断资本更加垄断过头（任何托拉斯都不可能全地域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地垄断），比一切法西斯官僚都霸道。因此而合

理合法随心所欲地创造和运用承包、双轨、冠名、招标、股份、集团、关停并转、倒闭破产拍卖收购、下岗、分流等去吃喝嫖赌、周游列国、贪污腐败、投机钻营、内外勾结、官商同谋、公私一体、划拨转手、招商引资空手道、假洋鬼子座上客、呆帐坏帐死帐无数、携款潜逃海外定居……等等等等，枚不胜数，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涉及和创造的种种词语和掠夺法术，都与时俱进地出新了。名为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实为空前绝后的窃国大盗，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几十亿人民血汗的长江黄河，不费吹灰之力平平安安地引流到官僚买办和垄断资本的大海里去了，留下的只能是基础设施的高楼驱壳和人亡政息的恶果，木乃伊似的仿制“文物”。

血淋淋的现实和客观存在的历史悲剧，天天在演出，处处在演出，谁能否定得了，谁能一手遮天，掩盖得住。苏东不就是铁证。

毛泽东 1939 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过：“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主要的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应该说毛泽东的伟大过人之处就是把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动员起来了，所以才打败了日寇，消灭了 800 万蒋匪军，并且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也打败了美帝及其十六个联合国军的喽罗。但是，在进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真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仍然需要继续动员群众。好容易，他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

把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劳动人民群众又动员起来了，但却被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以党的名义和威信打下去了。

有人在疯狂叫嚣，共产主义消灭了；有人在低头忧虑，社会主义完蛋了，文化革命失败了；有人要总结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以及文化革命失败的教训，创造新的理论，寻找新的出路。错了，全错了。低潮是高潮的前奏，波谷是波峰的先兆，必然和必须的过程和节奏。何况且“失败是成功之母。”何况且并非什么失败，而是实验实践和演习的正常步骤。即就是失败，原因也还是老话，敌人太强，我们太弱。请想一想，几千年剥削阶级私有制的统治，制造和灌输着剥削阶级私有制的舆论，进行剥削有理有功的教育和洗脑运动，跟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动员，纵横差别力量对比多么悬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私有观念的根深蒂固，跟消灭两个决裂三大差别的公有制观念，纵横差别力量对比多么悬殊。一次革命一挥而就一劳永逸一举永恒，这不是盲目狂热地在做梦吗？

毋庸讳言，时时处处都能听到有人抱怨咒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请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坏就坏在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打着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利用党和社会主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干尽了败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坏事，企盼人亡政息，摇身一变而成为官僚买办和垄断资本，作威作福独裁霸道。苏东诸国不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铁证事例和典型么。全然并非御用文痞们谎造的种种理论和原由。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反复讲过：“革

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有人演绎地说：现在，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就看其对待毛泽东和文化革命的态度。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实际上两个方面是一回事，反对文化大革命，实在说就是在反对毛泽东。如果在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过不了关，那么，不论其当年有过多大的功劳，而今，彻底否定死不悔改顽固不化的反对者，可以说就是现时代的反革命。他们不只反文革，同时也反对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将军当兵和城市居民返乡劳动等等。一句话，他们就是在反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优越环境，不愿意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只能享受高高在上优厚优越于民而或是压迫老百姓的特殊生活。什么资源共享公平竞争、同一起跑线上的平等待遇等等等等，全是骗人的鬼花招。试问，他们天马行空走南闯北、飞来飞去车水马龙，上重点学校，出国深造，超出工人千百万倍的股份和高薪高酬，以及额外享受的吃拿关卡奖金回扣，等等等等，哪一个普通农民和百姓能够分享得到。这难道不是变相的剥削和掠夺么？剥夺和享受着全民全人类共有的资源和自由，特殊而又独厚，并非得天而是孤自厚得于特权和特殊。这一切，难道能说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么？少数优越而多数吃苦。

几近八十年前，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就说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的问题。”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战争年代，战壕和阵线的对垒比较分明。然而如今，在和平时期，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肆虐的时代，并不那么分明，而且十分杂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常人很难分辨清楚。特别是在文化革命这样十亿人民如火如荼的决战之中，是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里已根深叶茂，尚在无比崇高的威望和信仰之际，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面目，尚未真正暴露而仍在台上的时候，更加难以分辨清楚。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复杂的局面和奇怪的反复，常人更难捉摸。加之几千年来的陈腐观念和世俗劣风，不强调阶级和路线觉悟，老是习惯于依附神仙皇帝救世主，依附于主子而甘为奴仆，所以就经常出现跟人而不是跟路线跟政策跟道路，出现了上贼船跟错人的现象，所谓站队站错的情形，不得不反戈倒戈重新排队，好气而又好笑。直到而今，甚至以后，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这敌我友的首要问题才能逐渐清楚。所以继续革命的问题要想解决，还要唤起民众，还要动员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再度起来，重新革命，还有一段艰难的路子要走。

由此推及荧屏上那些造反派头头的形象，实在可笑。他们究竟是哪个造反派、什么造反派，就连作者和编导演员自己也不清楚。反正不是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造反派头头，绝对不是；很可能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以及叛徒特务内奸工贼们怂恿和教唆的假头头，帮凶走卒和打手，目的是为了破坏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不幸，难道不就是他们这些假造反派和真走卒真帮凶造成的么。

由此推及许许多多的理论专著和文艺作品，几乎全是以剥削阶级

内部狗咬狗的争权夺利之观念去看待和论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革命；几乎完全没有摆脱阶级社会所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框架轮廓和范畴，远比诗经离骚屈原杜甫和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要倒退低劣几千几万倍。他们根本不懂也根本没有所有制彻底变革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没有这两种截然不同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之心性，他们太顽固太落后也太反动，还涉谈什么创新发展和进步、史诗精品和主旋律。

由此推及一些所谓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包括十分走红的经济学家，他们一切都要问鼎西方，学习美国，和人家接轨，惟洋经为先贤至圣；他们拾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烂，充当珠宝，要来改革和改造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切，太愚蠢也太浮躁了；他们总想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一举成名；他们不爱不会也不可能用劳动创造研制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也不懂得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洋化美容中毒太深，反成人鬼不分的四不象了；因为他们不但不革命而且还要反革命。

真理是朴素的，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连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阶级关系都搞不清楚，连敌我友也分辨不出来，连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摸不着头绪的糊涂虫，还涉谈什么改革开放的这个那个。

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一切封资修的政党根本不同，工人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私有制根本不同；用私有制的观念私有制的信徒身份，去学习一切发达的私有制圣经，拿来建设和改造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非笑料。这么简

单朴素的常识和道理都不懂得，还奢谈什么经典论述，谎报什么专家权威名流。害国害党害民为何？

出息只有一条，与工农相结合，发现发明和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理论新制度新事物（当然，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的一切，勇猛前进，踏出一条史无前例的新道路。

想说的话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不能再说也无须再说下去。我相信有人会替我再说下去，就象这本书的作者一样永远再说下去，更多更广更深更新地说下去，就像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那样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地再说下去。因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讲说研究开掘探测的矿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争论”只不过是一时一地荒谬绝伦独裁霸道的恶行，人类不会退回到猿猴时代，生命不会窒息，地球不会停止转动，太阳和宇宙不会无光无热，鸟儿会叫，花木也呼啸；真理愈辩愈明。害怕也无用，狠毒也无用，一切都会死亡，惟“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签证”（居里）；“真理无所谓时效”（贝尔）；“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孩子”（布莱希特）；“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布鲁诺）；“只要你追求真理，真理就会在你胸中燃烧”（河源崎长十郎）；惟真理的光芒，永恒！永恒！

我就是像布鲁诺那样，哪怕被绞死烧死，也感到欣慰和光荣。

2003年7月1日

第一部分 初战告捷

楔子

从北向南的京杭大运河与黄河交汇后折向东南，蜿蜒数百里，穿微山湖而过，流经山东省运河地区，形成南首北尾的一条巨大水龙。运河两岸肥田沃土，生活着八百万运河儿女。运河城自古是座繁华的水旱码头，历来有“小苏州”之称，曾经有“万商往来，四海绵历”，“舟车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盛况。

就是这片繁华之地，几经历史沧桑。封建王朝的盘剥，军阀混战的苦难，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敲骨吸髓，到了1948年解放前夕，已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了劳苦群众的地狱。

运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运河人民从来不屈服于外国的侵略，不甘心做历朝历代血腥统治的奴隶，他们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奴役的革命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追求平等公正，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的理想之火一天也没有熄灭过。

春雷一声震天响，1948年7月14日，运河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古老的商埠之地焕发了青春，运河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革命的征途并不平坦，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曲折复杂。“中国向何处去”？“运河向何处去？”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建构起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还是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象巴黎公社昭示的那样，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最终达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运河地区和全中国各地一样，面临着生死抉择。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不光是救民于水火之中获得第一次解放的大救星，还是带领广大劳动人民，披荆斩棘，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迅跑，坚定不移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向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让人们获得彻底解放的大救星。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条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断影响运河地区和全国各地前进的步伐，不断在运河地区和全国各地寻找它的代理人，并时时窥测方向，施展取代毛主席革命路线、最终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这样说已不是危言耸听，铁的事实，已证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恶已经得逞。下面再以有“水旱码头”之称、解放后小企业比较发达的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社队企业的巨变，看看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多么激烈，资本主义复辟多么严重。

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运河地区开始兴办社队企业。1958—1962四年间，企业个数达到643个，产值656.3万元，1963—1965年进行调整和巩固，企业个数为325个，产值530万元，1966—1978年，社队企业大发展，规模扩大，产值增高，形成“计划、有序、快速”的局面，社队企业321个，产值达到8,448万元。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运河地区人民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多次斗争，社队企业得到健康发展。运河地区社队企业二十年，是遵循毛主席“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巩固集体经济，从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从半社会主义性质逐步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经济过

度的一系列方针指引下发展壮大的，是兼顾了“集体、个人、国家”三者利益的。运河地区社队企业不光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依靠自身优势进行发展壮大，而且把一些办得好的企业交给国家，为国家的工业企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再看 1978 年到 1988 年这十年的情况，企业个数猛增到 116725 个，总产值是 40.5 亿元。光看表面数字，确实成绩巨大（人民币贬值，1988 年的 10 元人民币只相当于毛泽东时代的 1 元人民币）。但这 116725 个改名为乡镇企业的运河地区社队企业，已全部归承包人管理经营，40.5 亿元的产值已大部分入了承包人的腰包，同时由于向市场经济过渡，“产，供，销”无序发展，国家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自然环境受到极其严重的污染。“自由竞争”的结果，把不少国有企业挤垮，甚至出现了“小吃大”的现象。如果再看看 1988 年以后的发展情况，那更是触目惊心：全运河地区社队企业已荡然无存，原有的社队企业已全部转为私人企业，广大农民已成了私人企业主任任意宰割的奴隶，农村干部已拜倒在私人企业主金钱的石榴裙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私人企业主看家护院的走狗。

严酷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使运河地区人民更加怀念毛主席，更加怀念“以整党内走资派为斗争大方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国革命人民，在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复辟活动实在忍耐不住，在洞察了复辟危险不可避免之后，开展的一场阶级大搏斗。1968 年 10 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

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言犹在耳的教导，虽然没能最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愈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愈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真理的光辉。“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首悲歌，亿万人民掀起的横扫“封、资、修”千军的狂飙，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丰碑，向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敲响了丧钟。

1871年5月，巴黎公社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巴黎公社战士的呐喊还在人类太空回荡，马克思就发出了科学预言：“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把马克思的话用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人们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绩，盛赞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人民群众的观点是检验真假革命的试金石。毛主席说：“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所以是真正的革命就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代表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不论怎样乔装打扮，怎样花言巧语，在群众观点上都是言行不一的骗子，其实质都是代表剥削阶级，代表资产阶级。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文化大革命才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以致三十年过去了，运河地区的人民群众还津津乐道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景。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最根本的是由人民群众直接当家作主。早在 1958 年，毛主席在读苏联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章节时，便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无产阶级大民主，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来自社会最低层的工农兵积极分子，不拘一格地提拔到直至党中央、国务院等党政军企的各级领导岗位，开始了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伟大尝试。这段铁打铜铸般的历史，经过时间长河的冲洗，更加熠熠生辉，记载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

任何群众运动都不会十全十美。大家喜欢把 20 世纪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作比较，这是不无道理的。毛主席说：“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这两次革命虽然相距 40 年，但都符合毛主席论述的规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就是革命。这两次都是政治大革命，都是阶级斗争，都是由先进的马列主义

者唤醒民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它们都有各自的对象：20年代是土豪劣绅，60年代是党内走资派。当然，这两次革命有着最大的不同：无产阶级是否掌握政权。正是由于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所以尽管都是革命，但采取的斗争策略和实行的政策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果混淆了这一点也会犯极大的错误。同样，对于革命的对立面也有着相似和不同。20年代革命的对立面——地主士绅，只要认清形势，站到农民协会一边，也会变成开明人士，甚至变成革命的一份子。60年代革命的对立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甚至党内走资派，只要听从毛主席的教导，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积极参加运动，也会变成“可以改悔的走资派”，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两次革命的曲折也有着惊人的类似：20年代的革命出现了“四·一二”、“马日事变”、“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六十年代的革命也出现了“二月逆流”、“林彪事件”、“10.6”政变等等。这样说也许有许多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会反对。那么对于反对者最好的回答就是重新理解当年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导：“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最有力的事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步修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改变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如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入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如何把独立自主的中国搭上国际资本主义列车，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这一切的一切，与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有何本质区别！

有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理解肤浅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这些老干部都是流血牺牲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为什么有的一夜之间就变成走资派，就被打倒？他们不是一直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吗？

对于第一个问号，可以作这种解释：①党内走资派决不是一夜之间变成的，而是较长时间的思想、路线等方面错误的积累，只不过以前不觉悟，不认识，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是有功之臣”罢了。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对敌人的“打倒”，并不同于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对敌人的“打倒”。③群众运动起来后会有“误伤”、“误打”现象出现，但很快予以纠正。

对于第二个问号的回答是比较麻烦的。建国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不少时候错误的东西也打着毛主席旗帜出现，实在让人难以区分哪些是紧跟毛主席哪些不是。这就需要加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加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毛主席一再号召“认真看书学习”的良苦用心也就在这里。可惜，不少老干部识字不多，理解马列主义的能力有限，只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搞革命，他们不愧是革命战争中的英雄和将帅，但对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想不通，有抵触，甚至变成对立面，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中的

不少人，只配当皇帝和大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公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预演，暴露的问题很多，无论是革命动力方面和革命对象方面都准备不足，都有惯性力在起作用，这也可能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终没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有人认为再纠缠文化大革命问题似乎没有必要，重要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须知，现在的斗争是十年反对苏修的斗争（1956-1965）和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继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形成于中苏十年论战，实践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之所以造反派敢起来造反，就是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唤醒，这正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是被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所唤醒一样。现在的斗争，还离不开这两个唤醒。

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的榜样，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引的道路，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那么，就让我们踏进运河地区，让时间回到 20 世纪六十年代，再重温一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

这本“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只依据事实，不写真人姓名，主要为了放开手脚，尽情阐述作者对这历史的看法，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认识。不能说全部都正确，只反映了现有的理解水平。祈盼得到读者的批评帮助。

第一部分 初战告捷

一、革命干部的思考

这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几排平房，一色青砖灰瓦，每排坐落在两行高大的白杨树之间，位于运河城区北部运河地委大院的西北角。从运河地委大门进去之后向左拐，再走 200 米就进入平房的小门。这一溜平房共有 3 个小门，显然是三个独立的小院。最西边一个的门开着，院子里有两个小孩玩耍。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经过太阳的融化，地上的雪已经不多，只有南墙根的阴凉处还是洁白一片，孩子们培起的雪人斑斑驳驳，面目全非，房脊瓦片上的雪水滴滴答答，流个不停。

这座院子的主人 A 是地委常委，1938 年参加工作，河南人，前两年刚从外地调任运河地区，至今还带有“中、中”的方言。此时他正坐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 1965 年 11 月 29 日《解放军报》上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他已看过多次，在今天上午的地委常委会议上他还建议，地委发个通知，让广大干部认真组织学习，但没获得通过。地委书记 B 说：“中央和省委没要求这样做，再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还不一定，尽管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登载，但编者按语的观点并不一致。”

回到家中，A 的心情老是不能平静，思想总停留在这篇文章上，特别被文章最后一部分所震撼：“《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 年，正是因为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

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裕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A 这几年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还抓了一个时期地委的宣传工作，对基层的阶级斗争有亲身体会。他总觉得一部分人，特别是地区和县里个别干部，对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不那么热烈响应，有时还因为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而发牢骚。相反，对搞“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总是大开绿灯。同时，对毛主席不那么尊重的小道消息也敢传播，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话也敢说，如什么“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彭德怀这个人真有骨气”等等。特别是对彭德怀的认识，A 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尽管听到把彭德怀比做海

瑞的议论感到不对，但又说不出所以然。为此，他翻阅了1958年以来毛主席的讲话和指示，重新学习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有关文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不讳的事实：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先给毛主席罗织罪名，欲逼毛主席下台，由他们上台执政，然后才有开展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

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不外乎这么几个问题：1. 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2. 北戴河会议搞了左的东西，3. 全民办工业的提法是错误的，4. 每个大协作区搞一个工业系统是办不到的，5. 1958年搞了极“左”，我们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以纠正，6. 三个月（1958年的7~9月）的影响很远，破坏很大，损失无法挽回，7. 以上错误人人有份，毛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路线错误，必须纠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犯路线错误时必须更换主要领导人——作者注），8. 毛主席个人独断专行，建立个人威信，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斯大林晚年问题”。甚至含沙射影地辱骂毛主席“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彭德怀等人的这些发言内容是会后断断续续传出来的，A当时听了就很气愤。现在结合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感到问题更加严重。首先，彭德怀等人为什么只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而且任意夸大，而不讲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明和成绩？这是不是个立场问题？是不是拉社会倒退，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其次，1958年七、八、九三个月出了问题为什么都向毛主席身上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庐山会议一开

始就发言：“去年（1958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做过检讨，要追究责任，要处分，都是应当的，我毫不推脱责任。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这种‘左’倾错误，问题都得到了彻底解决。”

彭德怀等人难道没有听到谭震林的发言，难道不能认真回顾一下这一年多的毛主席讲话和指示？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今年要抓紧，因为是群众运动，两个月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这是片面性。”这是大跃进一开始，毛主席就给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给某些有急躁情绪，甚至有“左”倾思想的人打的预防针。

当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时，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中共中央编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有可能给予澄清。”同时，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象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现在有一种偏向，好象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在10日的会议上又讲：“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

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讲道：“这里面（指1958年出现的问题——作者注）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毛主席第一个批评和制止“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思想，也第一个抓住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问题的实质——所有制，接着制定了“三级所有、队（生产小队）为基础”的正确方针。

显然，彭德怀等人既听到了谭震林的发言，也清楚毛主席以上讲话的精神。那么，为什么还要吹着尘土找裂缝呢？说穿了，就是不愿意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想让中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个体经济，发展资本主义，从而保护他们这些革命功臣的既得利益，保护他们的官僚特权，让他们去当人民大众的“海瑞”、“包青天”。当他们这个的罪恶企图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破坏了”，陷入无法实现的窘境时，就把怒火集中发泄到毛主席身上，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已达到“斯大林的晚年”，甚至丧心病狂地咒骂毛主席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A作了这番学习和分析，心中是亮堂了，但思想也更沉重了。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理解的愈深刻，愈感到中国共产党上层党内斗争太严峻了。他既有一种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去战斗的冲动，又觉得眼前一片迷茫，找不到攻击点，看不清革命的目标。以后几个月的发展，不光没能使他轻松，反而更陷入惶恐和不安。

二、革命风暴前的沉默

转眼一九六六年的春节过去了。这是一个祥和、愉快的春节，也是一个酝酿着暴风骤雨的春节。

去年，运河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是“社教”和“四清”运动的丰硕成果，也是全地区人民遵照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战天斗地得到的回报，同时，也显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巨大威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城乡联盟，工农联盟，各工厂都有自己包的村、包的点，进行支农工作，社队工业不光解决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工业建设。通过冬春农闲季节集中的政治学习，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干群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可以说，整个运河地区的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是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一意去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他们的愿望是进一步提高集体生产能力，使大家的生活都蒸蒸日上，从而不再走回头路，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占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领导地位，却不卖劲地为社会主义出力，反而拉倒车，走歪门邪道，糟踏、破坏集体经济，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听到苏联变修的消息是义愤填膺，他们看到报纸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无不拍手称快。他们已经自发地开展了对官僚特权行为的斗争，例如一位伙房工人斗运河一中校长的英勇行为已传颂了近四十年。那

是一九六五年底，运河一中校长徐培元，一个行政 13 级的干部，竟贪图便宜，拿了伙房集体的汤盆回自己家中使用。一次，徐的儿子拿着这个盆子到伙房买汤，被伙房工人李兆谦逮住。徐听说后大发雷霆，到伙房指着李兆谦的鼻子，说李不给他面子。李毫不示弱，说：“这是集体的东西，你为什么拿回家去？我就应该收回。”并质问徐：“你整天讲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徐培元恼羞成怒，竟胡说：“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党的领导，我就是党的领导！”围观的工人、师生发出嗤笑声，纷纷和徐辩论，有的说：“一个 13 级干部，每个月拿 140 多元的工资，还占公家的便宜，太自私了。”有的说：“官做大了，高高在上，好象公家的东西都是他的，工人就得什么都听他的。”最后徐在几个其他校领导的劝阻下，灰溜溜地离开，不过，临走还狠狠地说：“李兆谦，你总有一天犯到我手里！”徐培元不光说到，而且做到。不久就派人到伙房查帐，查李兆谦有无多吃多占行为，当然一无所获。文革中，李兆谦成了革命造反派，在徐培元整造反派时，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这个真实的故事，虽小，但折射出 1966 年前后的社会矛盾和两条路线斗争。

运河地区的三月，冰雪已经融化，小河的流水潺潺，向阳的小草已挣扎着冒出新芽，能够抵御寒冷的野菜开始破土生长。

就在这个乍寒乍暖的早春的一天，运河地委在地委礼堂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 B 主持，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批转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看来 B 的情绪今天特别好，连早衰的秃顶都泛着红光，口齿清晰，感情充沛，

边读文件边讲感慨，还对运河地区今后的工作做出部署。

当他读到“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时，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只是一出戏，有什么政治问题，要有不同意见，也是学术上的讨论，我们这里的同志千万不要跟着瞎起哄。”当他读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时，会场上有了小声议论，窃窃私语声逐渐变大，其中的一句飘到他的耳朵里：“这种提法对吗？毛主席可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啊！”B有些生气了：“不要议论！这是中央文件，难道还不如你高明！”当读到“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时，他又发感慨：“自从去年11月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就感到气味不对，象姚文元这样的人就有点学阀味道。他凭什么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他怎么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他的这两个反问，令一些县里来的干部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还从来没听到看到这种说法，我们的地委书记怎么就质问起来了呢？

最使B感到痛快，读的眉飞色舞、津津有味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对左派要进行整风”，“有领导”，“谨慎”，“慎重”，“经过领导机构批准”，等。最后，他代表地委提出了几条要求：“这是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可组织教育、文艺、科技、出版等部门认真学习和讨论”，“一定不许乱批乱上纲，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今后，不论任何人的言行都应该以《汇报提纲》的精神为准。”

其实，这时运河地区的革命群众和干部根本没有什么行动，只不

过学习学习报纸，在底下发表各种各样的议论罢了。就是这样，经过这次会，在 B 的影响下，一些党内走资派认为文化革命也不过这么回事，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口出狂言，以党自居，肆无忌惮的压制革命的思想，制造了暴风雨前的沉默。

须知，“听上级的，按文件办”，“要有领导，不许乱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培养奴性的话，这些滋生官僚主义的话，这些便于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话，与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是多么格格不入，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又是多么南辕北辙！

象地委常委 A 那样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积极探索姚文元文章的意义，努力理解当前运动的地委一级领导干部是多么少啊！其实，A 听完地委书记 B 的传达报告，心情倒平静下来了。因为他思考的问题太大太沉重，现在反而给了他不去思考，静观其变的时间。

三、与刘 、邓工作组的较量

一九六六年六月已进入火热的夏天。政治风云的突变，完全打破了旧秩序的安静，群众异常活跃，特别是青年学生，把自己的蓬勃朝气完全焕发出来。他们通过广播和报纸，每天都了解到新的消息：先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随后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批“三家村”，声讨黑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运河地委所在地的运河市（县级市）的各中等学校的师生首先沸腾了。

运河技工学校座落在市区南北大道的中部路西。南边不到 2 华里

是运河汽车站、火车站，北边仅一路之隔是运河市委，运河地委须由学校一直往北，大约三华里。这是一所运河地区的重点技校，有数百名来自各地的师生员工，学校规模很大，1958 年建校，包括实习用的工厂车间，学生全部在学校食宿。

张勤是该校 66 届毕业生。按照往年，这时应该进行毕业分配工作，因为今年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就留在学校参加运动。他今年 22 岁，属于年龄较大的学生，父亲是个忠心耿耿的老工人，所以自小养成许多良好的品质。由于比较内向，办事执著认真，爱思考问题，所以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许多独立见解，从而一大批同学经常围着他转，聂华就是其中一个。

这天，刚收听完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张勤和聂华等人情绪亢奋，立刻响应号召，也在学校行动起来。先写大字标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拥护聂元梓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反革命黑帮！”等等。然后，张勤动手写了一篇揭露运河技工学校领导压制师生搞文化大革命、定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开展运动以来不接触本校实际情况等内容的大字报，连夜抄写，立即贴出。

这下可捅了蚂蜂窝，全校师生争先恐后前去观看，有的还边看边抄；由于校门紧靠大路，有不少行人也到学校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大家议论纷纷。大多数学生认为写的很好：“这两个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都是学校领导搞的鬼！”“天天读文件，天天讲要听从领导，不许乱来，不让贴大字报，不许开批判会，这算搞什么文化革命运动？完全是运动群众，把我们当成了阿斗！”有些性急的学生，马上回去找

来笔墨纸，拎着糗糊桶，写出支持、响应的大标语。个别胆小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师只看不说，好象在心里激烈的斗争着。围看的群众说：“这些学生真大胆，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了！”“可能学校领导有问题，不然你看这些学生老师那么气愤。”运河技工学校的领导知道后又生气又害怕，马上叫人把大字报、大标语抄下来，并打电话报告给上级有关领导。

地委书记 B 是第二天上午听的汇报。他立刻感到事态严重：“党有党法，国有国法，怎么可以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乱来！”他指示有关人员及运河技校负责人：“一定不要使这股歪风蔓延，注意各学校的情况，监视领头闹事的学生，追查有无幕后指使者。”并特意把运河市委书记 D 叫到地委办公室，让他密切关注运河一中、二中的动态，因为这两个学校历史悠久，都有高中班，学生活动能力强，教师队伍复杂，最容易出事。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压不住的，因为有毛主席的号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及时传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

1966 年 6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吹响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更给广大革命师生鼓足了干劲。不光运河技工学校的革命火焰没被扑灭下去，越烧越旺，而且，运河师范动起来了，运河商校，运河农校也动起来了，尤其运河一中，运

河二中来势更加猛烈。各校领导人纷纷大喊：“怎么办？”运河市委、运河地委中以 D 和 B 为代表的想镇压师生革命行动的个人也乱了阵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相反，象运河地委常委 A 等人倒显得很兴奋，抽空就到各学校看看，听听汇报，认为应该支持革命师生的行动，学生的大字报很有道理。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地委书记 B 终于拿到了尚方宝剑：刘少奇、邓小平已下令派工作组进驻各院校各单位。他高兴得一夜没能好好休息，连夜召开会议，组织力量向运河地区管辖的学校派驻工作组，特别安排运河市委书记 D，要派得力干部领导运河一中、运河二中的文化革命工作。

A 这几天心情非常沉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地委常委们也有不同意见，他当时向地委书记 B 说：“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而 B 不耐烦地说：“中央有八条指示，少奇和小平同志又亲自抓工作组问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所谓中央八条，主要是大字报不准上街，要内外有别，不准开大会声讨，不准游行示威，不准串联，要注意坏人的行动，等等。据说派工作组的决定是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在中央强行通过的，周恩来不很赞成，陈伯达曾公开反对。当然这只是传言，毕竟工作组已经派出去了，并且在各学校各单位抓了不少“坏人”、“野心家”、“右派分子”、“反革命”，等等。

运河市委书记 D 执行派工作组的决定十分积极，他交待工作组负责人：“放心大胆地干”，“这次和一九五七年抓右派一样，一个也

不要漏网”。工作组在运河技工学校搞得最凶，准备整理材料逮捕张勤等人，受株连遭批判的师生有二十多人。运河一中、运河二中的工作组也不示弱，他们把全体教职工集中起来，先是大会威吓，然后让每个人写出检查，由工作组逐一排查，凡是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本身有点毛病的，都列为批斗对象。这样一来，光这两个学校的二百多名教职工中就有七十多人被小组或大会点名批判，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也有数十人列入黑名单。运城县根据地委指示，把全县近 700 名教师进行集训，其中 400 多人被打成“三反”分子、“双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逼死的不少于 15 人，逼疯的、劳改的、开除回家的、开除政籍党籍戴帽子的更多。

运河地区文化局所属的文艺系统，是刘、邓工作组大显身手的地方。他们把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分为左、中、右，按档案材料找问题。左派由工作组指定，协助工作组整“牛鬼蛇神”。他们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凡是平时好提意见的，不听领导话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当然也有个别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的，一个个在劫难逃，真正有问题的，只要能靠拢工作组，取得领导的“谅解”，也可以逍遥法外。

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全运河地区十二县市被整被抓的所谓“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反革命”，“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有 3000 多人，其中极少有当权派，顶多不过是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副书记之类。同时有 80

多人自杀。真是一片白色恐怖。而白色恐怖的制造者——工作组，主要是利用受蒙蔽的学生、各单位所谓的“左派”，让这些人去抄家、去殴打、去批判、去当炮灰。

反工作组的活动暗暗进行着，主要是中学生，他们从外地，主要从北京获得信息。一开始是个别同学中议论，对工作组的行为发泄不满，到 1966 年下半年开始活跃起来，进行秘密串联，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清算工作组的斗争才开始公开化。

一开始就对派工作组有不同看法的运河地委常委 A，一直在思考：这是不是镇压群众运动？这符合不符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这天，A 带着满脑子的迷惑，匆匆吃了晚饭，走出院门，来到前排地委宿舍地委副书记 C 的门前。

C 二十七、八岁就当上了中心县委书记，是当时比较年轻的县委书记，曾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夸他“年轻有为”。A 比 C 大几岁，他们分属湖西和湖东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微山湖的东西两边有两块游击区根据地，运河地委专署成立之后，两大院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湖东湖西，当时还有湖东湖西两个小宗派的说法。然而 A 和 C 却团结得很好，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都表现得完全一致。

A 对 C 的革命干劲和务实精神很佩服，更为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马列主义水平折服，在地委常委会中他们的看法、意见往往不谋而合。这两天 C 的肝病又犯了，不知现在怎么样？A 一进门就问候病情。C 边往屋里让，边回答说：“好多了”。C 的住房也是三间平房，中间是饭厅兼客厅，西边一间摆了两张床，是儿女们住，东边一间算是卧室

加书房。C 的家庭困难在两大院是出了名，老伴是农村人，没有工作，儿女又多，所以每次地直机关困难户名单都少不了他，但他一次也没领过救济。屋里的陈设破破旧旧，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但是他很乐观，更很进取，虽在病中，书桌上，枕头边都是书报。

A 不是外人，径自进入 C 的卧室，很随便地坐在床沿上，两人很快就谈起了当前运动。

A 说：“自从向各学校各单位派了工作组，又抓捕和批斗了那么多所谓坏人，我总觉得这么搞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C 接着说：“这两天在家休息，又反复学习了‘五一六’通知，感到当前这场斗争不简单，是解放后十几年党内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是总爆发。”于是，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回顾了从合作社、工商业改造、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直至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四清”运动，等等。这些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A 说：“看来毛主席下决心搞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让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苏联搞了近五十年社会主义，到头来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其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不搞群众运动，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C 说：“群众的观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有些人拼命流血搞革命，为了什么？我看是为了自己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向群众发号施令，丝毫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只把群众当成阿斗。”A 说：“当然，群众也不是都对，但应该看主流，看大方向。毛主席在 1927 年考察农民运动的时候，各种现象都看到了，各种议论也都听到了，但主席紧紧抓住阶级分析、阶级关系这条主线，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

个纲，着眼于革命运动发展的方向，立足于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所以才能力排众议，写出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C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一定不要当群众运动的绊脚石，不能把群众提意见、贴大字报看作反党，今后尽力所为，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A说：“我们这样的看法在地委领导层是少数啊！他们总怕乱，喜欢定条条框框，认为执行起来方便省劲，所以对派工作组、执行中央八条、抓小野心家、抓捣乱分子，十分热心。据说刘少奇同志最近指示：‘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可以批斗和戴帽子！’、‘右派分子有多少定多少，不要有框框’。这更助长了咱地区抓学生中坏人的劲头。”C说：“不要担心，这种局面不会长久的。从毛主席接见我那天起，我就认定毛主席是和广大群众永远心连心的。”A有些惊讶：“你是说毛主席很快会有新的指示？那中央的问题可就大了！”C没再说什么，只与A会意地

四、革命造反派的兴起

A很佩服C的预见，不愧是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人。正当运河地区各学校、各单位批斗学生、教师和其他群众，整理材料批捕首要分子，内定出一大批“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等大整群众的活动，在工作组的直接指挥下得心应手地进行的时候；正当工作组“钦定的左派”、大肆抄家，殴打一般群众的邪火蔓延的时候；正当以运河地委书记B和运河市委书记D为首的党内走资派，认为这下子捣乱分子镇压下去了，运动可以按照自己的部署（也

就是党的部署，他们一直以代表党自居），有领导，有秩序，有纪律地进行下去而额手相庆的时候，各种消息也从北京传来：毛主席派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两次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支持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支持反工作组的蒯大富，支持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散发得到处都是，每篇讲话都是批评工作组，批评镇压群众运动的。特别是《红旗》杂志上登出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给受压抑的群众运动浇了油点了火，给利用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以当头棒喝。

运河地区和全国一样，到1966年7月下旬，就面临着必须撤工作组的命运。

没有了工作组，运河地区各学校各单位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获得大解放，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如火如荼，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原工作组及本单位主要当权派。1966年8月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此后几天，各地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都沉浸在庆祝、欢快的气氛中，各种群众组织及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作组进驻之前就贴出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工作组期间从受压迫、受迫害到秘密反抗斗争，最后公开跟工作组斗争，终于撵走了工作组。他们的人数有一个由少变多的过程。这类组织的特点是活动能力强，消息灵通，对毛主席的指示，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执行起来雷厉风行，

毫无顾忌，根本不买本单位本地区当权派的帐，批判斗争起来入木三分，字字句句都上纲上线，刺中要害。这是革命造反派组织。

另一类组织是工作组进驻前紧跟本单位领导的布置去参加运动，工作组来了又是工作组的得力助手。撤走工作组，他们虽然表面上错了，失去了公开的支持，但暗地里还和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不过由于大势所趋，他们的人数有一个由多变少的过程。他们也搞批判，但是比较温和，所谓“讲政策”。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批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时，专拣副职斗批，什么“副书记”、“副校长”、“副专员”等。他们抓的大部分是干部的生活上的问题，决不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显然，各单位的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喜欢第二类群众组织，把他们封为“左派”，在权力范围内给他们诸多方便和照顾，例如 1966 年 8 月底开始选派赴京代表时，各学校基本上都是选派的第二类组织的师生。而对第一类组织，虽然表面上也叫他们革命造反派，是革命小将、革命闯将，而内心是十分不喜欢，因为他们“太不听话”，“太凶”，“太狠”，“太狂”，一点也不讲情面。有时还十分仇视他们，永远把他们当成“犯上作乱的右派”，“野心家”，“坏人”。尽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党内走资派对上述群众组织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变化的，总是和第二类群众组织——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时地重用他们和革命造反派斗。

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群众意气风发地投入大批判的高潮，很少顾及

后果。他们先是鹦鹉学舌，抄抄报纸，喊喊口号，贴贴标语。随着运动的深入，认识水平逐渐提高，领会文件精神逐渐深刻，逐步转向批判本单位本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揭发党内走资派的各种错误言行，深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尽管这些党内走资派定的不一定恰当，批判起来也有过失之处，但总是加深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加深了中国面临着复辟资本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使大家一边批判一边受到教育得到锻炼获得提高，许多潜能都挖掘出来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敢想的事敢想了，不敢做的事敢做了，个个以天下为己任，成了世界的主人，社会的组织者、指挥者，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推动历史的前进。然而运动发展的太快了，许多东西只是囫圇吞枣地往脑子里灌，没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和消化，所以根本谈不上很深刻。大多数人只是象大海的浪花，一会儿被推向左边，一会儿被推向右边，一会儿掀上陆地，一会儿又抛向大海。自觉与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有目的和无目的，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必然现象。

这时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组织主要有运河一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原来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指挥部）”，运河二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原来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以及地区重点中学的其他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运河技工学校的“险峰造反指挥部”是运河中专和技工类学校中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其他比较有名的是运河师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运河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简称“红劳”是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人数多、力量大，所以把运动前

期的革命造反派观点统称“红劳观点”。文艺系统的“文艺造反司令部”也异常活跃，为推动运河地区的大批判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运河地区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的较晚，但广大贫下中农是革命造反的中坚力量。首先是距离运河城区二十多里的唐口、喻屯人民公社的造反派掀起了革命大旗，随后逐步发展，成立了“运河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6年11月建立的“鲁南红卫兵联络站”，是涵盖了运河地区、菏泽地区、枣庄市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组织，驻地在运河专署大院，主要选派各县的红卫兵造反派骨干在这里进行联络和宣传。

从内心非常支持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运河地委常委A，虽然也受到冲击，接受了批判，但心情非常高兴和激动，他是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他真正把造反派的行为看作革命行动，把革命造反派看作革命的新生力量。当然，他有时也担心革命造反派暴露出来的问题。“真正有成就有作为的革命者，应该学会思考问题，应该能静下心来想问题”，他曾经背地里给几个革命造反派负责人，说过这类话。但他们不可能都听得进去，因为太匆忙了。

大批判开始不久，又进行了革命大串联，学来外地的经验还没很好的消化，又开始罢官运动。一些红卫兵组织，一些群众组织，认为只有把本单位、本地区的一把手罢了官才算取得革命造反的胜利。殊不知，大批判才是最重要的，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把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即使罢了他们的官，也只能是形式上的胜利。事实

上，这些当权派，包括党内走资派，罢了他们的官，他们更逍遥，而他们的话照常有人听。从 1966 年 8 月到 1966 年底出现了几次围攻、殴打革命造反派的事件，就是受到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的授意和指使。他们无需直接出面或下什么指示，只需经常告诉他们亲近的保守派组织：“文化大革命就象五七年反右一样，谁跳得高谁最后倒霉，抓右派在运动后期，现在是考验对党忠心的时候，‘乱世出忠臣，板荡出孝子’，什么时候都要站稳立场。”“××，你是党组织培养的对象，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一直准备提拔你的。”等等，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当权派，党内走资派，“都是共产党的化身啊！”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保守组织的群众也是这样认为的。

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也有很出格的时候。所谓“出格”，就是他们忘记了刘少奇“修养”的要求，把本质暴露出来，把心里话说出来。

那是一次地委常委开会之前的议论。地委书记 B 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在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时十分积极。凭心而论，B 也是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他 1937 年参加革命，打过游击，流过血负过伤。由于长期做地方工作，又能吃苦，群众威信较高。他与万里有私交，解放前一块工作过，是他的领导，解放后来往不断，在思想认识上受万里的影响很大。由于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消息灵通，对中共中央上层也比较了解。例如解放初期，他就从万里那里听到不少刘少奇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讲话，感到很对自己的口味，总认为农业合作社搞得太快，人民公社办得太早，六十年代初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他是积极响应，满腔热情地贯彻执行。后来搞社教，进行

阶级教育，他就发了不少牢骚，认为中国政治运动太多，“老是整来整去”。这次一搞文化大革命，他从心里反感、抵触，但对彭真的二月提纲却特别欣赏，贯彻得特别卖力。后来风云突变，他又从万里那里听到中央上层的激烈斗争。所以，趁着人还没到齐又开始发牢骚。这是一次地委常委碰头会，先到的有地委常委、运河市委书记 D 和运河地委分管公检法的副书记杨某。这两个人可以说是 B 的莫逆之交，平时来往不断，每次地委开会又总坐在一起，便于商量问题。D 在运河市派工作组搞的最好，收集整理了大批革命师生和其他群众的黑材料，在杨某的配合下，抓捕了几个首要分子。这三个人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说，全是肺腑之言。B 说：“听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斗争很激烈，少奇和小平同志他们根本不认为派工作组错了。”杨说：“学生把学校党团组织都冲垮了，不派工作组领导还不得乱成一锅粥！我真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反对派工作组！”D 说：“我看毛主席也是老糊涂了，在十一中全会期间自己带头写了大字报，成何体统！”B 说：“毛主席就知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红卫兵喊万岁，全不管底下的干部死活。”杨某也来了劲：“要是刘主席领导，决不会出这么多乱子，我们这些干部早就享福了，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整天提心吊胆怕批斗。”D 气愤地说：“这决不能算完，谁胜谁负还难说！”还要继续往下说，见又有人来，才停住。他们满以为，出三人之口只入六耳，没想到还入了另外的耳朵——两个负责布置开会的秘书。过了不久，地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起来了，两个秘书把当时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三人的议论揭发出来，写成大字报，贴在运河城区太白楼的南墙上，并印成传单，

广为散发。B 避重就轻承认了一点，D 是死硬不说，杨某却怕的要死，因为他知道整反革命的滋味，情急之下自杀了。不过地委大院却传出另外自杀的原因。而革命造反派掌握了真实情况后，穷追猛打，显示了占领政治舞台的巨大威力。

五、初登政治舞台

曲阜师范学院是 1956 年建立的一所新型师范院校，座落在运河地区曲阜县城的西部边缘。学院的大学生年龄大、知识面广、活动能力强。他们早就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首都院校有联系，所以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们已从北京取得真经。

由于曲师院所在地的运河地区，特别是运河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的缓慢，所以革命造反派组织觉得应该派人去宣传发动一下。1966 年 8 月 26 日清晨，曲师院的宣传车就出发了。

来到运河城区的太白楼前还不到十点，这些革命造反派大学生顾不上休息，就立即行动起来，用大喇叭宣传，在墙上书写大字标语。主要内容是宣传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前一段时间运河地区镇压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罪行，矛头直指地委主要负责人。

听讲演的群众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这时，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说：“你们学生不好好在大学里搞自己的运动，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城区几个学校的保守组织也得到通知，立即赶来，再加上这几个人的煽动和蒙蔽，在街上游荡的保皇派红卫兵

也闻讯围了上来。一时间，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遭到了围攻和谩骂，说什么：“运河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你们插手！”“你们来捣乱，赶快滚回去！”“运河市的干部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运河地委是红地委！”等等。

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除在太白楼前广场遭到围攻外，最严重的是在运河一中。原来，他们来到运河后进行分散活动，分别到运河一中、运河二中、运河技校、运河供销学校进行串联。由于运河一中保守势力厉害，是运河市委书记 D 亲自抓的点，一直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次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一来到就受到了围攻、谩骂、推推打打，说他们是“反革命宣传”，是“反革命分子”，威胁要让公安部门逮捕他们。

在这些被围攻中，充分显示了革命造反派的风采，展现了革命造反派初登政治舞台的雄风。一是不怕。毫无畏惧地面对几十数百受蒙蔽的保守派组织的群众，镇定自如地进行讲演、宣传，有理有据，讲到精彩处，听众也激动起来，跟着高呼口号，支持革命、造反。二是有勇有谋。面对即将酿成的武斗，造反派首先揭露这是党内走资派搞的鬼，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并利用“16 条”，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北京市革命造反的大好形势，进行启发教育保守组织的学生和群众觉悟。三是团结。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与运河城区的革命造反派是心连心的。一听到曲师院的同志受围攻，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出来，并肩战斗。同时对那些观望、不太理解的群众耐心进行宣传，团结他们一块起来造反。四是通过“8.26”事件大造革命舆论，连夜印发《十万火急》，

揭露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新的罪行，向全省散发，取得了各地造反派的有力声援。并号召外地串联的革命造反派共同揭开运河地委的黑盖子，攻开运河市委这个顽固堡垒，捅开运河一中这个保守派的黑窝，使坏事变为好事。

事实证明，革命造反派胜利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运河地区，运河市的文化大革命就出现了新气象，运河一中变成了革命造反派的一个大本营。

充分展示革命造反派才华的是革命宣传、革命批判。1966年10月，天气已经变冷。但革命造反派不畏风寒，斗志昂扬地纷纷下工厂，到农村，到各县各公社去宣传去鼓动，印制了大量传单，召开了许许多多的动员会，发动工人、贫下中农一次又一次地向走资派斗争，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使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遍布城乡工厂机关单位。各地各单位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委，党政一把手受冲击最厉害。

在农村批判他们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发展集体经济，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路线不清，学大寨不真抓实干，摆花架子，弄虚作假，在生活上搞特殊多吃多占，在生产上搞官僚主义不参加生产劳动，等等；在工厂批判他们不相信和依靠工人阶级，搞专家治厂，技术挂帅，不突出政治，不进行思想教育，只搞“管、卡、压”，不关心工人的生活，用生产压革命，等等；在学校，由于运动开展得早，揭露的问题比较多，因而大批判的火力更猛，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劲头更大。问题集中在用什么思想去教育学生的问题，在学校是以谁为主体的问题。是搞“封、资、修”的教育，宣扬“德育第一”、“学

而优则仕”、“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是用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师道尊严”，“打骂、体罚学生”，让学生一切从属于教师，还是以学生为主体，学校的一切工作应围绕学生的“受教育、长知识、长身体”；是视学生为敌人，把考试作为对付学生的手段，还是师生应该互相关心、相互团结，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分分，学生的命根”，片面追求升学率，还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培养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教材上，是脱离实际，从书本到黑板再到书本，还是紧密联系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搞科学实验，“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学以致用。

运河一中是革命造反派搞大批判比较好的单位。他们发挥中学教师、学生能写会画的特长，整个校院都布满了大批判的长廊，声情并茂，绘声绘色，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学校党内走资派，把工作组，把运河市委，揭批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所以 1966 年 11 月到 12 月，到运河一中参观大字报，学习大批判经验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络绎不绝，影响很大。

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建立得比较晚，大多是些工作人员，也有些小干部参加。他们对当权的内幕知道得多，又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所以揭发批判就深刻有力。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从历史问题到现实问题的种种表现，从指导工作的失误到思想根源，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问题越揭越多，上纲上线的调门也愈高。只是时间短，还不够深透，有些问题也有待落实。

运河地委常委 A 和地委副书记 C，由于是地委领导层，首先要接受群众的炮轰，接受批判。他们的检查是认真的，深刻的。他们说：“我们写检查，是接受一次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过去迷惑不解的，现在得到了答案；过去跟着干的，现在认清了方向，明白哪些符合毛泽东思想，哪些不符合；过去对错误的东西反对不力的现在腰杆硬了。”他们不光自己上纲上线挖思想根源，还表示一定今后也要有造反精神，对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和事，敢于造它们的反。同时，他们两个联名写出揭发地委书记 B 的批判材料，共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B 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和平麻痹思想，幻想国共合作后天下太平，致使他所领导的地区，地主武装活动猖獗，还乡团的报复严重，革命干群损失惨烈。第二个问题是，为了把自己定的干部级别高些，曾闹过情绪，受到上级主管领导的口头批评。第三个问题是农业合作社时期，B 对成立高级农业社不积极，老是强调困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第四个问题是“大跃进”中刮“共产风”、“浮夸风”，给当地造成了极大损失。第五个问题是 62 年运河地区在鱼台县搞稻田改革时，向农技人员泼冷水，该拨的款不及时拨，该调的人不肯调。第六个问题是生活作风有问题，因和一个年轻女干部怀了孕，不得不与农村的妻子离婚，造成严重影响。第七个问题是散布对搞政治运动的不满情绪。第八个问题是“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办的好的不表扬支持，对多分自留地、集体经济涣散、个人发家致富的生产队反而给鼓励，他所包的生产大队就是个典型例子。第九个问题是公开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第十个问题是积极执行刘邓路线，派出工作组，镇压运

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可以说，在革命大批判上，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与革命干部一起，做了大量工作。

在对待档案材料上，革命造反派与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进行了另一番较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工作组期间，曾经整了大量的群众材料。这些材料，中央曾明令销毁。但运河地区在地委书记 B 的影响下，拒不执行，说什么：“这不是黑材料，是敌情材料，是机密，任何人都不能动。”

这下激火了革命造反派。大家纷纷串联，不停的向本单位要求销毁黑材料。对当权派进行批斗时要求他们承认这是黑材料，也费了很大劲。大部分当权派一开始不承认这是黑材料，经过革命造反派摆事实讲道理，七斗八斗，认识到不论什么情况整群众是不对的，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及其他破坏活动和罪行，都要本着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更不能整材料，放在档案里，让本人带一辈子，何况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因反对资反路线、反对工作组而被整的材料，那更是地地道道的黑材料。于是大多数单位当众销毁了黑材料，只有个别单位的走资派虽然口头上承认整群众的材料不对，但又推三阻四，拒不交出，准备秋后算帐。于是由这些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派出代表，当众公开强行打开档案室，把正当档案与黑材料分开，只取出黑材料销毁。这本是革命行动，走资派却煽动说“造反派砸档案室了”；是“现行反革命”，等等。好在这时大部分群众的觉

悟都提高了，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也不灵了，“档案风波”才没掀起大浪。

1966年11月底，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已控制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党内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已经靠边站。

12月中旬，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为了大造声势，显示革命造反派的威风，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批臭运河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各造反派组织主动联络，成立指挥部，决定召开一个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地点在运河城区西关体育场。

开会那天，临大街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口号，象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彻底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打倒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打倒运河市委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砸烂×××的狗头！”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等。从清晨7点半，四面八方的群众队伍开始入场。每支队伍都举着标语牌，打着红旗，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喊着口号，唱着歌，整整齐齐地进入会场。开会之前，各队伍诵读毛主席语录的朗朗声，“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有理”的嘹亮歌声，还有各队伍热烈友好的拉歌的号子声，此起彼伏，象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十点正，批斗大会开始。头顶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颈上挂着牌子的被批斗对象，在红卫兵的押解下，一个跟着一个被带到主席台前沿，一共有20多人。纸帽和牌子上分别写着：“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黑帮分子×××”，“刘邓的孝子贤孙×××”，“大流氓×××”，等等。被批斗对象带入会场的瞬间，群众的海

洋沸腾了，口号声震天动地，“打倒×××”的呐喊，象枪膛里射出的颗颗子弹。这些昔日只知当官做老爷，对群众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的当权派真的威风扫地，他们会记住这一刻：或者彻底认识自己，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把仇恨埋在心底，咬牙切齿地发誓进行报复。无论如何，现在，红旗飘扬的十多万人的会场，象地浆迸发出来一样，火热地滚动着，愤怒地咆哮着。

事先准备好的发言人，依次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进行揭发批判。有的声音都已沙哑，还不肯结束自己的发言；虽是严冬季节，有的发言人已汗流满面，把帽子抓在手中，头上冒着热气，象个大蒸笼。被批斗的人一开始都站着，后来批到某一个人，情绪激烈，强令其跪下，抓着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民愤较大的有两类人：一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关禁闭，甚至逮到监狱去；二是利用领导身份，欺压群众，乱搞男女关系，影响恶劣。对于执行刘邓路线，有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当权派，大都作了理性的分析批判，上纲上线，触及他们的思想灵魂。

十二点钟大会结束。人们虽然身体有些疲惫，但情绪仍处在昂扬之中，并且井井有序地离开会场进行游行。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大娘说：“有十几年没参加这样的会了！那次是斗恶霸地主，这次是斗走资派。”另一位男子接口说：“这可不能相提并论，恶霸地主是阶级敌人，走资派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一位红卫兵头头模样的大声说：“党内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新中国拉回到解放前，也是阶级斗争。”男子不服气地小声说：“批判是这样批判，可是这些党的领导人（指

走资派）不是也口口声声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吗！”这边的争论随着游行的队伍远去了，那边议论的人流又涌了过来。一个人说：“这些干部整天做官当老爷，不接近群众，今天挨斗，可没威风了，真是活该！”一位年龄大的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原先多好，再大的官也和群众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穿的吃的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现在个别的真是变了，搞特殊了。”走在后面的五十多岁的斯文人说：“这也难怪。拼命流血打江山，还不就是为了坐江山，过好生活，他们都是些功臣啊！”这一说，招来一片反对声：“毛主席不是比他们的功劳大？一家子死了六七个，他老人家为什么一点也不搞特殊，保持和群众心连心！”“共产党搞革命难道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特权，为了高人一等？那叫什么共产党，还不和农民起义一个样？”斯文人仍不认输：“到什么时候当官的也不能和老百姓一样。”有人接着反驳：“不一样是指分工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消灭剥削压迫，消灭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没完没了的争论在游行队伍中继续进行着。

地委常委 A 因为不是地委主要负责人，又一直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所以只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人，站在机关造反派队伍的后边，也参加了这次批斗大会。会后，他的感受颇为深刻。首先，他对群众的力量，群众的能力，感到由衷地佩服。你看，十多万人的大会，没有公安的站岗，没有地区主要负责人的权威，居然组织得那么好，革命造反派真了不起！其次，过去总认为，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级级领导，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看来，只要有毛主席的一声号令，全国人民都听毛主席的，什么大事都能办得成。一层层领导，

如果不听毛主席的，不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以为是，搞独立王国，反而成为群众的绊脚石，革命前进的销蚀剂，往往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引向邪路。解放后十几年的历史，不论是合作社运动、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四清”运动，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第三方面，他通过这次批斗大会，联想 1959 年以来的党内斗争，更感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英明伟大。最后，他仍存在不少遗憾：革命造反派太喜欢大轰大嗡，缺乏静下来做些细致踏实的工作，如对被批斗干部的分化瓦解，应抓主要矛盾抓本质问题，应多重视思想路线方面的批判，少做或不做触及皮肉的事。还有，革命造反派应该尽快统一起来，不要老是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等等。

确实，开了这么成功的批斗大会，几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谈得眉飞色舞，完全沉浸在初登政治舞台的喜悦之中，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几个比较肤浅的人还陶醉在表演被批斗者的各种丑态的快感里，几个比较持重的人在分析那些人的批判有力量，几个主要头头各自夸耀自己组织来的人数多，气势大，批判的严厉，有革命造反的脾气，等等。而对于今后怎么办？大家似乎都考虑的很少，似乎都被动地等待着北京的风暴，省城的风暴，外地的风暴，来注入继续前进的动力。

六、红卫兵的渊源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运河地区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整整比北京晚了两个月，它是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壮大起来的。起初是官办红卫兵，是各单位当权派批判所谓黑帮的御用的工具，根本无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

官办红卫兵分裂了，一些革命造反派冲杀出来，如运河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运河二中“抗大战校红卫兵”等，最后成立了“鲁南红卫兵联络站”，才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派的的中坚力量。这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有些不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深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和迫害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中学生自发地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以及北京市二十五中学也相继自发地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1966年6月，刘邓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北京市这些红卫兵组织被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认为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大部分红卫兵被批斗，成了“小反革命”，“小野心家”，“捣乱分子”，破坏秩序的“游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冲破重重压迫，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

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的扭捏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的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性”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

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朵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刘邓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各校红卫兵组织均定为“反革命集团”，强令解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刘邓工作组的白色恐怖中于七月四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撼山易，撼红卫兵难！”的革命造反的雄心壮志！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刘、邓工作组从六月到七月的五十多天里，一方面天天忙着集训各个学校的老师，让每个教师都要写检查交代问题，象刘少奇、邓小平在“四清”中对待“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干部一样。另一方面就是对付红卫兵，打击红卫兵组织，迫害红卫兵小将。

毛主席知道了这些情况，立即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派中央文

革小组的成员到北京各校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为。

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贴出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热烈欢呼：“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是红卫兵值得纪念的日子，伟大统帅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写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对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造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北京各校红卫兵争相阅读这封字字千钧的信，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人高兴得欢呼跳跃，彻夜不眠。从此，红卫兵，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从秘密走向公开，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急先锋。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这天，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的天安门广场，北面城楼上下，完全披上了只有国庆大典才有的节日盛装。近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云集在那面积四十五万平方米的巨大广场上和东西长安街头，不停地欢呼歌唱，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红卫兵的英明统帅毛主席伟岸的身体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满脸慈祥地向红卫兵招手，无比亲切地向红卫兵问好，平易近人地和红卫兵代表握手，非常满意地让红卫兵代表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这一切，都将载入红卫兵运动的史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随后，1966年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26日，先后共八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一次次幸福的接见，极大的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运河地区的红卫兵和全国的红卫兵一样，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

来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冲破被全国各地走资派把持的独立王国的革命大串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总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红卫兵这个急先锋的冲锋陷阵，出现了大好形势。毛主席高兴地夸赞说：“有许多问题，我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都解决了。”

然而，红卫兵也被刘、邓等人利用。和历次运动一样，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先是反对和镇压群众运动，当反对和镇压不成时就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水摸鱼。1958年的大跃进是这样，1964年的“四清”运动是这样，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是这样。在这些方面，运河地区的党内走资派是亦步亦趋，运河地区的红卫兵也遭遇过同样的命运。

邓小平曾十分露骨地对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说：对待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混战一场”。刘少奇也多次讲：“他们是红卫兵，你们高干子弟也是红卫兵，都是群众嘛，看中央文革会不会挑动群众斗群众。”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组织已经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情况下，北航附中的一些干部子弟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还向北京各校散发。

8月1日，中央文革负责人指出这样宣传是错误的，并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但是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由于背后有人支持，根本不理中央文

革的茬，仍然拼命宣传自己的口号，扩大他们的红卫兵队伍，并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12月5日，以部分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简称“联动”。“联动”是红卫兵运动中的渣滓，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它反对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批判工作组，对批判他们老子的革命群众恨之入骨；它残酷地摧残广大人民群众，专门搞“打、砸、抢、抓、抄”，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徒和流氓阿飞；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自来红，是贵族阶级，连公安部（已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都不放在眼里，多次进行冲、砸、抢。

“联动”1967年1月1日公布的通告更加露骨，在它的今后任务中，说：“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指毛主席、林彪——作者注），几个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它的组织路线中规定：“(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到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并号召：“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这个红卫兵运动中的败类理应受到镇压。但镇压之后，刘少奇马上找毛主席，说：“我至今还没有认识到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为什么要犯错误了。”毛主席耐心地说：“这不好，很不好。（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你是作了检查的，现在你又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搞倒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你在检查中信誓旦旦地向中央保证，你绝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

派，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你是搞了两面派的。”刘少奇狡辩说：“你口口声声说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可以为五十多天的错误负责。但你也知道，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我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以后的许多同志又同样在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而且在各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我想知道这个责任又该由谁来负呢？”毛主席反问一句：“你说呢？”刘少奇没敢说：“是毛泽东”，而转弯抹角地说：“是中央文革！”“中央决定不是说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吗？但这一段公安部却抓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这又该怎样解释呢？”毛主席说：“原来你是为‘联动’鸣冤叫屈来了。不错，这个由部分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学生组织，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和策动下，正在炮打中央文革和林彪同志，还有我。他们很拥护你呢。这些受蒙蔽的小将们并不了解中央的内情，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公安部。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快会觉醒过来，同他们的后台老板划清界限而反戈一击的。”刘少奇的脸上冒出了汗，真是弄巧成拙，后悔不迭，但并不服气，暗暗地说：“时间会检验我是正确的。”是的，时间检验出刘少奇是中国的头号修正主义分子，而另一个现代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 20 年后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心愿。

运河地区的党内走资派虽然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等人的权势和能量，但也在权力影响的范围内组织起与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对抗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为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复埋下了祸根。

严格地说，中国之所以在毛主席逝世不到两年现代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就能上台搞复辟，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更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层搞得不深不透有关。没能彻底摧垮保守组织的思想体系，使党内走资派有坚实的群众思想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很容易得逞。

七、B、D 跟着刘、邓走

以运河地委书记 B 和运河市委书记 D 为代表的运河地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所以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感、抵制、直至反对和破坏，不是孤立的，而是来源于中共上层。

这个中共上层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利用职务之便，他们已网络了一批自己的人，到了 1956 年中共“八大”，羽翼已基本丰满。

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他们感到根基还不太牢固，又认为彭德怀等人不好驾驭，所以对彭德怀过早跳出来反对毛主席，持反对态度，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开展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但从思想上，从路线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从 1959 年起，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他们感到可以与毛主席抗衡了：党内有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左右全局，党外有国家主席的头衔名正言顺。北京，这块天子脚下，有彭真镇守；公安系统，罗瑞卿是自己的心腹爱将，并且还掌管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大印；宣传、文教更是铁杆御林军，因为搞资本主义一套，他们是沆瀣一气、心领神会。唯一缺憾是军队中的林彪，不听他们的使唤，反而跟毛很紧。

首先，刘少奇、邓小平选准攻击毛主席路线的缺口，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他们曾是制造困难的罪魁祸首。虽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栽赃陷害欲治毛主席罪的目的没能达到，但这个缺口仍是最好的攻击点。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多次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名，向毛主席发起了进攻。他们显然受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鼓舞，只不过实际运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在中国扳倒毛泽东决非易事。刘少奇的讲话已比较露骨。他先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认为“彭德怀的纲领中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向中央反映情况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其实，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罪名就是刘少奇定的）。这实际上就否认了彭德怀的错误，为彭德怀向中央递交八万多字的翻案材料开了绿灯。这也是吴晗写《海瑞罢官》的背景，更何况吴晗是邓小平的亲密牌友，这些信息，吴晗早已心领神会。所以，文革一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吴晗，刘少奇、邓小平神经马上紧张起来，利用彭真在前台，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丑剧。

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除了利用会议向毛主席发难，还用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与毛主席著作分庭抗礼。“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流言就是这个时期广泛传播的。刘少奇为了达到削弱直至推翻毛主席的目的，在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专门加了这么一段话：“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

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诚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

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作为运河地区党员的必读课本，其要求之高，甚至超过毛主席的著作，这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迎接刘少奇时代吧。

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1962 年的表演，特别是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错误作法，毛主席曾亲自和刘少奇谈话：“我虽然退居二线，让你当了秦始皇，但我还是为你担心。这种右倾作法，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在国内搞‘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谁高兴？地富反坏高兴，帝修反高兴！”

但刘少奇是嗤之以鼻，认为毛的观点是僵硬的、教条的、过时的。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经过合法的手段被全国人大和党代表赋予的，他要干的事，只要经过法定程序即可。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倒是毛象个太上皇，碍手碍脚的。他已胜券在握，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批评放在心上，尽管表面上表现的谦虚和尊重，那不过玩耍权术而已，“由我取代你，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暗暗得意。所以，那段时间是他最惬意的时候，精神饱满，体重增加。

毛主席与他政治对手的较量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其方法就是狠抓阶级斗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 1962 年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反复讲了阶级斗争问题，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刘少奇、邓小平对阶级斗争特别反感。邓小平经常夸耀说：“我这个人是从不讲阶级斗争的。”刘少奇则对薄一波说：“老的不行嘛！……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他的徒弟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把他的座位让给了蒋介石。”

到 1964 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看到用右的一套无法让毛主席让位下台，就采取了“形左实右”的一套。1964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农村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我们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已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批评——引者注），总结的不全面，但还有用。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这年 9 月 10 日，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把形势估计的更加严重，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还

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完全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规定。到了10月，刘少奇又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的指导》，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

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他主持下达的这些文件，在运河地区贯彻得非常积极。

其实，刘少奇等人所说的敌人，并不是专指阶级敌人，而是工作队和上级党委看不惯，不听话，不能领导社员个人发家致富的基层干部。这些干部大部分出身好，革命性强，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只是文化水平低，有的作风简单粗暴等。刘少奇等人要求夺权的地方，并不是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受打击的地方，而是只凭工作队的印象，根本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抵制刘、邓“三自一包”的好领导当成夺权对象。运河地区曲阜陈庄大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所以，毛主席发现问题后，把刘少奇约到家里，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呀，右起来投降，左起来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统统打倒，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我看你是‘形左实右’。”

刘少奇对毛主席苦口婆心的教导，认为只是毛的个人意见，他马上摆出党中央的身份顶回去，“许多问题是中央会议上定的，纠正也应在会议上纠正，我有错误我检讨好了。”

刘少奇、邓小平真的利用中央会议来压毛主席。1964年12月，

也就是毛主席找刘少奇谈话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商量，由邓小平对毛主席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会议。”毛主席气愤地说：“我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本没安排毛主席讲话。当刘少奇讲到“敌人比我们还高明，我们斗他不赢，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器蹲点时他们还赶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革命。”毛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不得不插话进行反驳：“关键是看效果，不在于赶不赶。你不去斗走资派，群众当然不满意。现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刘少奇冷笑了：“我看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专提整走资派，影响不好！”毛主席火了：“你的这些提法，统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科学的。”然后拂袖而去。

第二天，毛主席老早来到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拿出两本书，拍着桌子说：“我带来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呢。”

看到会场上大多数人都用愤怒的目光扫向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二人害怕了，感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毛泽东公开较量。于是会后向

毛主席认错，甚至检讨的声泪俱下，一付万分虔诚的样子。毛主席原谅了他们。

但他们不甘心失败，还要搏一搏，斗一斗。这就到了 1965 年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先是不发表毛主席支持和亲自参与修改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继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二月汇报提纲》，压制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批判黑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广大革命群众，最后又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野心家”，“右派”，实行反革命恐怖。当然，这一切都是垂死挣扎，是活生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

以 B、D 为首的运河地区参与抵制、破坏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党内走资派，有紧跟刘、邓的一面，也有不全部了解刘、邓的狼子野心的一面，不少人是个认识的问题，理解的问题。但为什么理解和认识总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一致，并在以后的运动反复中一而再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就需要查查思想根源，应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改造世界观，真正进行一场触及个人思想灵魂的大革命。

从表面看，刘、邓的路线很能迷惑人。你看，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共产党搞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吗？你看，强调纪律、秩序，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有什么不对，这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各级干部的威信吗？

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词是不难戳穿的。

“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一个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也有一个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争取外援而又不依赖外援，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艰苦奋斗，发展公有制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铺张浪费，只顾眼前利益，破坏自然环境，污染人们生活的空间，甚至丧失国格、人格来换取外援，鼓励发展私有制经济，向资本主义靠拢，用复辟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殊不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直是提倡“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以此使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剥削压榨广大劳动人民，获取更大的利益。社会主义，共产党，绝不能单独提“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而应该提“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要同步发展，并以政治来挂帅。

“提高人民生活”，是普遍地提高，搞共同富裕，用共产主义思想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水平，还是单提物质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所谓能人先富起来，造成两极分化，剥削有理，腐败有理，用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来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起来？

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求稳定和安逸的，是希望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建设自己的小天地，并期盼得到提拔升迁，官越大越好，对官员的照顾、各种优厚条件越多越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些干部的心理，制定政策，施加小恩小惠，让他们拥护自己的路线。

再一点，在运河地区这些中下层干部中，认为毛主席也好，刘（少奇）主席也好，都是共产党，谁领导不一样呢？彭德怀也是大元帅，

立过赫赫战功，他耿直、肯说真话，敢于顶撞毛主席，有什么不好？他也是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该歌颂就歌颂，该翻案就翻案嘛！这些短视，庸俗，迟钝，缺少马列主义的东西，迷住了他们的眼睛。

总之，以 B、D 为首的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对刘、邓路线亦步亦趋，北京有《海瑞罢官》，运河地区也演了不少坏戏、黑戏；北京派工作组，他们也积极响应；北京有红卫兵“联动”，运河地区也有各种名目的保守组织。凡是刘、邓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号召，都得到他们的积极行动。在维护共产党干部既得利益方面，他们已经完全站在刘、邓路线一边。

八、混战一场的阴谋

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是从什么时候学会“混战一场”的？似乎难以说得清。也许听到了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授王任重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锦囊妙计，也许是从彭真的《二月提纲》中学来，当然，还可以追根求源到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四清”路线。这一切的潜移默化，使运河地区以 B 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对“混战一场”的阴谋心领神会，运用得得心应手。

他们“混战一场”的手段，在 1966 年实施过程中有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感到不投气味，于是按兵不动；第二阶段是彭真的《二月提纲》出笼，他们如获至宝，特别对“加强领导”，“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即“搞纯学术问题”，以及对革命群众进行“整风”，

等等，感到欢欣鼓舞，立即责令各单位党委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把矛头对准那些所谓的“权威”，在学校里则开始了“整老师”的高潮；第三阶段是“5.16”通知下达后，他们感到有些手忙脚乱。有些群众，有些师生，开始秘密串联，到处议论他们“整群众”“束缚群众手脚”的做法不符合中央精神，甚至贴出大字报，反对本单位党组织领导。这时，他们让各单位党委注意哪些人跳的高，查查这些人的背景。第四阶段是刘、邓工作组的兴盛时期，也是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干的最欢实的时期。这时他们认为“混战”策略将要大功告成。抓群众，批群众，斗群众，甚至关押、逮捕群众，把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第五阶段是“十六条”的发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大串联等。这下把他们的部署全打乱了，把他们精心设计的堤防彻底摧垮，于是他们不得不进行“混战一场”的另一套方案：自己不出面，而暗地里操纵、指挥、影响一些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这就是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第六阶段。

第一阶段的所谓按兵不动，是对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批《海瑞罢官》”，“批罢官的要害”，“批为彭德怀翻案”的号召按兵不动。而为了做做样子，也组织各单位读读报纸，学习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并一再告戒党员和群众：“现在是搞文化运动，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无关，当前的中心任务还是抓好生产，让他们文人闹去吧。”这只是表面的官话，是愚弄群众的。其实，以B为首的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自从读了姚文元的文章，特别是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火药味很浓的编者按语，并且从北京也传来一

些消息，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啦，“《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啦，预感到党内将有一场严重的斗争。他们对党内斗争是很反感的，虽然不是公开的、明确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多抓生产少搞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一级领导一级，一切要保持井井有序”，“做个地方干部只要听上级教导，贯彻上级指示，四平八稳占好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很感兴趣，认为这才是好的中央领导。“千万别无事生非”，“我们打天下不容易，现在该安安稳稳坐天下了”，“我们为人民做点好事，人民感谢我们，这有多好，放着好日子不过斗什么”，“革命半辈子，也该经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这是他们的心声，也是他们之间的口头禅。所以，第一阶段的“按兵不动”是以后“混战一场”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是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公开地、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文革大混战。自从有了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彭真的“二月提纲”这支尚方宝剑，他们不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冷淡，开始了上挂下联，利用革命群众的热情，炮制了批判《孙安动本》的闹剧。

《孙安动本》是一出鲁南地方柳子戏，编剧杨汉青，原是基层单位调到运河地区文化部门搞一般的编写工作，既无政治背景，又不是任何层次的领导。他只是根据民间传说，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地方戏剧形式，写了这么一个剧本。剧情是明朝一个地方官孙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由于阻力大，官司一直打到皇帝面前才取得胜利。这与《海瑞罢官》的性质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海瑞罢官》的编剧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文艺界的著名人物，

经常出入中共上层领导人家中，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亲密的牌友，与刘少奇等人经常见面，跟彭真更是莫逆之交。

刘少奇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就搞两面派，大会上狠批彭德怀等人，私下里又通过胡乔木（毛主席的秘书）向毛主席传话，为彭德怀等人说情。到了 1960 年之后，刘少奇又让人转告彭德怀：“有意见可以写嘛！”鼓励彭德怀翻案，于是彭德怀写了八万多字的意见书，并多次给刘少奇写信，让中央抓紧解决他的问题。刘少奇让彭德怀先耐心等待，告诉他：“现在需要先造造舆论，跟中央有关领导统一下意见，然后在中央会议上通过平反问题”。

刘少奇这些活动从来是和邓小平、彭真等人一块商量的，并由他们向外传播，所以吴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有思想背景，又有组织背景。至于彭真等人装模作样的大叫“吴晗与彭德怀并不认识”，“经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直接联系”，“吴晗写《海瑞罢官》决不是为彭德怀翻案”，等等，真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还需要说明的，根据最新材料更加证明，彭德怀等人在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上欲治毛泽东的罪，让毛泽东下台，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只不过抓住 1958 年下半年出现的问题作为突破口而已。早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团去东欧、苏联访问，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国防部长等利用宴会和接见，多次当着彭德怀的面，侮辱毛主席，攻击中国的“三面红旗”，并且直言要像他们打倒斯大林一样打倒毛泽东。彭德怀内心赞同，表面上一言不发，反而在告别宴会上莫名

其妙地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其实，苏修叛徒集团早就视毛泽东为眼中钉，把中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当作统一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绊脚石，在吴冷西写的《十年论战》及陈毅 1959 年向中央的报告中，都披露过苏修集团准备在中国党内找代理人，通过政变把毛主席搞下去。所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绝不是孤立的，他想请苏联出兵把他扶上台也是梦寐已久的。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他就赤裸裸地向同车的政治局委员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作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出兵。”连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也揭发彭德怀：“对毛主席不服气，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还利用了关向应（关向应与彭德怀长期共事，很了解彭德怀）临死前的话：“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来说明彭德怀有个人野心。

所以，彭德怀绝不是什么“正直”，“敢于抗上”，“替民伸冤”的海瑞式的清官。利用《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需要。这样一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大毒草（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运河地区一个非常普通的编剧杨汉清的民间戏《孙安动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但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为了“混战一场”的政治目的，竟然大动干戈，召开大会，发出指示，蒙蔽群众，大批特批，说《孙安动本》是和《海瑞罢官》一样的大毒草，把杨汉清打成运河地区的牛鬼蛇神，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其进行人身折磨，关进牛棚，发配劳改，等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B为首的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在这一阶段“混战一场”的另一件杰作，是批判一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一般干部，次要干部。其中以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为代表，简称“孙孔王”。

这些干部不是没有问题，而问题是非主流非本质的，不是路线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干部绝大多数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集体化，坚持群众路线，反对“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对官僚特权政治，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以地委书记B为首的党内走资派，恰恰在以上方面存在问题，犯了路线错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党内走资派干部整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的问题，运河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惨烈。好多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特别是“孙孔王”，饱受党内走资派（和他们挑动和蒙蔽的群众）的百般折磨，纷纷勇敢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与革命造反派同风雨，共患难。他们的更为悲惨之处，每当党内走资派需要整革命造反派，或者分化革命造反派时，他们都成了替罪羊。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内走资派正式上台，开始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工作，非党内走资派干部的政治处境就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狼狈，除了经济上一般有固定工资收入之外，其他的与广大劳苦群众已无区别。那些提升的，掌权的，暴富的，飞黄腾达的，已全部成了走资派，或者投身于走资派门下的变节分子。

以上“混战一场”的阶段还只是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站在幕前，指

手画脚，声东击西，直接指挥混战，群众或做观众，或当炮灰，但决没有不同声音公开发表，一句话，是党内走资派在运动群众。真正成为群众运动是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党中央通知的发表。这里把“五·一六”通知摘录几段：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

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随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说明“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所有这些中共中央的通知、决定，毛主席的指示，一旦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就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浪潮。1966年下半年开始，那是一个催人动脑子的岁月，那是一个亿万人民群众独立思考问题的岁月。在那个时代，共产党的各级官吏的指挥已经失灵，毛泽东思想的召唤就是最权威的号令。

由于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和巩固，人们没有衣食之愁，没有生老病死之忧，没有失学、失业的桎梏，大家心情舒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有道理，说到就能做到。想给谁贴大字报，只要拿出纸和笔（这些都是免费供应），会写几个字，就马上可以达到目的。从家庭到单位，从学校到工厂，从田间地头到街道马路，到处都是大辩论的战场，一切丑恶现象都成了过街老鼠，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人民大众的口头语。这样，也只有这样，才体现了群众运动，才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群众运动，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了，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就分成“革”与“保”两大派。操纵、影响、利用保守派与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群众斗争，党内走资派渔人得利，运河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情况是一

样的。

革命造反派是最先觉悟和认识到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伟大目标的。正是因为最先觉悟，最先起来斗争，所以矛头最先指向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一开始是质问他们为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批《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不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不批党内走资派。更多的质问是：为什么压制群众，不让群众贴大字报，不让群众开批判会，不让学生上街宣传。革命造反派就这样冲杀出来了。

由于运河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和全国各地的走资派一样，害怕群众，甚至仇视革命造反派群众，认为闹事的学生是“野心家”，是“右派翻天”，“攻击共产党组织就是反革命”等等。并蒙蔽一些思想保守的群众，围攻、谩骂革命造反派，直至动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这样，革命造反派就与党内走资派严重对立起来，展开生死搏斗；党内走资派就制造了“革”与“保”的一场群众大混战。

这个时期运河地委驻地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主要有运河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运河二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运河师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鲁南红卫兵联络站》，在工人方面则是《红色劳动者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劳”，还有“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文艺造反司令部”，等。

有人把文革中的造反派与 1957 年的右派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首先，革命造反派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派，即反对走资本主义

道路，反对复辟倒退，而右派是仇视搞社会主义革命，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能因为他们都是给当权派提意见而划上等号，更不能因为刘邓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分子”，就认为革命造反派是和 1957 年的右派“同命运的”，“有共同的社会基础的”，都是“对中共现存制度不满的反抗”。其次，革命造反派与 1957 年的右派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在毛泽东时代，右派一直没能彻底翻身，面临的只能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最后摘掉压右派分子帽子（打错的右派进行甄别除外）。而革命造反派有不少得到重用，从生活的地层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尽管文化大革命有多次反复，毛主席总是关心、爱护革命造反派的。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开始，1957 年的右派得到彻底翻身，绝大部分得到提拔重用，甚至当上了国务院总理，特别是愈坚持右派观点的愈成为社会精英，政治和经济，名誉和地位，双双丰收。而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派则受到愈来愈严重的迫害，不少被投进监狱，甚至杀头，陷入了万劫不复。只有改变了革命造反派初衷的变节分子才换得主人的一点残羹剩饭。即使全体国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提高之后，坚持革命造反派观点的人仍被列入另类，毫无政治地位可言。

诚然，革命造反派中也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人，甚至当年的“摘帽右派”、“内定右派”也加入造反队伍。这，一是体现了毛主席“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二是说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是文革的大方向，一般群众，主要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群

众，只在运动中自我教育，后来更提出“斗私批修”。不过，这类人，除表现特别突出的，大都不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这一点，不唯运河地区如此，全国各地大都一样，下面摘录一段箫羽 2000 年 1 月 31 日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发表的《我眼中文革》，以为佐证：

“前不久，我父母来探亲，谈起文革，说了我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事情。起因是我老爸在当地图书馆看到一本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是香港人写的，看的津津有味，而后说这些书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忆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学的造反经历。我极为惊讶，原来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造反派。据我爸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尤其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被团干部压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参加了造反派，当然，这些人也很快靠边站了，不过我爸回忆说，当时还在各处写写文章，并没有挨批，因为他不是运动的目标，而且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工人们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来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自始至终对工人很有感情。”

与革命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在运河地区有个演变过程。1966 年 8 月之前，各学校各单位的红卫兵都是官办的。所谓官办，就是从运河地委到各级党委，为了应付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上级指示，由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等出面成立红卫兵，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等。这些官办组织，当然是唯各单位领导之令是从，按照领导意图进行“破四旧”，批判“牛鬼蛇神”，在 1966 年 6—8 月份，运河地委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黑指示，从上到下派出工作组，具体操纵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把批判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群众，在学校则指

向广大教师和部分学生。遵照刘少奇“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中学教师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期间，有成百上千的群众，被打成“右派”，“野心家”，“黑帮”，“牛鬼蛇神”，“坏分子”，查三宗问五祖，广大群众都立了档案。谁要不听党委和工作组，就成了打击的对象。搞得人人自危，大气不敢出。一些出身好、跟得紧，被领导圈定的所谓“左派”，成了各种组织的骨干。应该说，以上出现的群众组织都是保守派。

保守派的分裂是从 1966 年八月下旬。随着“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深入宣传学习，再加上外地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大串联，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武装了群众，大部分群众、革命师生都冲杀出来造反，保守组织的队伍逐渐缩小，其骨干主要是当权派的红人——团干部、党员、劳模、积极分子等。不能说当权派的红人都是“老保”，但保守组织的主要成员确实都是当权派的红人。他们受到升学、提干、长级和生活上各种特殊待遇的诱惑，得到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利害关系的暗示和忠告，成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私有观念的俘虏，也不乏忠君报恩思想的腐蚀和愚弄，所以他们日益与一般群众，与广大劳动人民疏远了关系，安于现状，总认为革命造反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认识不到革命造反派是在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他们看不到党内走资派对广大劳动人民新的剥削和压迫，看不到党内走资派大搞修正主义、竭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不闻不问，他们理解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是党内走资

派的一面之词。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改变这种制度。”保守组织表面上是保当权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地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组织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党内走资派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发起一次又一次反攻倒算的马前卒，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当然，保守组织中的广大成员本质上是好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受蒙蔽的，是可以觉悟的。运河地区到1967年1月，保守组织“铁扫帚”等的分裂瓦解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到了20世纪末，当复辟资本主义的洪水席卷中华大地的时候，原先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除个别加入“既得利益集团”之外，反而更加痛恨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示出较高的阶级觉悟。

由于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混战一场”阴谋的实施，在第三到第六阶段，主要依靠操纵、指使保守组织来进行，失去了公开出面领导“混战一场”的大环境，所以“混战一场”的效果越来越差。“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使他们只有招架之力，已无还手之功。相反，意气风发的革命造反派正期待着革命风暴注入新的活力，张开双臂，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九、为“一月革命”高歌

掀起新的革命风暴的活力终于来了，这就是上海 1967 年的“一月革命”。

严格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不是党中央所在地的北京，而是有数百万产业工人的大上海。

毛主席早就说过，北京是出官僚的地方。共产党掌权之后，新的官僚体系开始形成。这些共产党的官僚，首先需要的是等级制度。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必须严格上下级制度，下级和普通党员及一般群众，决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强调“秩序”、“纪律”，强调“一级领导一级”，“内外有别”等等，就是反对“乱”，怕乱了他们的阵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毛主席置于“宝塔尖上”，名曰尊重，实为架空。毛主席不能和群众直接见面，毛主席的指示不能和群众直接见面的恶果就是“篡改”。见面也可以，需一级一级地传达，一级一级地布置，使一切都符合官僚体系的要求之后才行，须知这样一来，一切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修正主义货色就可以从中大售其奸。人所共知的，1959 年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给生产小队等写的信遭到邓小平等人的封锁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由于写这封信，也成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一个把柄——说毛主席“擅自给基层写信”，是“独断专行”。可见官僚体系多么森严。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要用马列主义，要用巴黎公社的精神，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样，毛主席就和共产党的新的官僚体系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做

过多次努力，但成效甚微。这次他下决心冲破束缚他的牢笼，依靠他的战友和夫人，到上海开辟阵地。这样就出现了上海的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拒不转载，影响到全国也不转载的尴尬局面。

毛主席是一位认准目标百折不回的英雄。他既然选定上海作为发起进攻的阵地，就决不会退缩和妥协。不论是利用党的主席的权力和个人威望，让周恩来出面支持，还是下令印小册子向全国发行，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

选择上海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进攻阵地，当然还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张春桥是自己的得力部下。

果然，阵地没有选错。“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彭真的北京独立王国被攻破了；麇集了共产党内官僚体系的刘、邓老巢也吃了败仗。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仍然是这个坚强阵地首先发起冲锋：1967年1月4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向上海旧市委、旧市人委中的走资派展开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1月5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随后，1月9日，毛主席对上海的夺权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

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月16日，《红旗》杂志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一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进行夺权斗争。毛主席不只一次说过：“过去革命是靠军队解放的，机关这一套机构，我们只派了少数人去，大部分是留用人员、新招的人员。这样的机构不是工人、农民闹革命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容易保留封建主义，容易出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在1964年10月2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也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夺权问题的思想，只不过由于自上而下地进行，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所以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在批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说：“这是20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第一次显示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思想。8月8日毛主席主持通过的“十六条”，虽然用的“接管政权”四个字，也有夺权的意思。到了1967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发生对夺权的不同意见时，毛主席说：“不要分了，仔细分马上也分不清楚，把权夺过来再说。”“对待干部应该有五种办法：一种是全部改组，第二种是监督留用，第三种是停职留用，第四种是撤

职留用，第五种是撤职查办。这些办法到运动后期再去分。现在先把权夺过来。”所以，毛主席一直教导大家，要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必然要有夺权斗争。

这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春风吹到运河地区时，运河的自然天气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革命造反派虽然扬眉吐气，但对于夺权还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喊喊冲冲惯了，真正坐下来研究政权问题，还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个时间。而当权派的威风已被打下去了，地委书记、专员、市委书记、市长们，如今见了红卫兵或造反派头头，都是毕恭毕敬，不但半点架子也没有，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党中央毛主席是群众运动的靠山，如果再和群众作对，这些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派，会顷刻间吞噬了他们。所以这些当权派已不把权看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目前难关，以后再说。

在这种形势下，满脑子都是全国各地夺权消息的运河地委驻地的十几个革命造反派头头，有工人，有贫下中农，有剧团的，更多的是各学校的学生，主要包括运河一中，运河二中，“鲁南红卫兵联络站”等，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于1967年1月23日至2月5日，分头行动，把地委、专署两大院的权夺了过来——其实只不过拿了十几枚公章而已。运河地区所辖12县市的革命造反派，也进行了类似的夺权行动。

不过，不能小看拿到十几枚公章的行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完全由群众自发地进行的一次革命行动。它蔑视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对

国家政权神话的尊严，它蔑视了共产党政权近二十年形成的官僚体系的权威。它把政权看成人人可以触摸，人人可以掌握，人人可以运用的一种管理机构，这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学说，包含着伟大的共产主义萌芽。

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就应该逐步消灭“国家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成废物”——马克思在评价和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

所以，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中参加的夺权行动，是怎么赞誉也不为过的。正因为如此，党内走资派对这次革命行动的敌视，对革命造反派百倍增长的仇恨，对文化大革命百倍疯狂的反扑，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啊！政权可是命根子啊！可惜，革命造反派还没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此时的运河大地，多么需要春风化为细雨，把火热焦渴的心田滋润，给这些不谙事世、不懂政治斗争险恶的革命造反派出注意想办法，把权夺好掌好用好，把运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推进一步。

然而，一场早春的寒流正向他们迎面扑来。

第二部分 反“二月逆流”大搏斗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的推动下，一举夺了中共运河地区委员会、运河地区行政公署的权。“一月革命”这块大石头激起的千层波浪，影响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既有汹涌澎湃、万马奔腾的革命浪潮，也有旋涡、险滩和暗礁；既有冲决“封、资、修”的洪流，也有淹没人民生命财产的恶浪。

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经常教导革命的人们：“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政治大革命，必然要进行夺取斗争。问题是由谁夺权，夺谁的权。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二、三十年，残酷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实已使大家比较认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是“非常及时的”，具有“伟大的意义”，也不一定，甚至不愿意认识清楚，有的认识还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异，除了认识水平上的不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他们把“权”跟个人利益已融为一体，“一月革命”要夺权就是要触及了他们的利益根本，平时口头上说的，大会上讲的，什么“自己革命完全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既然如此，那么只要符合革命目标，谁掌权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只要是真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让中国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又为什么不能从党内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手中把权夺过来，让他们掌权呢？！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

导的，那么革命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和先锋队，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就是理所应当的。毛主席在“一月革命”后一再指示：“夺了再说”。意思是不管原先是不是党内走资派掌权，先由革命造反派把政权夺过来，再逐步发展、巩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政权。既然如此明确，为什么还会出现为题，掀起了那些波澜呢？

先看中央上层。即使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存在糊涂：他在首都十万人声援上海“一月革命”的大会上说：“我们只能夺黑帮分子的权，。。。。。。对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干部，不能笼统用夺权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打击面太宽了。。。。。”

毛主席随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书生气十足，不懂得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不从政权上解决问题，就是头号大傻瓜。”并说：“上海的夺权经验很好嘛，当前的任务就是夺权。政权再不能停留在走资派手里了，那样下去，文化大革命运动还会夭折。”

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毛主席最后总结说：“对于干部，不同类型分别对待，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现在的任务就是支持左派把权夺过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上海的夺权，就给这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

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的，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掌权的干部尤为重要，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人民批评你没有掌好权，把权从你手里夺过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等到你认识了错误，接受了教训，又具备了掌好权的条件，人民又会把权交给你掌握，这不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的本质区别么？这不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谆谆教导的么？

为了适应夺权斗争的形势，毛主席在 1967 年 1 月 21 日给林彪写信：“要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指出：“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同时《决定》中还说：“重申人民解放军不能成为一小撮走资派的防空洞。”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1967 年 1 月中、下旬，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斗争出现了可喜的局面。1 月 14 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太原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权；1 月 22 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1 月

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1月31日“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宣告“夺权委员会”成立。这些夺权斗争，《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并发了社论，表示支持和祝贺，也得到了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支援。

至此，似乎夺权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就是革命造反派，就是反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刘、邓工作组，斗刘少奇、邓小平及各地党内走资派、当权派的积极分子，这一点认识并不一致。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一种观点，刘、邓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又是另一种观点，还有大量的认识不清的中间派。

单就军队上层领导人就有以下言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这是把“一月革命”风暴，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斗争看成“混乱得一塌糊涂”，把革命造反派到军区要躲在部队的走资派进行批斗说成“冲击军区”。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又说“对于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右派造反”这是污蔑革命造反派的老调，所谓“哄抢档案……”是强加给革命造反派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造反派实行“镇压”“决不手软”才是目的。

在军队和国务院都很有影响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军委副主席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

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跨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中央文革小组天天喊着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为什么上海就不准给张春桥提意见？”谭震林口中的群众是反动组织“联动”中的高干子弟，是保党内走资派的受蒙蔽的群众，他的天就是共产党的官僚特权统治，他想反对张春桥，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否定夺权斗争。

从湖北麻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领导人李先念，当时在国务院工作，他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是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斗争中的一条主线，因为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具体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肯定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功绩。

陈毅说得更加露骨：“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指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他们为什么冲锋？因为已开展了夺权斗争，官僚特权可是贾宝玉脖子上的石头——命根子，你们革命造反派可是夺不得的，你们要夺，我们就拚命。

时机终于到了。

以徐向前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军委个别人借着贯彻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又于 1 月 28 日制定了“中央军委八条”。“八条”从字面上看是好的，但加重强调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面，为

党内走资派利用军队支左之机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找了借口。所以在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十条命令”，毛主席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第二个时机是，1967年2月16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了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即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辩论。

现在把山西作家师东兵在《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②中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主要发言摘录如下：

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高干子弟统统挨整（指镇压‘联动’），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

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1966年国庆讲话（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引者注）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

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

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余秋里说：“我主张一定要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路线（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做法——引者注），不然就没办法继续工作。”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引者注）达到了。”

……

这次怀仁堂会议之后，以上发言者纷纷行动，向自己的部下鼓劲，向自己的同事吹嘘“打了一个大胜仗”。徐向前更是以全军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吧，“现在有了尚方宝剑（指中央军委八条），左派右派由你们定，他们自封的不行。”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第一次支“左”开始了。

正如毛主席的女儿李纳说的：“现在左、中、右的界限很难划分。一般来说，各地军区或驻军都把听话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拥护军队的群众组织作为左派来支持，而把那些敢打敢冲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派当作右派来镇压，所

以革命又有夭折的危险。”

于是，青海的赵永福（青海军区副司令）在叶剑英的支持下，操纵保守势力，对青海省已被革命造反派夺的权进行反夺权，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革命造反派，制造了 1967 年“2·23”惨案；

四川的李井泉，与邓小平关系特别亲密，每次上北京都给邓小平送礼，听到邓小平被批斗，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闻风而动，开始了四川全省的“二月镇反”，出动军用飞机散发传单，甚至下令开枪打死了红卫兵；

在内蒙古，迫害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怵目惊心；

.....

1967 年 1 月底，运河军分区贯彻“中央军委八条”的会议由军分区政委 E 主持召开。E 与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地委书记 B 关系密切，早就对革命造反派整天批斗 B 感到不满，只是出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禁令，没敢公开站出来支持 B，不过对 B 及运河地、市被批斗的当权派，竭力给予保护，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并且让在运河二中上学的儿子注意学校动向，反映学校情况。他预感到军队有一天会出来稳定形势。

当听到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影响下，夺了运河地委、运河行署的权，E 非常气愤，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真是翻天了！”

所以，毛主席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假的，实际上早就介入了，关键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在军分区这次会议上，E 带头分析了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认为“红劳”（运河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势力太大，革命造反派人数太多（占 80%以上），不能象别的地方那样把革命造反派统统镇压下去；再加上中央支持青岛的王效禹造反，使得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占了上风。所以必须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来对待已经夺权的革命造反派，这样才能保护以运河地委书记 B 为首的当权派使他们尽快参与领导运河地区的工作，从而维护运河地区的稳定，不让“右派”翻天，不使一些大大小小“野心家”的阴谋得逞。根据这个基调，制定了几条措施：尽量把被批斗的当权派都解放出来，支持他们领导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对群众组织衡量的标准是：凡是听本单位领导话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能够拥护军队支左人员的工作的群众组织就是左派组织。那些敢打敢冲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不是“有点么”，就是“为点么”，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再不就是野心家，他们的组织必须解散；对于闹得比较凶的运河一中、运河二中等学校的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和教师必须进行批斗和镇压；对运河“红劳”中的工人造反派头头，影响大的先稳定住，尽量做好转化工作，使他们改变革命造反观点；对其他革命造反组织的头头一律镇压，决不能手软。要求所有参加支左的人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心明眼亮，决不能发慈悲。

以 E 为代表的运河地区第一次支左人员，就是带着这种观点，按照事先定好的框框，以军人的纪律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介入了运河地区 1967 年二月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思维方式仍是套用“57 年反右”的习惯作法，他们的认识仍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和

禁锢，他们的思想观点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刘、邓工作组的那一套。

1967年二月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天空乌云密布，形势十分严峻。

二、革命造反派的劫难

“为什么要造反？”对于每个参加革命造反派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现成的答案就摆在那里：“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细究起来，答案就决不是那么简单。

任何活动，特别是重大的政治活动，参加者的行为一定是外因通过内因在起作用。“毛主席的号召”是个强大的外因，但“响应不响应”，以及“怎么响应”，完全由个人的内因决定。

保守组织的群众也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常挂在口头上的语录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他们理解的“党的领导”就是“各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各单位党的书记的领导”。

革命造反派则不然，他们认为“党的领导”应体现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领导”，应体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党的领导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导是“对工业、农业、商业及其他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逐步深入的时候，党的领导是“狠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巩固社会主义，反对

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支持和带领群众向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斗争，并革他们的命，夺他们的权”。如果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能够做到“正确路线”在革命不同时期的要求，能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那么他就能代表“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否则他就不能代表党，只能代表他自己，只能代表“错误路线”，就应受到批判和抵制。这是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

当然，革命造反派的上述认识，只是就整体而言。各人参加革命造反的思想决不都是上述认识的觉悟程度。不过，达到上述认识的应该是革命造反派的本质和主流，代表了革命造反派的方向。那种由于本身受压（如出身不好，表现不好而受歧视，受批评；或者错误领导造成的受压、受迫害等。），个人利益达不到目的（如不能入党入团、工作不如意、不能当干部，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家族、派别、小团体，等。）而参加革命造反的大有人在。事实证明，抱着不纯动机参加革命造反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淘汰——文革中一次次反复时的叛变者、真心忏悔者、彻底投降者；资本主义复辟时的拥护者、高唱赞歌者、助纣为虐者、贪污腐败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等等。

当 1967 年“二月逆流”到来时，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就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一部分参加夺权的革命造反派头头，受到以运河军分区政委 E 为首的支“左”人员的强大压力，得到“可以继续留在革委会”的

许诺,还有各种利益的诱惑,再加上有的人对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革命造反本来认识就不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于是就转向了

而绝大多数坚持自己的观点、革命造反决心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群众,被支“左”人员视为“捣乱分子”“右派分子”“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的镇压。

镇压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

1、 大造舆论,彻底否定革命造反。支“左”人员通过召开大会,利用全副武装的宣传车,印刷传单,小会谈话,宣讲“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暴露牛鬼蛇神,就是让资产阶级右派跳出来表演,就是抓个人野心家”等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谛的谬论,并声嘶力竭地质问群众“你们造谁的反,革谁的命?你们造无产阶级的反,革共产党的命,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迫使广大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承认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上了坏人的当。这时保守派趾高气扬,以保当权派(包括走资派)为荣,以“遵守纪律”“服从、听话”为荣,从而更加坚定了保当权派(包括走资派)的决心,认为“当权派(包括走资派)是打不倒的”,“各级党委是执行正确路线的”,“解放军(只是个别支左人员)说话最管用,听支‘左’人员的话没错”,并自我吹嘘:“保皇派不好听但管用”(确实管用,运河一中一个保守派的头头,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党内走资派就许诺她以后可以到运河市委当干部,后来果然实现了)。

所有这些舆论,都颠倒黑白,混淆了是非,否定和歪曲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2、1967年2月10日，运河军分区支“左”人员大逮捕开始，全副武装的人员，开着汽车，高音喇叭播放着“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如临大敌一般来到各单位进行逮捕革命造反派。

据统计，光运河二中就逮捕了14名红卫兵负责人和革命造反派观点的群众，运河一中有八人被捕，十几人被传讯，整个运河地区逮捕了1150余人，有数百人直接投入监狱，有的关押长达两个多月。

在监狱里，革命造反派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凡是不低头认罪，不承认“造反是错误的”，不承认“有个人野心”，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有一位工人革命造反派杨××，因为坚持认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是不承认有任何错误，结果被戴上重刑犯才戴的脚镣手铐，手铐被嵌入肉中，勒住手脖子，出狱后很长时间肌肉腐烂，至今留下深深的疤痕，落下终生残疾。

3、全运河地区有数万名革命造反派观点比较明朗，造反精神比较坚决的人，不论是不是头头，一律打入另册，作为审查对象、帮促对象，让保守派的骨干和听话的干部去做转化的工作，叫这些人“迷途知返”，并内定为“不可重用的人员”，即使原先是党团骨干，也因为造反丧失了政治生命。

4、全运河地区有数千名大大小小的革命造反派头头被批斗，勒令写检查、写“请罪书”，低头“向毛主席请罪”，有的还需享受“低头、弯腰、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的待遇。

5、凡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这样那样问题而又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的人，是打击的重中之重。本人被逮捕、遭殴打、受批判、受凌

辱不算，还要株连家庭、亲属，抄家封门更是屡见不鲜。

6、凡是支“左”人员认为是“重灾区”，如运河一中、运河二中，各县一中，运河电力二处、运河第二印刷厂等单位，都多次派全副武装的运河军分区宣传车，配上高音喇叭，去游行示威，高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以起到威慑的作用。

7、有的革命造反派刚刚从外地串联回来，连家也没有回，就被逮捕，被批斗、被隔离审查。有的直接拉到军分区，关进黑屋，用手枪顶着脑袋进行威逼恫吓，不承认“错误”的不给饭吃。

8、就是对投案自首的革命造反派也不放过。如运河一中几位高中学生，被捎信说：“你们赶快去军分区请罪，否则就逮捕你们。”这几个人为了逃脱被逮捕的厄运，不得已去了运河军分区。一位参谋人员见了他们又批又骂，还拿出手枪威吓，逼着写了“请罪书”，“保证书”，后又被关了一夜，第二天才放回去。

9、运河地区在 1967 年二、三月份有数百名革命造反派不堪忍受批斗和镇压，惧怕各种威胁，被迫逃走他乡，成为“盲流”，成为“乞丐”，甚至逃入东北森林、新疆戈壁滩，成为“黑人”。时间最长的有几年，短的也有一两个月。

10、用强行“恢复上课、维护秩序”“加重生产任务，严格严肃纪律”等手段，来对付学校师生和工厂工人的革命造反情绪。谁稍有反抗，立即遭到加倍惩处。

11、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在 1967 年的二月到三月，短短二十多天，全运河地区就有大大小小近百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被宣

布为“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为镇压群众制造了借口。

12、在运河军分区政委 E 的策划和鼓励下，泡制了革命造反派冲击军分区、冲击武装部、哄抢国家档案的谎言，给革命造反派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煽起不名真象的群众对革命造反派的敌视。

1967 年二月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是从上层掀起的，到达运河地区是愈演愈烈。无论是否是被所谓支“左”人员分化的革命造反派，都遭到了一场真正的劫难，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是肉体上的，有的既有精神上的又有肉体的，还有物质上的，家庭、亲朋好友方面的。这场劫难的制造者仍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不过这次是与地方上的党内走资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运河军分区内的党内走资派在后台指挥罢了。而制造这次劫难的群众基础仍然是官僚特权统治下形成的保守派。

三、认识“复辟逆流”

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心连心。每当革命造反派受压制受迫害的时候，毛主席都及时地给予解救，给予支持；每当文化大革命面临转折关头，毛主席都指明道路，让革命造反派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毛主席是革命造反派的靠山。

1967 年的“二月镇反”，马上反映到党中央，反映到毛主席。

周恩来认识到“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虽然晚些，但意义重大：一是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对全国文化大革命负有直接领导之责，二是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代表着中央那部分热衷于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

在1967年三月份，周恩来关于“复辟逆流”的讲话有四次，前三次都是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讲的。第一次，3月20日，周恩来谈到当前形势时说：“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第二次，3月24日，周恩来给军队支左干部讲：“目前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第三次，3月27日，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发言插话中说：“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主要的斗争目标。”第四次，3月28日夜，周恩来在接见国家机关二十一个单位的代表时说：“这次夺权是19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这样就肯定了“一月革命”中的夺权斗争，反击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周恩来的这些明确讲话，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造反派英勇地进行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其实，最早发现“复辟逆流”的是江青。早在1967年1月下旬，江青与《解放军报》革命造反派座谈时说：“你们发觉没有，军队支左以后，各地的造反派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许多造反派纷纷向中央文革求救，你们应该下去调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中央是有那么几个人，明里暗里捣鬼，作小动作。”并说：“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什么。过去搞了多少场运动，总是他们在整人，上面整下面，一级整一级，所以那种革命好干。现在发动群众来整他们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变成阻力。”

毛主席觉察到“复辟逆流”的严重性是从1967年2月16日谭震林、

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大闹怀仁堂”这件事上。

关于“大闹怀仁堂”，毛主席在2月18日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

谢富治、叶群等人，非常激动，非常气愤地讲过以下这些话：

“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新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从毛主席以上满含感情、旗帜鲜明的讲话中，我们体会到：①1967年2月那股“复辟逆流”确实是从中共上层掀起的。②“复辟逆流”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③表明了毛主席反击这股“复辟逆流”的决心。④毛主席的有些话不幸被10年后的历史验证。⑤当年，毛主席从心里还是想挽救“大闹怀仁堂”的人。

毛主席不光作了以上讲话，还立即让周恩来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这股“复辟逆流”，批判、帮助、教育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随后又于1967年3月开始安排召开军级以上干部会议，解决支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推动全国的反“复辟逆流”运动，毛主席2月28日在天津市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材料上正式批示：全国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

3月9日，毛主席又让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他的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一九六七年三月底，毛主席又指出：二月那股逆流要批，要和刘、邓路线结合起来批。

直接代表全国各地受到镇压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央会议上进行控

诉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

江青在 1967 年 2 月 26 日开始的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你们（指谭、徐、陈等人）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借口保护‘高干子女’，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现已查明，贺龙就是‘联动’的后台之一，他不光有言，而且有行。他的家供‘联动’分子开会，他的汽车成了‘联动’的交通工具，他还为‘联动’提供了大量经费。”当说到革命造反派被镇压的情景时，江青流泪了：“你们（指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人指使的所谓‘支左’人员——引者注）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 18 岁的孩子，他们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刚刚走向社会，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弹下，而是死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你说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件事？你们剥夺了革命群众造反的权利！毛主席说‘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你们为什么不听？你们为什么要镇压我们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也不委屈你们！为了这些无辜牺牲的红卫兵，我恨死你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为革命小将做主！”

康生的发言：“2 月 16 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

主义复辟的预演！”“谭震林口口声声保护老干部，那么这份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的文件是不是你搞的？”周恩来接口说：“是谭震林搞的，这实际上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这个文件我也有责任，没能把好关。”

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也先后发言说：“青海、四川、内蒙古等地出现严重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个别的现象，是自上而下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这个逆流的后台就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还有一些和他们思想体系保持一致的人，他们说了刘少奇、邓小平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做了刘少奇、邓小平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说他们搞复辟逆流一点也不过分。”“谭震林在农林口搞了个‘一、一七’假夺权，完全是他一贯的形‘左’实右的翻版！”“徐向前、叶剑英直接插手支持了青海的赵永福、四川的李井泉，镇压革命造反派！”

运河地区的干部，包括当地驻军的负责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到“复辟逆流”，甚至运河军分区支左人员中，各县武装部领导人，也有很多不同意运河军分区政委的一些做法，认为不符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教导。如果把革命造反派都镇压下去，谁还敢搞“大民主！”那还不成了“一言堂”，那跟不搞文化大革命还不是一个样？只不过这些意见和想法他们没有说出来。地方上的干部还在靠边站，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军分区、武装部的干部、战士有绝对服从的习惯，不敢公开违犯纪律。

真正为运河地区“复辟逆流”焦虑的干部中有运河地委常委 A。A

曾为“一月革命”高兴过。每天阅读报纸和收听广播是 A20 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次看到听到关于“一月夺权”的消息和文章，他都反复阅读，反复收听，认真领会精神实质。通过“一月革命”，A 基本上理解了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对于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别人只看到“乱”，A 却看到了“治”。他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文章中，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夺权问题的最新指示里，他看到文化大革命正沿着“联合——夺权——解放干部——打倒私字——巩固政权”的正确道路进行。可就在这个时候，运河军分区的支“左”人员开始镇压革命造反派，打乱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A 想，毛主席的本意是让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是经受路线斗争锻炼，二是支持革命造反派搞好大联合，夺好权掌好权。为什么叫支左？就是让解放军去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那么，如何分辨群众组织的左和右，就看部队官兵，特别是支左部队的负责人的阶级觉悟，路线斗争觉悟，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你如果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你就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动乱，是右派翻天，是个人野心家跳出来，夺老干部的权；你如果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就会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罪恶企图，你就会为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叫好。

运河军分区，作为地方武装，与当地走资派、当权派，一直休戚相关。如果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他们理所当然地应站在受批判的当权派、走资派一边。但 A 没有想到运河军分区政委 E 这么狠

心地去逮捕革命造反派，残酷地镇压各学校造反的红卫兵学生。他愤怒了，尽管他的愤怒只能和地委书记 C 等个别人交谈、表达，但他看不惯地委书记 B 一伙人听到逮捕造反派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样子，并且坚信毛主席一定会出面制止这种倒行逆施的镇压，文化大革命一定不会开倒车，历来镇压群众都没好下场，A 认为 E 在步刘、邓和运河地委书记 B 的后尘。

果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肯定了山东的“二·三”夺权，以及山西、黑龙江革命造反派的夺权，并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问题——革命造反派的群众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代表联合夺权、掌权的问题。这样，就更加坚定了以 A 为代表的革命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坚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对军队支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人民解放军会真正支左的，运河军分区的错误做法一定会得到彻底纠正。他们决心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一起反击“复辟逆流”，夺取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四、军队的转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一致批判了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中央上层的斗争急转直下，完全成了一边倒的形势。

尽管不能说谭震林等人都从思想深处认识了“为刘邓路线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复辟逆流”的错误，但表面上，有的几次痛哭流涕地认了错，有的认认真真、反反复复作了检查，有的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他们都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听从毛主席的教

导，努力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这次批判会进行二十多天。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判他们三人的，连叶剑英等人也作了检讨，开始向中央文革靠拢，都不敢和他们三人说话了。会议结束时，有人提议，把这次批判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没有同意，因为里面有的问题牵扯到周恩来总理。

1967年3月20日，中央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明确宣布：今后对支左工作中支了右的情况，中央决不姑息，一定严肃追究责任。

实际上，这次军以上干部会议是个转弯子会议。会议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精神，纠正了对“乱”的错误看法。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经过表面上的一个乱，把党内走资派，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得狼狈不堪，把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在这个乱的过程中冲杀出来的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正确对待，大力支持，即使他们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也要在运动中逐步克服，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决不允许受党内走资派的指使，随便抓人，更不允许开枪。

会议同时通过具体解决地方问题，来提高支左人员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左派的能力。在会议期间就彻底解决了青海问题，认识到青海“八一八”是革命造反派，必须支持他们同革命干部和军区领导刘贤权等人的联合夺权。从而为全国支左工作树立了样板。

为了尽快解决军队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支左人员

认识水平，1967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连续下达文件，《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社论。

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一一七号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文件强调指出：“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迫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在文件中，毛主席特意加了这么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从毛主席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真正的群众观点，这与当时和后来的修正主义做法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社论在历述了红卫兵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之后说：“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问题，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社论在分析形势时说：“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

社论最后说：“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的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打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1967年4月6日，经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正式颁布。

《十条命令》防止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力的反扑，更加明确地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

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这些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态度的转变，确立了军队支左的大方向。

在山东、在运河，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山东的“二·三”夺权得到中央承认，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也表态“坚决支持”。但地方军分区，县武装部与本地当权派有着共同的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支左支错的，受党内走资派影响的，还一时转不过弯来。所以济南军区决定调换支左部队，由与地方当权派少有瓜葛的野战部队接手支左工作。

于是，运河地区的支左工作开始由野战部队的师级单位 6185 部队接替，各县也由相应的野战部队团级单位负责。为了支左工作的连续性，个别认识好的，真正支左的第一批支左人员也留下一部分继续协助工作。

但是，以运河军分区政委 E 为首的主要支“左”人员并不认为自己支左错了。E 顽固地认为：对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些革命群众）就应该镇压，决不应该支持那些不听话的革命造反派去乱批乱斗运河地委、运河行署和运河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

所以，运河地区纠正前段支左错误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E 领导的支“左”人员迟迟不撤出，新的支左人员无法接替。这样，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九月份，运河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虽然迫于压力，从 4 月下旬开始，E 不得不陆续地无条件地释放了被逮捕的大量的革命造反派和个别的一般群众，但每次放人都要堂而皇之地宣称：“逮

得有理。放得也有理”，“抓得对，放得也对”，等等。并且，E 等人还对他们支持的一部分群众组织（原先的保守派和后来分化出去的少数造反派）作了布置，给他们撑腰打气，让他们继续坚持自己斗争的大方向，“你们没有错”，“我们是永远支持你们的。”

路线斗争，在中央，有毛主席亲自出面，比较清楚，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地方，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是非不易分明，解决起来相当缓慢，没有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不行的。运河地区的支左工作正是这样。无论是运河军分区，还是驻运河地区的野战部队，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两条路线斗争都很激烈。何况，原先的地方当权派，不是地委书记、专员，就是市委书记、市长、县长，现在一下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的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有的成了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部队指战员总得有一个学习、认识、提高的过程。更何况，部队中也有象运河军分区政委 E 那样的党内走资派，专门与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和地方走资派沆瀣一气，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也为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曲折反复埋下了祸根。同时，运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受山东省受全国形势的影响和制约，虽然 1967 年 4 月份路线斗争阵线已十分清楚，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想取得胜利，还有漫漫的征程。

正当 1967 年 4 月份，全国反击“复辟逆流”的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中共中央上层的微妙变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联想。

1967 年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在北京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上午，毛主席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

英、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一起乘敞篷汽车接见群众。晚上，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庆祝游行的又增加了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之外的所有原中央领导人，当然包括了谭震林、徐向前、陈毅。

这些细节，对于关心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内外的人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影响。知道内情的人认为，毛主席真伟大，对于反对自己、证明错了的人，一样团结在一起，共同工作。毛主席心中只有革命的大目标，决没有个人恩怨；他心中只想着为广大劳苦大众掌好权用好权，决不谋一丝一毫的私利。不知道内情的人认为，这些老干部是打不倒的，毛主席还要依靠他们保自己的江山，革命造反派不要再胡闹了。

对于参加过或了解中南海批斗会的人，或者认为，谭震林、徐向前、陈毅检查得好，已痛改前非，叶剑英等人反戈一击，检举、揭发、批判有功，所以也上了天安门城楼，甚至参加接见革命群众；或者认为，谭、徐、陈不会真心认错，只是迫于压力而已。正如陈毅在战争年代所说：“纠集旧部，东山再起。”现在最要紧的是先过关后报仇，只要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以后就有机会。

对于叶剑英，大多数人认为他高深莫测：向毛主席表忠心最多，拥护林彪最积极，而每次暗地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总少不了他，如果暴露，又转得最快最巧妙。

无论人们有怎样的看法，作为一次政治事件，毛主席对“二月逆流“的处理，十分英明伟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当然，亿万人民群众，是真心实意地紧跟毛主席的，毛主席怎么

说就怎么办，毛主席怎么指示就怎么执行，听从毛主席的安排没错。那些受到镇压的革命造反派也长出了一口气，总算争了个理，总算被放了出来。

但此时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还必须进行苦斗，才能求得进一步的解放。

五、苦斗

运河地区自从 1967 年 2 月 10 日大逮捕之后，革命造反派陷进了万丈深渊。

春节刚过，新年的喜庆还洋溢在人们的心头，就传来了大镇压的消息：造反派错了；某某造反派头头被抓起来了；大汽车上站满了被五花大绑的红卫兵；大街上到处是广播“镇压反革命”的宣传车。于是，不少红卫兵小将遭到家长的责骂，说他们不好好学习，跟着坏人胡闹，落了个反革命的罪名。有的家长甚至把自己的学生关起来，不让出门，怕遭遇不测。

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经过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惧怕镇压的。他们坚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时他们最爱唱的歌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白天里想你方向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

运河一中几个革命造反派红卫兵，2 月 8 日串连回来，感到校园里校外一片白色恐怖。一块革命造反的同学都不见了，碰着个别学生也

是耷拉着脑袋，有的老师象避瘟疫一样躲开他们。大字报栏已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整个校院里冷冷清清。他们象刚从火热的战场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寒透肺腑。

这是怎么了？这是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吗？

他们几个满腔愤懑，决心反抗一下，呐喊几声。于是找了纸张、浆糊、毛刷子，提着墨桶，连夜在运河一中校门南边，太白楼的底座墙上，贴出大字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镇压文化大革命决没有好下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并且咬破手指，写下“造反到底”四个血字，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以表示红卫兵小将的决心。

当然，这几个学生随后被支“左”人员监管起来，逼着他们写检查。

但，这是运河市反击“复辟逆流”的第一声呐喊。

其实，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除了被逮进监狱的需要进行特殊的斗争之外，大家一天也没有“老实”过。

他们在串连，在互相传递信息，在交换各自得到的外地大字报。剥夺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力，他们就到处大唱革命歌曲，大唱毛主席的语录歌；让他们写检查，就满纸乱画，或者去抄写马、恩、列、斯、毛的文章，甚至作些恶作剧，画个大乌龟贴在别人背上；在学校里，红卫兵革命小将被勒令在教室里上课，他们就捣乱，让课上不下去，或者背毛主席语录，打乱他们的复课计划。有的革命造反派教师和革命造反派学生们互相配合，演双簧，使驻校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支“左”人员一点办法也没有。

时间不长，苦斗的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开始冲杀出去——上访。

由于山东省是革命造反派夺权、掌权，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效禹。济南军区支持王效禹，王效禹与山东省四大革命造反派组织——山工总、山红指、山贫指，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站在一起，联合得很好。所以省会济南就成了受压的革命造反派向往的地方，王效禹也成了山东各地受压的革命造反派的靠山。“到济南去，找王效禹去”成了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共同心声。

从1967年3月开始，运河地区各单位，各学校，各工厂，以及广大农村，两三人，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上访人员，穿梭不断地来到济南，来到山东省接待站，来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他们提出的问题，从“革命造反对不对？”“我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运河军分区镇压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反革命组织？”到人个受压受迫害的情况，个别支“左”人员的凶狠和监狱人员的残忍的问题，以及保守派整我们的黑材料，党内走资派进行秋后算帐，等等。谈的人字字血泪，无不义愤填膺，饱含革命的激情；听的人也满腔热忱，给予理解，给予支持，给予帮助，给予解决问题，使上访者感到温暖，获得继续斗争的力量。

这些上访，这些控诉，使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了解了情况，上报中央。根据中央精神，省革委，济南军区下决心解决运河地区的问题。

到1967年4月底5月初，运河地区所有被逮捕的革命造反派和一般群众，都全部无条件地陆续得到释放，并且在不同范围内召开了平反大会。于是，控诉会，批判会相继在各单位、各学校召开，革命

造反派又绽出了胜利的笑脸。

这是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在反复辟逆流中苦斗的最初成果。

但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知道，有了政权才能保证他们不再受镇压，受迫害，并且，政权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死灰复燃，才能达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于是他们开始向运河军分区的支“左”人员在镇压了革命造反派之后成立的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发起冲锋。

革命造反派对这个运河地革委，一开始提出的是“改组”：认为地革委中混进了走资派，执行了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改组，把走资派，保皇派清除出去，把革命造反派充实进去。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地革委在党内走资派的操纵下，继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指向站出来造反的革命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于是最后被彻底砸烂，重新成立了革命三结合的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

这时候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安全由运河军分区以 E 为首的支“左”人员所代表，并由参加运河地区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包括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和被分化出去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红劳”中部分成员）来执行。即使在运河军分区支“左”人员被撤出后，E 仍安排一些人留在这些群众组织中进行幕后指挥。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九月底十月初。所以，正个反“复辟逆流”期间，革命造反派就是与参加和支持地革委的群众组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甚至发生了武

斗。

那么，为什么参加和支持地革委的群众会与革命造反派严重对立，非要斗个你死我活呢？除了党内走资派的暗地挑动和运河军分区个别支“左”人员的公开支持，还有他们本身的原因：

1、他们参与了“二月镇压反”，很怕革命造反派有一天会对自己“打击报复”。

2、他们受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的流毒很深，总认为革命造反派是“二等公民”，是“有问题的人”，现在居然成了反击复辟逆流中正确路线的代表，从心里不服气，看不起。

3、受“阶级关系不变论”的影响，认为自己出身好，根子正，“自来红”，就应该接班，就应该掌权，参加地革委是天经地仪的。

4、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文化大革命马上就要结束了。“人跑长要昏倒，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党中央已发出“正确对待干部”，“实行三结合”的指示，毛主席作了“三·七”批示，学生要军训，学校要复课，工厂、农村要“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搞完了，一切要恢复原样，“地委书记还是地委书记”，“市委书记还是市委书记”，“我们是红人仍然是红人”，“你们革命造反派也不看看火候，还这么闹腾，决没有好下场。”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们集中到一点就是保住这个“在镇压革命造反派基础上建立的运河地革委。”

而革命造反派的认知恰恰与他们相反。

革命造反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当时的正统路线）跟得最紧。革命造反派认为：

1. 我们与参加“二月镇反”、参与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群众组织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有的只是路线之争。大是大非，必须搞清楚，也一定能搞清楚，否则搞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2. 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任何群众组织也不是清一色。革命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有出身不好的，都有个别有问题的人，但他们都不是头头。抓革命造反派组织所谓成份复杂的小辫子，是没有道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判断一个人，主要应看路线斗争，这是新形势下阶级分析、阶级观念的问题。

同时，判定一个群众组织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应该以是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坚定不移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体来说，又有其阶段性，这一个阶段是革命的，下一阶段可能是保守的。正如参加革命斗争的先辈一样，在打倒蒋介石的斗争中可能是干革命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可能是保守的。那么，有没有永褒革命青春永不褪色的呢？有，毛主席就是最光辉的榜样。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但革别人的命，也要时时革自己的命，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更严厉地“解剖自己”，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斗私批修”。无产阶级革命信念，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直到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完整组合。

不能说，当时的革命造反派人人都认识得这么深刻，这么全面，但革命造反派的立场，观点，行动是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准则的，反过来，只有完全符合这个准则，才是彻底的革命造反派，部分符合，在某一阶段符合，都愧称彻底的革命造反派。

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实践，这样的实践要反复进行多次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成功。当然，每次实践过程也不会完全相同。那么，符合这次实践过程中要求的立场，观点，行动的，就是这次的革命造反派，符合其他次实践要求的立场、观点，行为的，就是那次实践过程中的革命造反派（也许那时不叫革命造反派）。但无论有多少次，每次的情况有什么变化，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方向不会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不会变，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不会变。

所以，革命造反派不仅不是“二等公民”，“有问题的人”，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先进人群，是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广大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

3. 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的人，受到一定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好的外在因素。但，革不革命，主要地还是看自己个人。如果出身好的人有优越感，有高人一等的思想，也会成为包袱，成为负担，阻碍自己继续革命。同样，出身不好的人，或者有这方面那方面问题的人，或者曾经受到错误领导迫害的人，固然其先天因素不好，极有可能进行阶级报复，或者进行个人报复，或者坚持错误立场，反对革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人看到自身的不

足，由受批评受迫害感到压力转化为去革命，由自身的所谓“不合理待遇”想到消灭剥削、压迫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根除人间的不平等，从而压力变动力，未尝不可坏事变好事。

所以，保守派“阶级关系一成不变”的思想是错误的，“血统论”是反动的。只有符合唯物辩证法才是正确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这一观点。

4. 革命造反派从一冲杀出来造反，就认定了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右派斗争”，革命造反派决不是右派。毛主席一定会支持革命造反派，一定会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会半途而废，一定会反对各种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一定会镇压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代表人物。

尽管毛主席的斗争策略会有变化，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着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探索和完善。毛主席是真正的最彻底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主席的怀疑就是对真理的怀疑。那些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上了毛主席的当，受了毛主席的骗的人，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激，就是阶级敌人的恶意攻击、诽谤、污蔑和陷害。没有对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信仰，就不配当革命造反派。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革命造反派认识的正确。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对，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一直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至于毛主席逝世后发生的巨变，那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是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出现了挫折。要说

失败，那也是几千年阶级力量对比和较量的一次演进。作为捍卫中国共产党，捍卫中国社会主义纯洁性的一次伟大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永放光彩。

5. 革命造反派认为，改组（后来发展到“砸烂”）镇压革命造反派而建立起来的运河地区革委会，不仅是为自己本身“正名”，也是为毛主席号召的“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正名”。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突破了苏联斯大林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传统和常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去揭发、批判、斗争上至中央，下至最基层的领导干部，这是空前的，这是伟大的创举。

不要说在斯大林当政的苏联不可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哪怕向当权派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视为“反党行为”而遭到迫害，成为挨整的对象。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就是利用他们手中权力，进行“奴化”教育，把各级干部“修养”成“驯服工具”，把群众培养成他们需要的奴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再通过中共严密的官僚机器层层下达指示精神，而是通过“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把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直接地交给每位读者和听众，让人民群众独立地去理解、去认识、去执行。

当各级官员们对重要政治信息资源的垄断一经被打破，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年们，便与中国数千年上智下愚，唯官是从的传统进行了最为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决裂。

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造反派们，不仅不再在官僚面前感到自卑，而且敢于向他们喝三道四，甚至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他们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主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正深入人心，革命造反派已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新人。

对于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对于具有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代新人，其积极意义，是怎么评价和肯定也不为过的。如果认为，利用镇压革命造反派而建立起来的运河地革委是正确的，那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是对革命造反精神的否定，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更是对旧制度，旧传统的恢复。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个地革委必须改组，它的错误必须彻底批判，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的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这就是运河地区广大革命造反派，在 1967 年整个夏秋季节的战斗任务。

六、反“复辟逆流”中的武斗

对于复辟逆流中建立起来的地革委，是“革”还是“保”，形成了两军对垒的严重局面，引发了一次次武斗事件。

运河市区比较严重的武斗事件有“五·一二”，“八·一”，“八·二五”，“一二·一”等，最严重的后果是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革命造反派。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武斗？

从表面上看，是两派群众之间的你争我斗，是争强好胜，失去理性的发作，甚至是私心私欲的膨胀，一切为了“捞稻草”（捞取个人好处），等等，也可以归结为派性，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

但，这不是发生武斗的根本原因。

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对发生武斗的问题作过重要指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对于毛主席批示的理解，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组织工农反学生”。那么是谁“组织工农反学生”？当然是当权派，更明确地说是走资派为了保自己，保护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不明真像的、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工人农民，去斗、去打那些向资反路线冲杀，向党内走资派造反的青年学生。

“武斗”，应该是双方的对打。“对打”才能称之为“斗”。而好多所谓武斗，只是工农斗学生，打学生；保守派斗造反派，打造反派。不明真像的工农、受蒙蔽的保守派，只是工具，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派。

2. “都是错误的”。这就给党内走资派挑动工农，挑动保守派斗学生，斗革命造反派，打学生，打革命造反派，不论有什么理由下了结论“都是错误的”。一开始，“工农”，“保守派”不明真像，那么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广大工农纷纷造反，站到学生一边，成为革命造反派的主力军，保守派已土崩瓦解，党内走资派日益孤立。

3. 毛主席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有的当权派听了，执行了，有的当权派不听，不执行，甚至变换手法，变换形式，继续挑动武斗，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成了“死不悔改的一小撮”。

运河地区的当权派中，就有“死不悔改的一小撮。”这样说，一点也不冤枉他们。

从一九六五年底到一九六六年，他们已作过多次这样的表演：

批《孙安动本》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贯彻彭真的“二月提纲”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派驻工作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和操纵保守派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到了 1967 年的“二月镇压”，大搞“复辟逆流”，更是“顽固不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假“走左人员”之手，挑动群众斗群众。

现在，反复辟逆流中发生了武斗，发生了群众斗群众，是党内走资派这类行为的继续和恶性发展。请看下列事实。

1. 运河地区在“复辟逆流”中成立的地革委，几乎把地委的主要当权派都结合进去了，大都是犯了错误没作认真检查，其中有的就是证据确凿的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他们参加地革委之后，就开始出谋划策，当幕后指挥、做黑后台，挑动原来的保守派群众，仇视革命造反派、去抓、去斗、去镇压革命造反派；分化原来的革命造反派群众，用“封官许愿”，把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群众拉上保护他们自己的战车，成了向广大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的马前卒，成了牺牲品，成了炮灰。

2. 运河军分区政委 E 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党内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与运河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B 沆瀣一气，执行刘、邓反动路线，干了不少坏事。革命造反派对 B 的批判，也触动了他，“兔死狐悲”。这次以支左为名，向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大开杀戒，犯下了累累罪行。

当上级命令他转变态度时，他阳奉阴违，极不情愿地放了逮捕的革命造反派，应付公事地、象征性地给革命造反派平了反。但还是极顽固地说：“抓的对，放的也对。”并告诉地革委中的群众代表：“好好保护地革委这个新生事物。”“军分区支持你们。”“你们好好干，有什么要求及时提出来，我们会尽量满足。”在上级命令他撤出支左工作之后，他暗地里留下少量参谋人员，分散在保地革委的各群众组织中，挑起这些组织和革命造反派进行武斗。所以说 E 是运河地区陈再道式的人物。

最能证明全国武斗是党内走资派挑起来的事例，当数武汉“7·20”事件。1967 年 1 月底二月初，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工人总部”，“二司”等组织夺了湖北省的党政财文大权，武汉军区的支左指挥部也给予支持，形势一片大好。但党内走资派王任重、陈再道硬是跳出来，一个在幕后，一个在台前，命令支左人员不许支持革命造反派，扶植起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发给他们枪支弹药，并派军队和他们一起战斗，把革命造反派打得跑的跑、散的散、逮的逮、关的关。甚至把中央派去解决问题的人员也扣压起来。把毛主席住宿的东湖宾馆也包围起来。事情闹得如此严重，陈再道竟胡说：“这是群众的事，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走资派挑动武斗的一贯伎俩。

面对党内走资派挑起的武斗，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毫不畏惧，而且斗志昂扬，劲头十足。因为真理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革命造反派。从 1967 年 1 月到 7 月，毛主席发表了许多指示，都是直接出面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阐述了毛主席的这些批示精神，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并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山东省的“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也公开地、非常坚决地支持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

当然，这些支持和指导，不是让革命造反派去斗保守派群众，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也没有挑起武斗，而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狠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人会说，都是革命造反派闹事，才挑起了武斗，不然，在各级领导的安排下，老老实实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哪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样说，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因为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陈词滥调。

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地主老财和资本家，不是也指责革命群众闹事，不安分守己吗？不是也咒骂共产党是“土匪”，是“暴徒”吗？如果说当年的共产党是被马列主义思想所武装，广大劳苦大众被阶级斗争学说所唤醒，那么，如今的革命造反派也是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被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所唤醒。有人说，革命造反派是 1966 年兴起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群体，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人之所以说革命造反派闹事，把武斗的账算在革命造反派身上，说到根，是不承认“造反有理”，不承认“存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承认“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是十分有影响的认识。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走资派也好，还是暗的，让人不能那么清楚地分辨出来。中国人是现实的，看不见的东西，总不承认。而 20 多年后，一切真像大白时，已后悔莫及了。

这样说，把发生武斗的根源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是不是直接参加的双方群众一点责任也没有呢？

不是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果那些参加了复辟逆流中建立的地革委的群众组织，特别是骨干分子，不听党内走资派的胡言乱语，不受个人名利的蛊惑，少一点怨气不服气，多一点理性分析，正确领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许就不会对革命造反派产生仇视甚至仇恨，也就不会屡屡挑起武斗。

再如果，受迫害的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大大小小的头头，完全去掉报复情绪，去掉派性思想，克服争强好胜的心理，及时地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用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去对待对立派的群众，或许会宽容对立派群众的过错，躲开他们的挑衅，使武斗不发生或少发生。

不过，这样的分析，可能是“事后诸葛亮”，但当时有的单位确实做得比较好，没有发生武斗。

还应该承认，这些武斗，有当时形势的必然，也有两个阶级、两

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反映。

现在来回顾武斗是怎么具体发生的。

运河地区发生武斗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捍卫地革委的群众组织去捣乱、砸烂革命造反派的据点或活动场所，企图不让革命造反派再“死灰复燃”，发展壮大。这种情况多发生在 1967 年 4、5 月份，如 5 月 12 日，保地革委的群众约有 200 人，把运河一中东墙推倒，冲进校院，妄想把革命造反派师生赶走。

第二种情况，是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去捣乱革命造反派批判地革委的大会，造成冲突。这多发生在 6 月份。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开会游行，相遇后厮打起来。如 1967 年 8 月 1 日，革命造反派在运河青年体育馆召开“批判朱奇民大会”，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在运河西关体育场召开批判“孙、孔、王大会”，会后双方游行，至西门大街相遇，各方队伍中都拿出旗杆、标语牌、小旗子等，对打起来。

第四种情况，是一方埋伏在另一方游行的必经路线，蓄意欧打对方，这样造成的后果严重，有死伤。这种情况，多是革命造反派遭伏击，所以伤者多，并且死了两个人。

第五种情况，是一方故意用高音喇叭去干扰、挑衅对方，另一方则组织人去抢高音喇叭，造成双方武斗。

造成武斗中伤亡的原因有两点。

一种是，革命造反派虽然没有军分区的支持，但由于人数众多，

真理在握，总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而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虽然有军分区的支持，甚至还武装了枪支弹药以壮声威（不过从没有开枪伤过人），但由于人数较少，又辩论不过革命造反派，所以心里窝着一股气，往往反击和报复得比较残忍，造成革命造反派人员伤亡较多。

另一种因素是，不论革命造反派组织还是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都不那么纯洁，都有混水摸鱼的，都有无事生非之辈挑起事端，扩大事态，把正常的辩论白热化，把小的磨擦变成你死我活的武斗。这是应该认真总结教训的。

这种你争我斗的局面，直到 1967 年 12 月 1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12.1”通告，才全部结束。通告正式宣布：运河地区 1967 年 3 月份成立的地革委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保运河地革委是错误的。军队应该支持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实现革命的联合，在“三结合”基础上建立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

随后，运河军分区支左人员全部撤出，野战部队六一八五师正式进入运河地区支左，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附：一个红卫兵的自述

我是一所地处农村的运河地区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在 1967 年反复辟逆流中，亲身经历了两次武斗。其实，称为武斗并不合适，因为这两次，都是一方挨打，一方打人，挨打的一方连还手都没有，打人的一方根本没找到武斗的对手。

第一次是是 1967 年 6 月 18 日。6 月 17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大家高兴

得奔走相告。我们的“东方红红卫兵”，人数在学校不占绝对优势。为了庆贺这一好消息，也为了扩大“东方红红卫兵”的影响，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庆祝游行活动。

18日，吃过中午饭，我们匆匆集合了队伍，高举着“东方红红卫兵”大旗，唱着革命歌曲，走出校门。游行路线是，先到公社所在地，然后去大市庄大队，路过和福大队，返回学校。来回路程有20多里。

在公社所在地游行得很好。我们高呼着“热烈庆祝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彻底反击‘二月逆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镇压文化大革命决没有好下场！”等革命口号，个个情绪都很高涨。镇上的社员和公社大院的干部，也站在街道两旁观看，有的拍手鼓掌，有的跟着喊口号，那些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还跟着游行，一直走出村庄。

出了公社所在地一直往东，大约三、四里路才是大市庄。

尽管游行了已经一个多小时，大家一点也不疲倦，连四、五十岁的老教师也紧跟队伍，有说有笑，精神十分饱满。沿途的两边是刚收割完的麦地，白茫茫一片，早春种的玉米已有一人多高，绿油油的，长得非常旺盛。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象两排威武的士兵，在接受我们的检阅；墨绿的叶子，微风吹过，哗啦啦作响，既给我们遮住了西去的太阳，又给我们送来了清凉的风，还象音乐伴奏一样，催着我们放喉歌唱。果然，排头的红卫兵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歌声此起彼伏，驱走了疲劳，缩短了里程，不知不觉已来到大市庄的

南头。我们准备从村南头的中心大路往北游行，到中间再折向左，往西走。这样，回学校的路程比较近。

谁知，刚拐入向西的路不远，路北的院子里就窜出一些人，有男有女，还有老人小孩，拦住我们游行的队伍，不由分说，就夺我们的旗帜，就打我们红卫兵。我们是边挨打，边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边夺路继续往前走。结果打人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手中还拿着镢头，木锨，棍棒。我们的队伍已被冲得七零八落，旗子被撕毁，几个“东方红红卫兵”的头头和老师被隔成几堆，分别遭受殴打，衣服被撕破，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足有二十分钟，我们才好不容易全部冲出来，撤到村外野地里。那些打人的暴徒，还跟在后面大喊：“‘东方红’都是牛鬼蛇神”，“看你们还敢再造反！”

我们重整了队伍，满腔激愤，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能嘶哑着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互相搀扶着，狼狈不堪地返回学校，连穿过和福大队的路都不知道是如何走的。

当时，太阳西下，满天的晚霞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学校留守的老师已打电话通知县城。天黑时，我们几十个受伤的师生用汽车被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有5人是脑震荡，20多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伤痕，有一人留下终生后遗症。

随后，我们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公布了“东方红红卫兵”被打的事实，揭露了公社党内走资派寻凤羽和大市庄大队走资派王玉林勾结在一起，策划和制造武斗的真像，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向党内走资派讨还血债。

第二次是 1967 年 7 月 21 日。

那一天上午 10 点多钟，我正和同学们印传单，忽然有人喊“打人啦！”我们几个急忙跑出校外。

只见一辆大汽车停在校门往南约五十米的路上，一位开车的解放军同志正在阻挠打人者。而几十个打人者围住汽车，正从车厢里往下拽人，还高喊着“打死他！”“别叫他跑了！”而车上的人或被拽下来，倒在地上遭毒打，或跳下车，向路两旁庄稼地里跑去，而打人者在后面猛追。

我们一问情况，才知道，车上的人是“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总部”的几个负责人，打人者是学校西边一个大队的保守组织，领头的是民兵连长徐秀荣。徐秀荣听说公社造反派上县里去告状，反映公社党内走资派寻凤羽的问题，反映整个公社革命造反派受迫害的严重情况。县城驻军 6189 部队的首长亲切接见了他们，并表示了对他们的支持，今天开军车送他们回来。于是徐秀荣他们恼火了，召集了保守组织的民兵，在路上截车打人。

徐秀荣一直和公社党内走资派寻凤羽关系密切，经常出入寻的家中。徐秀荣成立的保守组织是寻凤羽的“御林军”，不准任何人说寻凤羽一个不字，每次革命造反派召开批判寻凤羽的大会都被徐秀荣带人冲散。所以这次打人不是偶然的。

我们几个学生，面对着打人的青年民兵，别说参加进去，就连拉人劝阻的能力也没有，真是干着急，只能求开车的解放军同志快想办法，不然会打死人的。解放军同志也急得满头大汗，拉也拉不住，说

也没有人听。幸亏另一位跟车的解放军同志机灵，早就跟部队联系上了。大约半个小时，一辆吉普车和一辆满载士兵的军车，飞快地来到。吉普车上下来一位面容严峻的张参谋长，命令解放军战士，把打人的都抓起来。

过了一会，几个躲在路东大麻地（大麻是当地特产、皮作纺织用、楷杆细长、一棵连着一棵、密密麻麻、当时都已长到2米多高）里的革命造反派头头也被解放军找到了，个个遍体鳞伤，有的连热再加上麻地里不透气，已经气息奄奄。而汽车旁被打的人，正躺在地上呻吟。

张参谋长看到这种情况，气得连声说：“不象话！不象话！”吩咐把打人的都押到学校去，把受伤的赶快开车送县医院。

我们簇拥着张参谋长和另几位解放军干部，来到“东方红红卫兵”办公室。稍事休息，张参谋长亲自批评教育了几个参与打人的民兵，让他们回去好好检查，保证以后不再参加打人。而把另几个为首的打人凶手和徐秀荣带回县城处理。

临走，张参谋长说：“你们这里保守势力太厉害了，我们马上派支左人员来支持你们。”我们几个革命造反派听了心里热乎乎的，两眼噙满感激的泪花。

七、“孙、孔、王”冤案

随着1967年“7.20”武汉事件的解决，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一边倒的形势。

军队全部彻底改变了支左立场，坚决支持各地革命造反派；尽管

有的地方还有些派性斗争，但已接近尾声；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势力已经偃旗息鼓，另谋对策；地方上的党内走资派感到十分沮丧，有的甚至彻底绝望，不得不向革命造反派投降，有的也确实认识到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准备坚决改正。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则喜气洋洋，欢庆反复辟逆流的胜利。

此时此刻，毛主席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毛主席不顾 74 岁的高龄，冒着酷暑，利用七、八、九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视察了大江南北，深入到地方干部群众和军队指战员之中，调查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1967 年 7 月 30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批示是：“对于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了，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这条最新指示，既是“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考验，也是对广大革命造反派的考验。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要想“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有三个条件：1.“不再坚持错误”，那也就是要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认识到错误的危害性；2.“认真改正了”，该检讨的检讨，该赔礼道歉的赔礼道歉，该纠正的彻底纠正，并在实际工作中不再犯，这才叫“认真改正了”；3.“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这就是检验“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态度是不是诚恳，认识是不是深刻，接受广大革

命群众的批判是不是热情，改正的是不是认真，是不是真心实意地站在了革命群众一边。

对于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造反派来说，立足点是“让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不光要看“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做得怎么样，还要帮“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做到以上三条。

“犯有严重错误”的含义是比较广的，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犯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当然都包括在内。这是毛主席对广大干部的关怀、教育和鞭策。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广大工人识破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八月二十五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九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转达了毛主席在视察途中对红卫兵的关心：“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传达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

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对于武汉地区，毛主席在九月二十三日指出，军队和革命造反派“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地实现三结合。希望你们成为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对于全国军民，毛主席在视察中一再说：“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 1967 年 9 月底，以满腔热情地赞扬和精辟透彻地分析，谈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应该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健康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违背了这些指示，就是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就会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

那么，作为具体指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不是都能正确地理解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呢？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都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王力又是毛主席派往云南、贵州、成都、重庆等地，代表中央解决当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负责人之一，应该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了吧，但他们都不是，而犯了错误，主要是极“左”方面的错误。请看以下事例。

第一件事，是在 1967 年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王力擅自把毛主席写的“武汉地区的走资派”改成“武汉地区党内、军内走资派”，开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先河。紧接着，王力、关锋又于 8 月 1 日《红旗》杂志 12 期，发表两篇社论，大肆宣染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

第二件事，是 1967 年 8 月 7 日，关锋委托王力去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姚登山等人。本来毛主席非常支持姚登山等革命造反派，希望他们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明确指示：对外交部长陈毅的错误可以揭发批判，但不要打倒；对外交工作可以批判其中的修正主义做法，但外交部不可宣布夺权，革命造反派可以充实到领导班子中去，因为外交部有其特殊性。

可是王力利令智昏，竟胡说什么：“中央让我过问一下外交部的运动”，“外交部有什么特殊？吓人嘛”。“别以为搞外交就能难住人，没什么了不起。”“群众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完全可以嘛。”“我们撤消保陈毅的讲话。”这下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完全搞乱了，

不光夺了外交部的权，通电驻外使馆，还把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放在一起，进行打倒。

除了这两件突出的事情，还有就是谢富治收到了北京造反派中整理的材料，其中有关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的有——

当前，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和革命造反派队伍已经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究其原因，是由于“第四司令部”直接插手的结果。根据大量的事实，这个司令部的首脑人物就是关锋、王力、戚本禹，前线司令官是《红旗》杂志的编辑林杰，其主要活动成员有：《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王思宇等人。此外，外交部姚登山、陈家康以及经委、市革委中也有人正在入伙参加。

1966年10月，林杰就在一次会议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恩来司令部，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成为第四司令部？”

吴传启马上响应：“我们要加强串连，到外面去，成为第四司令部！”

到了12月份，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被揪出后，林杰到处叫喊：“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打不到。”关锋也对中央党校的组织下令：“刘少奇的大字报不能贴。”他们招降纳叛，网罗死党。吴传启早被社科院学部群众揪了出来，林杰以陶铸的所谓四点指示为法宝，贴出大字报说：“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的指示，都会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同志。”

更为恶毒的是，当清华井冈山要揪斗刘少奇时，林杰竟充当刘少奇的情报员，把整伯达同志的材料转交给刘少奇，为他提供疯狂反扑的炮弹。随后，他还亲手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和偷看档案。

林杰在关锋、王力的支持下，和赵易亚、穆欣、吴传启、潘梓年、陈大仑经常串连，进行秘密活动。今年（1967年）3月8日，林杰指示吴传启到财经学院策划反总理，这消息还刊登在他们的“内部参考”上，后被其头头销毁，说：“吴传启的行动保密。”

第四司令部通过指定的联络员，以提供消息，传递材料，分析形势，引导方向的手法，控制和操纵“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活动，不断掀起反总理和几位副总理的潮流。

在林杰授意下，市革委的一些人提出了“北京要除三害，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他把这些人视为眼中钉，必欲拔掉。他别有用心地把余秋里在中央的表现提供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于是他们便以反余秋里而一举出名，而把其他造反派打成“保余派”。而后来，林杰却对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人说：“我让师大告诉你们，他们没有告诉你们吗？”他就是用这种手段分裂了学生队伍。

今年8月9日，林杰再次接见浙江温州的群众组织代表，说什么“人武部是地头蛇，就是要把军内这一小撮坏蛋揪出来。”

林杰秉承关锋旨意，早就与赵易亚一伙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搞小团体。他多次窜到军报，与赵研究形势，一起整理了中央文革大量黑材料。

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被关锋、王力、戚本禹遥控的第四司令部的

整个战略策划大体是这样的：

在去年，他们的主要矛头直接指向以陈伯达、江青二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从今年初开始，他们感到中央文革的这个口是不可能“突破”了，就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妄图制造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矛盾的假象，反掉周总理，窃取中央各部的大权。

到今年7月下旬，他们利用“武汉事件”，叫嚣“揪军内一小撮”，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林杰、赵易亚不止一次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和军内一小撮的矛盾。”叫嚷：“要大反特反带枪的刘、邓路线”。他们妄图把军权接到手后，再反中央文革。——

这份材料经核实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尽管分析的观点和角度不完全正确，但这是唯一群众反映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问题的材料，并且其中提到的林杰确实与“王、关、戚”关系十分密切。材料反映的问题也从另一方面证明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一些作法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错误。在战争年代，破坏了最高司令官的战略部署，是要杀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批判，但批判“王、关、戚”的范围应如何确定，批判造成的影响会不会对全国文化大革命造成危害？毛主席正在思考。

正在这时，中共上层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势力开始活跃起来。毕竟，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被群众视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现在出了问题，他们想趁机促使批“王、关、戚”范围扩大，定性升高，给文化大革命

来一次致命的打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向毛主席提出了“是要解放军和老战友，还是要《红旗》杂志（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代名词，因为12期《红旗》杂志社论是他们三人的观点）？”的要挟。

怎么办？毛主席犯愁了。此时他正在上海，已有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本来，搞文化大革命就举步维艰，现在已经搞出了一些苗头，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大的方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辨明，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受到全国人民的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一个又一个地被揪了出来。对，应该维护这个大局，应该发展这个大好形势，不能再乱了，不能再在解放军内部分裂了。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违背科学的提法，只有党内走资派才是斗争的对象。军队的问题、地方的问题、各行各业的问题，都是党内走资派的问题，都是党内走资派在破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哪有什么这一小撮那一小撮，这不乱套了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来领导一切，只要党好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了。

于是，1967年8月中旬，毛主席作出决定：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戚本禹的问题到明年（1968年）初再说。同时让姚文元接替王力他们的工作，把中央的宣传工作抓起来，具体负责《红旗》杂志。

当然，毛主席也考虑到，处理了“王、关、戚”，必定会引起左派队伍的动荡和分化，所以再三叮嘱姚文元注意舆论动向，办好《红旗》

杂志。同时，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在中央文革内部进行批判，绝不能交给群众批斗。

但是，事情并没能完全按毛主席的意愿去做。首先，中央文革小组的个别负责人，如陈伯达，就有意扩大“王、关、戚”的问题，以此排除异己，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显示了十足的派性和庸俗的鼠目寸光。其次，也是最主要的，中共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势力开始活动起来，利用各种渠道，利用自己的权力所及，要在各地各单位抓大大小小的“王、关、戚”。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面临着“孙、孔、王”的问题。

本来，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作为运河地区的中上层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接受群众的批判是应该的，站出来造反也理应受到欢迎。山东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也曾明确表示，应该支持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等人起来造反。他们也真的起来造了反——检查批判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揭发斗争了运河地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革命造反派一起反击了复辟逆流。

但到了1967年10月，批判“王、关、戚”的风吹到山东、吹到运河。山东省的个别老干部和济南部队的负责人，偏听偏信了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和运河军分区在前段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片面汇报，认为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是野心家，是挑动运河地区群众斗群众的黑后台，是“王、关、戚”式的人物，给省革委和省革命造反派组织施加压力，要他们表态，让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批斗孙铁

民、孔宪美、王锡山等人。

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听到省里让批斗“孙、孔、王”，思想上不通，意见产生了分歧。

更为可笑的是，驻运河地区的 6185 部队支左负责人奉上级命令，以是否批判斗争“孙、孔、王”作为革命造反派组织能否参加改组后的新的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首要条件。

于是，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特别是运河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不愿意接受这无理的条件，并且坚持认为“孙、孔、王”是革命造反干部，应该支持，应该保护，所以不仅不让参加新的地革委，而且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孙、孔、王”的风波并没到此结束，以后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波折和反复，大多拿“孙、孔、王”开刀，越来越多的革命造反派受到株连。从中可以看出，运河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多么复杂，运河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多么阴险狡猾。

实际上，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都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从来都没有被划过右派分子，说“孙、孔、王”是“右派翻案集团”，纯粹是子虚乌有。文化大革命初期，孙、孔、王站出来批判刘邓路线，给混进省、地委的走资派贴大字报，并支持革命造反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 1967 年二月逆流中，复辟势力却说他们是右派造反。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孙铁民得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王效禹的支持和肯定，明确表态：“支持孙铁民起来造反”。于是，孙、孔、王就与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一起批判斗争

混进地、市、县的党内走资派，批判复辟逆流。在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多次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上，在举办长达一月的学习班、发动公社副书记以上的干部揭发批判地、市、县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运动中，在对走资派进行教育、挽救的工作中，在为运动初期及二月逆流中被错打的群众、干部平反、补发工资等决策时，他们都发挥了作用，做出了贡献。说“孙、孔、王”是革命造反派的黑后台，那是党内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先发制人；说“孙、孔、王”挑动武斗，参与“揪军内一小撮”，是党内走资派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阴谋诡计。至于1967年11月份之后王效禹不再支持“孙、孔、王”，造成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对“孙、孔、王”问题出现了“支持与不支持”的分歧，那是有特殊背景的，与他们的正确行动无关。真正受到冤枉、遭到迫害的是他们本人。从1968年3月11日孙铁民同志赴省反映问题，在兖州被抓，到1974年底，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孙、孔、王”问题一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特别是孙铁民同志，受尽了牢狱之苦。无数次的批斗，使他精神和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和蹂躏，灭绝人性的殴打使他折断了肋骨。受其株连，运河地区一部分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孙孔王右派翻案集团成员”，是“黑干将、黑参谋、黑秀才、黑打手”，是“孙子兵”等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逼疯，有的被活活整死，真是惨不忍睹。所以说，“孙、孔、王”问题是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长期的大冤案。

“孙、孔、王”的问题，使党内走资派的阴谋得逞。不仅分裂了革

命造反派队伍，而且打击了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干部，最终保护了自己，为 1978 年开始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在运河地区打下了基础。

八、粉碎右倾翻案风

正当运河地区党内走资派为掀起“孙、孔、王”风波而暗暗高兴的时候，全国上下又开展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反击右倾翻案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两项重要命令：

第一道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二道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国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各单位及“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团级以上一万多名干部开会，宣布了这两道命令。二十五日凌晨，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与会成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后二时半，首都十万军民，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出席，会上宣布了上述两道命令，他们并分别讲了话，批判了杨、余、傅，号召迅速掀起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邪风的新高潮。

那么，“杨、余、傅”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先看杨成武。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长，由于发表了《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而获得林彪的信任。但他和林彪一样，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是半瓶子醋。他思想深处总认为批当权派是批他们一些有功之臣，对文化大革命早就产生了“厌烦”，特别感到一批又一批干部被打倒是“莫名其妙”，是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是“毫无意

义”的运动。

但是，杨成武又象林彪那样，想紧跟毛主席。这样就出现了“跟得不象”，表演蹩脚的情形。

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之后，自以为是紧跟毛主席的，想阐述一番自己的见解，在总参几个笔杆子的帮助下，写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通过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主席何等英明、伟大！在1967年11月23日看到当天登载的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慨叹：看来，在我们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呀，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连马列的常识都没有吃透。并立即和周恩来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决不允许这种错误思想蔓延。

但是，杨成武坚持认为这篇文章没错，还因为《人民日报》在第二版登载而大发脾气，认为这是看不起他。

连威本禹也站在杨成武的立场上帮腔：“不管是谁的话（指毛主席对该文的批评——引者注），我想不通就是想不通，我保留我的意见。全国人民都从心里呼唤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报纸上也是天天这么讲，怎么单单批判到杨总长头上了？真是怪事！”

直到毛主席亲自找杨成武谈话，又学习了毛主席在1967年12月26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作的如下指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

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杨成武才承认了这次的错误。

还有一件事，说明杨成武的立场有问题。

1967年八月份，毛主席在上海视察，多次接见军区负责人，杨成武充当信使，来往于京沪两地，并负责整理毛主席的讲话。按规定，在毛主席的讲话公布之前，绝对保密。但杨成武每次回到北京，只做到了对中央文革等革命左派保密，却有意向制造和参加“二月逆流”的上层领导片面透露讲话精神，例如只强调要“解放广大干部”了，“造反派要犯错误”了，“要对红卫兵教育”了，“左派会变成极左派”了，“极左派对革命的破坏更严重”了，等等。

由于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长的地位，再加上跟随毛主席在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视察大江南北的身份，所以他的错误思想导致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许多走资派，以极左的面目攻击文化大革命；有的地方不分青红皂白，急于解放干部，甚至把坚持错误立场的党内走资派也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都与此有关系。连山东省运河地区也吹来了这股风，所以，运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不得不在1968年的3、4月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反击右倾翻案活动，以捍卫前一阶段取得的文化大革命成果，迎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至于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更加严重。

有两件事足见余立金其人。

一件是，毛主席在上海视察期间，余立金送给毛主席一些 20 世纪 30 年代的材料，其中有些是国民党反动派报纸对江青的造谣污蔑，毛主席看后置之一笑。他想考考余立金，看看余立金的识别能力，让他也看了这些材料。看完后，毛主席问余立金有什么认识，甚至问到“蓝苹是谁？”让余立金回答。当时余立金装憨卖傻，说“没认识”，“不知道”。毛主席认为这个人不诚实，很不高兴。过后，余立金却到处散布自己看到的材料，甚至把江青说成是在 30 年代曾穿着旗袍和露臂短衫，一身国民党女兵军装，登在画报上，以此丑化江青。

第二件事，余立金曾和谢富治、王力南下昆明、重庆、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他会上很少发言，从不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会后就去做小动作，经常把搞“二月逆流”的中共上层领导人的意见传达给下面军队负责人，给这些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很大困难。

余立金对杨成武非常佩服。他曾试探地向杨成武谈了个人的心思：“杨总长，我认为主席的提法和中央文革那帮子人说的不一样，只有周总理最懂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最器重总理，我看咱们跟着总理走，比较保险。”

在余立金眼里：林彪是虎视眈眈，养精蓄锐，随时都想一手遮天；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已激起了整个神州的天怒人怨；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徐向前等老帅在静观其变，和文革派虚与周旋，时时在抗争，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并且和与日俱增的刘、邓、陶队伍逐渐靠近，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所以，他和杨成武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今后的道路，但可惜韬光养

晦不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几乎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中共上层领导人都受到他“名为保护，实为抗拒”的支持，连制造了“7.20”武汉事件的陈再道也被他藏了起来，不让批判。他利用卫戍区的权力，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多次任意镇压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引起很大义愤。所以他参与为“二月逆流”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有根源的。

1968年初向文化大革命反扑的事件，除了“杨、余、傅”之外，还有几件。例如1968年二月初，叶剑英找到毛主席说：“去年根本不存在一个‘二月逆流’的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搞的，现在王、关、戚揪出来了，我要求平反。”

再有，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人写了一张大字报；1967年二月下旬，国防科委常委会规定：凡是不拥护聂荣臻同志和不拥护以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正确领导的人，不能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对此，毛主席说：“外交部91人的大字报是无事生非，用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客观上在搞右倾翻案。”“又一个中心，不好嘛。如果全国都这么搞，岂不各自成套，弄成多中心论了吗？如果搞多中心论，不会实现团结，只能混战一场。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这股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打下去。”

作为中央，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歪风的斗争，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中央文革小组的具体领导，进行得十分顺利，“二月逆流”

新反扑没形成多大风浪。1968年三月二十七日，首都军民十万人举行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标志着这场反对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右倾翻案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作为运河地区，一方面，革命造反派在军队的支持下，粉碎了以运河地委书记B和运河市委书记D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刮起的为“二月镇反”翻案的妖风，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运河地区取得的成果。连B和D等人也不得不失望地说：“这下子完了，连保我们的那些人也进不了革委会了，今后谁还会听我们的话。革命几十年，什么也没有捞到，倒落了个走资派的下场。”并向革命群众可怜惜惜地辨白：“我们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只不过在工厂想多发点奖金，让工人干活的劲头更大些；在农村多分点自留地，搞点个人承包，让农民多点自由，让一些能人发挥聪明才智，使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些。”这些话，一方面说明党内走资派的狡猾，另一方面也迷惑了不少人。只有等到20年后党内走资派上台，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才露出了刘少奇、邓小平及党内大大小小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庐山真面目”。

另一方面，在运河地区走资派掀起的“孙、孔、王”风波中，造成的一部分革命造反派受压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有些人，特别是个别支左人员，根本没能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1967年12月2日）精神。《通知》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的红暴，

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通知》指出：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方法，才能够正确解决同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这类性质的矛盾，而用高压、排斥、一派单独夺权等项方法是不能解决此种矛盾的。何况，运河地区支持“孙、孔、王”的革命造反派根本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在坚持正确的路线。

运河地区不能正确执行上述《通知》的恶果是，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削弱了，“孙、孔、王”的问题继续石沉海底，一部分同情、支持“孙、孔、王”的革命造反派进一步受到排斥和压制。

这时，以运河地委常委 A 为代表的革命干部，经受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最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A 还特别注重反复学习了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对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高自我革命的觉悟，增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的自觉性，都具有极大帮助。

该文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

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打倒他们，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来。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特别是在这篇文章中，发表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学习着毛主席的教导，A 又一次想起他所掌握的一个典型大队，那就是曲阜县的孔庄大队。

这个大队的社员，90%姓孔，1200 多人口，分成 6 个生产队。分

生产队时，由于孔姓的一位中农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家，把好地，好的农具，好的牲畜分到两个孔姓当队长、富裕中农户比较集中的生产队。当时，一家孔姓大地主表面上老实了，可背地里利用族长的身份，净出坏点子，分生产队时的不公，就有他的策划。到 1964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这个大队是个“地主不臭、贫下中农不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比较严重的典型，两极分化问题相当突出。

两个分到好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队，产量高，收入多，社员比较富裕，但对国家的贡献并不多，有时还少，因为他们经常瞒产漏报，私分独吞，又有大队负责人替他们打掩护。例如，按上级指示，每人只有半分自留地，而这两个队都超过这个数，有时达到每人 1 分自留地，严重地削弱了集体经济。连年来，甚至出现“只顾自留地，忘了生产队”的现象，生产队的产量严重滑坡，社员们思想涣散，时时处处只为自己打算。

四个分得生产资料差的生产队，尽管干劲大，产量老是赶不上，收入也差，社员中的贫困户比较多，但对国家的贡献一点也不少。究其原因，有这么几条：1、当初分队不公，人为地造成了生产队之间的差距。2、社员家底薄。由于这四个队贫下中农多，有三分之一是佃农、赤贫、解放前一贫如洗，连件个人使用的象样的农具都没有，解放后分到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比起中农、富裕中农还相差一大截。特别是大部分男人解放后才结婚，有的已经 40 多岁。结婚生子女，孩子都小，家庭拖累十分严重。3、大队、公社个别负责人指导思想有问题，“嫌贫爱富”，不光不体谅这些生产队的难处，反而责怪

他们没本领，对他们向国家的贡献不光不表扬反而强调是应该的，还嫌他们做得不够。这样就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在刘少奇、邓小平刮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邪风时，这个大队趁机规定，收入分配按“人四劳六”，即人口占四成，劳动占六成。这样使全大队的富裕中农、地主、富农沾了大光。因为他们劳力多，而贫下中农大部分孩子多，孩子小，又由于解放前长期极其繁重的劳动和猪狗不如的生活，不少是疾病缠身。这样，不光四个差的生产队身受其害，就是两个富裕队中的贫困户也是叫苦连天。

四清时，孔庄生产大队的问题解决得并不好，阶级斗争的盖子没能揭开，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大非也没来得及分辨清楚。这一直是 A 十分挂念的。不过，前几天见到孔庄大队的几个革命造反派的小伙子来运河，听他们眉飞色舞地说：“我们造反了！全大队绝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我们结合大队实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越批越有味道，大队的走资派，公社的走资派都让我们揪出来了，大家的热情可高了！现在正准备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第二次获得解放。”

A 听了，打心眼里高兴，更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象孔庄这样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清不浑，不少农民只囿于家族观念的小圈子，被地主富农分子钻了空子，更多的人被私心私欲和眼前利益蒙住了眼睛，看不到集体利益，看不清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现在好了，党内走资派揪出来了，路线斗争的是非清楚了，政权掌权在真正代表贫下中农利益的革命造

反派手中，大家通过斗私批修，把千仇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集中到党内走资派身上，与旧的传统观念又进行了一次决裂，感到一身轻松，怎么会不欢庆第二次解放呢！

A 越学习越思考，越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越感到全身充满了革命激情。他象广大革命干部一样，经过革命群众的七斗八斗，斗出了革命干劲，斗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斗出和革命造反派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和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在 6185 部队支左负责人的支持下，满怀信心地迎接 1968 年 5 月建立运河地区红色政权的新阶段。

第三部分 革命委员会颂歌

一、“5·1”地革委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春光明媚，运河地区人民双喜临门：在国际劳动节 79 周年的回顾声中，又敲响了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锣鼓。

早在三月份，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进行科学总结：“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基本上遵照毛主席指示进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八五部队政委 F，作为军队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中共运河地委常委 A 和其他几位革命干部代表参加了地革委，A 担任第一副主任；革命群众的代表——革命造反派组织的

负责人，心情格外激动。回顾两年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殊死的搏斗，几经风雨，几经挫折，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他们作为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开天辟地第一次直接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成了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常委和委员。他们和自己的战友们发自内心地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庆祝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主会场设在运河市西关体育场。十万军民把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秩序井然，但许多革命群众按捺不住无比兴奋的心情，还是经常需要人引导和维持。这下可忙坏了带着红袖章的群众和解放军战士，跑里跑外，安排进出通道，带领各支队伍到达指定位置，把零星的参会群众排好队，依次入场。

当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红旗翻卷，口号声飞扬，每个人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本举起又举起，象红色海洋中的朵朵浪花。

尽管会场上的群众是守纪律的，但毕竟是个喜庆的盛会，大家的嘴巴总合不拢，一会儿呼口号，一会儿听着主席台上的发言又议论起来。

当军代表讲话时，人群一片肃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起战斗的军民鱼水情又一次体现。只有个别人小声说：“同是解放军，为什么1967年2月要镇压革命造反派呢？”另一个人说：“还不是个路线问题！上面的首长不理解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下错了命令。你看人家解

放军支左人员改得多么快啊，真是雷厉风行！”

A代表革命干部讲话，语气中充满了对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的深厚感情，赢得了阵阵掌声。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干部的赞许，也是对参加新生的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的真心拥戴。谁说革命造反派只会批干部，斗干部，甚至被污蔑为迫害干部？事实胜于雄辩，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干部感情最亲，友谊最重，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起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拼搏奋斗，他们的感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他们的友谊是建筑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战斗友谊。他们互相批评，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那是为了打扫灰尘，去掉各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和恨，恨阶级敌人，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恨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恨一切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无比热爱毛主席，忠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轮到革命群众代表讲话了，整个会场沸腾了！大家指指点点，争相叙说着参加地革委的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们有工人、贫下中农、有大中学校红卫兵，还有文艺界的革命职工。他们原来都是默默无闻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如今成了革命的闯将，成了地革委成员，成了掌管八百万运河地区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当家人，这是多么光荣和自豪啊！他们能否为革命掌好权用好权？沉浸在欢乐中的人民群众将拭目以待。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入夜，各种形式的庆祝演唱会，电影晚会在各县、市、各单位热

烈地进行。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是运河地区广大革命干群，广大红卫兵师生，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

毛主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后，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随后，毛主席发现，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热情地肯定了革命群众的创造。这种革命政权的命名，含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从巴黎公社诞生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的革命政权形式已有了雏型。尽管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很短，但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已提供了十分宝贵而又意义深远的三条经验，那就是：旧式的专职军队消灭了，代之以国民自卫军，这就是实行军民合为一体；组成公社的代表应由普选产生，并随时撤换，一切司法人员也应如此；这些公社的勤务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些措施和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等级制度，实行军民一致，干群一致，人人都是可以参与管理国家。

在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时代，基本建立了符合巴黎公社精神的政权机构，但那毕竟是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实行的是抗日民主统一路线，许多问题没有暴露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教导，绝大多数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但是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的把持下，政权机构逐渐走上了所谓的正规化，即资产阶级政权形

式的老路。旧的国家机器恢复了，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党政机关成了豢养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破了刘、邓等党内走资派把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框框，造了他们的反，创造了崭新的、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政权形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三结合”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老、中、青三结合，这是从年龄结构上来表达的，二是革命干部的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这是从政权组成的人员身份来表达的，也是特指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来说的。当然革命委员会也要贯彻老、中、青三结合，以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政权后继有人，永远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这革命的“三结合”，确实是无产阶级政权机构的最好形式。

“革命干部的代表”，这一条就把几千年的世袭制度，当官的终身制度否定了。有些人参加革命早，经历了严酷的革命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甚至建立了不朽功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群体。但在这个群体中不一定都愿意继续革命，再加上其他原因，只能由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革命干部代表”，才能参加革命委员会这个政权机构，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并且，“革命干部代表”也不是终身制，一旦不是“代表”了，就不能进入革命委员会。那些不是“代表”的干部，也会继续享受人民给予的待遇和荣誉，做好人民一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贡献。不论什么情况的干部，

都不能搞特殊，工资不光不能任意提高，而且有些高工资还要减薪，要做到干部的工资与工人的工资，大体持平。坚决杜绝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这就把军队从单纯的供当权者使用的工具，变为政权决策的参加者，把人民解放军变为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兵民一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内容之一。军队代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军民关系，使民兵建设有了切实的保障；同时，军队代表参与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提高了军队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使军队的建设与地方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革命群众代表，这是把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具体化。革命群众代表从基层来，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来，从革命生产的第一线来，带着满身的革命朝气，没有一丝一毫旧官僚的酸气臭气腐败气，只有革命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斗争精神。他们“口无遮挡”，敢想敢说敢干，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是非清楚。这样的群众监督到哪里去找？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创造了这种机会，才把革命群众代表结合进政权机构，成了堂堂正正的国家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群众，只有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才有这份自豪，才实现了这种凌云壮志。

革命群众代表，是工人的仍然要做工，是农民的仍然要种田，是学生的仍然要读书。随着革命的需要，形势的发展，革命群众代表也

在不断地更换和变化。有的不做代表了，有的可能脱产长期做干部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中，这都是十分自然的事。这难道不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伟大创造么！

总之，革命委员会好，运河地区“5·1”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单从精兵简政、精减机构这方面，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就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原来运河地委、行署两大院有近4千名干部，地革委成立后，把两大院的权夺过来，组织两套精干的班子，一个生产指挥部，一个大批判办公室，再加上处理日常事务的地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总共才二百多人。由于密切联系了群众，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深入到基层去，许多问题根本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解决，随时随地就可以处理完毕；又由于实行了革命化，整个地革委成员生气勃勃，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冲天，一个人顶两个，甚至顶四、五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使运河大地出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批判

正如毛主席经常告诫中央文革小组“要抓好大批制”那样，运河地区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并没有因为成立了地革委，揪出了运河地区的党内走资派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家时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迅速掀起了各种形式的革命大批判。

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革命大批判在热烈有序地进行。

运河地区革命大批判的形式主要采取以下几种：

1、召开了五次全地区性的批判大会，集中斗争矛头，上挂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以及影响全国甚至国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下联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控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害，揭露修正主义思想泛滥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大会，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振奋革命造反精神，打掉了走资派和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威风；这样的大会，使革命造反派更好地团结起来，使革命的大联合得到更加巩固和发展。

由于运河地区在 1967 年出现了“二月镇反”和“孙孔王”风波，分裂了革命造反派队伍，造成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连干部队伍也分成两派。现在地革委成立了，首先要抓好团结。大家大要团结好，必须以大批判开道。不把千仇万恨记在走资派身上，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身上，群众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就会结成疙瘩，派性矛盾会掩盖了阶级矛盾路线矛盾。召开大型批判会，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台发言，共同批判，感到格外亲近，达到了团结对敌的良好效果。

2、各单位召开小型批判会，是大批判的主要形式。每个单位每月这种小型批判会都要举行好几次，配合大批判专栏，开展得生动活泼、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小型批判会的好处是批得准，批得细，针对性强。大家坐下来，从身边的人和事，从生活到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批判，把认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把革命大批判提高到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每个人都发言，做到人人口诛笔伐齐批判。这样不光批判了本单位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的路线所做的坏事和错事，使干部深深触及了灵魂，也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3、办路线斗争教育学习班。这是批判、教育、挽救党内走资派以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最好形式。在学习班上，既有火药味很浓的斗争会，也有和风细雨的谈心会。

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在批判会上都表现得很好，大家纷纷抢着发言。有的结合自身实际，讲得声泪俱下；有的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批判得怒火填胸。

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革命大批判在运河地区的各个领域引起了深刻变化。它猛烈地冲击着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了广大人民，打击和粉碎了暗藏的各种反动派，把运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全面胜利，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曾总结过十大成绩。

1、涌现出一批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的、能在各个领域带领群众向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的新组成的党组织。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党组织纷纷建立，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战斗力大大增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任务，正在全地区认真积极地贯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经过吐故纳新，经过斗、批、改的考验，一批无产阶级觉悟

较高的年轻干部，正成长起来。他们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修正主义批资产阶级，干社会主义，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3、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革命造反派队伍进一步扩大。90%以上的群众都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敢于战天斗地批敌人，敢于造走资派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敢于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展开面对面的批评和斗争，敢于斗私批修，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一批具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一切力量的新人正茁壮地成长起来。

4、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走资派，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思想，已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广大干部逐步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从而能更好地领导人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前进。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生产队，从城市到农村，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正在制订和落实。

5、在经济领域里，“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等修正主义思想，已成了过街老鼠。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一切工作都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思想，已扎根人们的心中，大寨大庆的经营管理办法已得到全面推广。

6、干部和群众之间，一种新型的同志关系逐步形成。各级领导干部对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有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成为领导思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大群众随时拿起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向领导干部的缺点和各错误斗争，已越来越成为正常的现象。同志之间，称官道衔的旧风气也一扫而光。

7、在教育战线上，全地区不仅自力更生普及了七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有的县、有的公社还普及了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各种适应工农业生产需要的农校、技校、五七大学，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同时，端正了办学思想，批判了“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两种错误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努力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使学校成为造就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革命摇篮，使教育事业成为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坚强的前沿阵地。

8、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到工厂，专业人员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专业创作深入生产和生活的实际，从而使革命的文学艺术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大批群众业余文艺队伍茁壮成长，彻底扫除了社会各个角落的封、资、修的坏东西。新的文艺工作人员，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做革命人，干革命事，演革命戏，唱革命歌，写革命诗文。通过破“四旧”立“四新”，城乡文化生活面貌焕然一新，革命文艺成为教育群众、打击敌人、坚持继续革命的有力武器。

9、全运河地区广大农村，已全部普及了合作医疗或免费医疗，做到社社有卫生院，队队（大队）有卫生保健站，赤脚医生遍布山区

和平原以及“南四湖”上，各种多发病，常见病，地方病已得到了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不花钱或花钱很少，疾病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已成为人民公社社员人人享受的权利。全地区的农民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男女平均寿命已达到 70 多岁。

10、一系列新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在全地区开始建立起来。从结婚、葬礼到过年过节，以及处理父子、夫妻、家庭等关系，都充满了社会主义新风尚。

对于革命大批判带来的可喜变化，不光当年是辉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修正主义分子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愈加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和深远影响。因为革命大批判的烙印，既刻在革命人民的心里，也打在各色各样的阶级敌人的痛处，它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座长鸣的警钟。

三、毛泽东思想大普及

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林彪一伙搞的那一套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树忠字碑、建忠字庙等形式主义是错误的，是政治骗子“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惯用伎俩，但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广大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造反派，却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思想的。

在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不管哪个朝代，绝不会有那么多人，那么炽热地热爱一个人，那么广泛地普及他的思想。这一切就发生在文革时代的中国，就出现在毛主席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他的思想大普及已经成为世

界史上一大奇迹。

中国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上台之后，无耻地吹捧孔老二的思想，称颂孔丘是千古第一的圣人。但孔子思想与毛主席思想相比，是山丘与泰山，小河与大海。

不说两者的思想内涵，不说两者的阶级性，单从普及程度，孔子的思想只是挂在士大夫等知识分子的口头上，而毛泽东思想却扎根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其人群之广，包括识字的，不识字的，当官的和平头百姓，锦衣玉食的阔人和沿街乞讨的穷人。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望远镜，是辨色镜和照妖镜。一切人的言论、行动，公开的、私下的、表面的、内心的，都被毛泽东思想分析得一清二楚，入木三分，淋漓尽致；一切社会现象，任何历史发展的进程，都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揭示的科学规律。

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而崛起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就是最早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和“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力普及毛泽东思想，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坚力量

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活跃在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已被各地方、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推广扩大。即使再小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也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那些大单位，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组织，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宣传不过夜。即使夜间九点、十点，只要听到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也马上行动起来，睡倒的立即爬起来，做别的事情的立即放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无声的命令，无需别人号召，更不会依靠任何人组织，全是自觉自愿的，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或敲锣打鼓地宣传，或高声宣讲，或利用高音喇叭广播，或刻印出“号外”散发。务必让毛主席的指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个个领会，为贯彻执行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利用文艺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重要任务。一切有文艺爱好和文艺技术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所有能歌善舞的文艺人才都登台亮相，那些爱好文艺的人们也在大环境氛围的熏陶下，成了宣传队的活跃分子。一时间，样板戏人人能唱几句，语录歌曲在报纸上刚刚登载，在广播电台一广播，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带领下，群众很快就学会了。那些语录歌配舞的形式，花样翻新，象春雨后的小苗，一天一个样。

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学校课堂，只要有一点空隙时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唱起来跳起来。工人们的疲倦，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声中得到休息，获得新的干劲和力量；农民们的劳苦，会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乐曲中得到安抚，获得思想营养和精神升华；学生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旋律中鼓起学习的高昂情绪。

哪里有人群的地方，哪里就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身影。在运河地区普及毛泽东思想活动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小组）功不可没。

开展普及毛泽东思想活动另外的好方式，就是办学习班，召开讲

用会，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进行表彰。

“学以致用”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准则，当然首先要学好。

运河地区滕县姜屯公社七十五岁的黄老太太，运河县喻屯公社七十一岁的韩老太太，都曾是背毛主席语录的风云人物，也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她们的事迹传遍全地区，传遍全山东。在她们身上体现了贫苦农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渴求和挚爱。她们俩个有着共同的遭遇，旧社会逃荒要饭，目不识丁，解放后翻了身，生活幸福了，在扫除文盲活动中，凭着极大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认识了不少汉字。她们身板硬朗，记忆力好，对毛主席感情深，有巨大的学习动力，再加上刻苦认真，真正做到把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当作生活中第一大事，第一要事。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甚至帮助儿媳们烧火做饭，都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明白的词句，见着谁问谁。下乡的干部、还是本村的老师、回乡的知青，差不多所在生产队有知识的人，都被她问个遍，有时半夜想到一条语录，也要爬起来看上两遍，不懂不会的，马上把熟睡的儿孙们叫醒教她，真达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位典型的老太太最后达到把整本《毛主席语录》都熟记在胸，那些常见常用的语录，都能说出在语录本上第几页，是第几条。在全县，全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她们都多次做报告，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引用语录，谈心得体会，滚瓜烂熟，恰到好处。语言生动活泼，表情丰富多彩，讲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每次都博得几百人的会场，数千人的会场，齐声唱采，掌

声经久不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家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能办到的事，难道我们就做不到？关键看有没有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关键看有没有革命毅力。

学得好，更体现在用得好。

有一家社员，公公在给生产队锄地时，把锄掉的草收起来，拿回家中喂自己的羊，在吃饭时就受到媳妇的批评。媳妇背的毛主席语录是《纪念白求恩》中的名句：“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公公的行为不符合毛主席号召向白求恩学习的要求，是自私自利。草是在给生产队劳动时收集的，理应归生产队，不能拿回家。媳妇说得有理，全家异口同声支持，公公承认了错误，把草送给了生产队饲养员喂牛。

滕县机床厂二车间。下班的铃声响了，还有一些零件没有车完。怎么办？有的主张明天再干，有的说干完再下班。车间组长李师傅背了一段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并说“我们工人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再说，这批零件不赶出来，会影响其他工序。”统一了认识，他带领大家加班一小时，车完了全部零件。在这一小时应不应该记入加班费时，又发生了争执。有的说：“按劳分配，我们多劳就应该多得。”有的反驳说：“咱们整天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觉悟提高了，现在多干了点活就要钱，多丢人。难道‘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做贡献’的口号只挂在口头上？”经过一番辩论，大家同意了后一种意见。并且以后几乎每天都自觉地加班，

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个小时，从来没要过一分钱的加班费。大家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表现出从来没有的愉悦。

这样的例子，在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年代比比皆是。

当然，也有用毛主席语录不当，表现得庸俗低级的情况，除了别有用心，这种现象都会很快得到纠正。

运河二工具厂，一个工人打了另一个工人，不光不认错，还振振有辞地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厂革委会没轻易下结论进行处理，而是办了双方的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重点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导。让打人者认识到，他和被打的人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尽管你有理，也不能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同志，不能以牙还牙。再说，就是对真正的阶级敌人，也不能光用拳头，而是主要靠说理斗争。经过反复学习，打人者认了错，还主动向被打者道歉。这时被打者的怨气没有了，向打人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坚决改正。一场打人事件，就这样用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了。

这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鲜活生动的事例，就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出现在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那时认为很平常，司空见惯，不足挂齿，而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上台、大肆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却认为是不可思议，是天方夜谭，是愚弄群众，是使人丧失了“人性”“个性”和“自由”，没有“体现人的价值”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资产阶级分子，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永远不会理解文化大革命，永远不会相信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永远不会具备用毛泽东

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心灵和无比高尚的情操。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为普及毛泽东思想，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做的另一件事可载入运河史册的大事，就是建立毛主席塑像和毛泽东思想展览馆。5米多高的毛主席塑像高高耸立在运河城区中心，东西太白路和南北共青团路的交汇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年曾安排红卫兵战士守卫在毛主席塑像两旁，他（她）们豪情满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毛主席……巍然屹立，凝神遥望，面向未来，手指前方。”“毛主席啊，您高瞻远瞩，指挥我们把进军的战鼓擂得更响更响。”“毛主席啊，有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路导航，革命者一定会战胜恶风险浪，把胜利推向共产主义的前方。”

“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在毛主席塑像的北边，座北朝南，一溜青砖红瓦的山字型建筑，中间高三层，内部有五个展厅。

这里是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重温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建馆之初，每天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随着讲解员清晰、嘹亮、亲切悦耳的声音，把人们带到波澜壮阔的战争年代，带到急流暗礁的建国初期，带到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愈参观、愈学习、愈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愈感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光荣正确，愈感到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通过回顾历史，对比现实，人们心潮澎湃，对阶级敌人更恨，对社会主义更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加看清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丑恶的真面目，认识到他们危害革命的滔天罪行。展览馆还以大量的实物和图片，展

示运河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热情赞美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运河地区的伟大胜利。

运河地区八百万人民，几乎人人都知道运河市区有毛主席塑像和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它们成了运河市象征性建筑。瞻仰毛主席塑像的无以数计，参观毛泽东思想展览馆的前后累计有百万人次之多，外县外地人，四邻八乡的社员，从运河回到家中，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见到了高大、威武、令人神往的毛主席塑像，就是参观了丰富多彩的毛泽东思想展览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真正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十年。运河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硕果累累，功在当代，惠及千秋。毛泽东思想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四、 又一次获得解放的农村

著名作家高默波曾说他的家乡高家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对于运河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这个说法也是普遍适用的，而从思想意识来说，文化大革命使农村又获得一次解放。

不少农村，1949年解放后，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切要正规化”，强调“使用有文化能人”的错误引导下，排斥了最早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参加民兵的老贫农，老雇农，因为他们大都没文化。旧社会苦大仇深，连吃饭穿衣的条件都被地主老财剥夺了，还学什么文化？所以不符合党内走资派选用干部的标准。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已经年近七十，年龄小的也正五十岁左右，还象当年一样，和小

青年一起进行造反。不过这次不是造地主老财的反，而是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又一次成了农村的革命造反派。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县、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时，他们有的进了革委会，有的成了革委会的顾问。他们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农村，我们贫下中农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村是重灾区，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无数事实证明，凡是自留地多，社员随便自由的，光依靠包工包产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生产队，大都落后贫穷；凡是自留地少，甚至没有自留地，队干部一心扑到生产队，大公无私，社员们集体生产劳动积极性高，这样的生产队都搞得很好，是先进富裕的。这是为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解开了人们心中疑团，找到了答案。一个人的时间、精力、体力是有限的，一个生产队的财力物力也是有限的，把这两个有限集中到一点，集中到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上，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两个有限分散使用，只能一事无成，越过越不济（贫穷）。

先看社员每个人，如果每天只想着自己家的自留地，就不会想着生产队的大田，即使拿出一半精力和体力去侍弄自留地，那也就只有另一半的精力和体力去干大田的活。有的社员说：“干队里的活是休息，攒足劲去干自留地。”这还只是从时间、体力、精力上来说，在思想上，自留地在每户社员心中就是一个小天地，很可能是滋生私字、孕育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肥田沃土。

再从生产队来看，自留地与生产队大田争肥争水争投入，使生产队的产量下降，收入减少。

这样说，为什么党的政策还允许有少量的自留地呢？一是数量要少，并且逐渐减少，二是让社员有自由空间，作生活补充。也是对差的生产队的一种调节，暂时缓和生产队收入的不足。在这期间，生产队必须改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待生产队搞好了，自留地也会慢慢消失它的作用。

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却不是这样想，他们抓住个别生产队搞得不好的弱点，打开集体生产的缺口，主张多分自留地，从而搞自由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批判，广大社员明白了这个道理，分析了生产队搞不好的原因，解决了生产队干部的问题，推选那些有革命觉悟、大公无私、处事公道、又懂生产、又有能力的人作生产队的带头人，从而改变了生产队的面貌，在生产上打了一个又一个翻身仗，使好的生产队更加先进，使落后的生产队赶上了先进的步伐。整个农村的集体经济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

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广大农村思想观念的大飞跃，是广大农民摆脱私有观念的羁绊，获得的第二次解放。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从1962年到1974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

在经济学家柳随年等人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85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农业的发展作了如下统计：

粮食产量平稳地保持在年增长率 4% 左右，农用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排灌动力机械、化肥使用量、农村用电量，1975 年分别相当于 1965 年的 6.7 倍和 6.6 倍、5.9 倍、4.1 倍、5.7 倍。

以上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全国农业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运河地区的各种指数还略高于以上数字。这是农村经济上的大翻身。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地区的农村教育事业进入全盛时期。适龄儿童 100% 入了学，很快普及了 1——7 年级的免费义务教育（不交任何学杂费，只交少量的书本费），做到每个大队都有一处小学，二——三个大队有一处联办初中，每个公社有一处高中，条件好的大队还办起了农中，科学技术培训班，农机培训班，吸纳了各个年龄层的青年农民参加。按照纯文化的标准，这些学校是不合格的，因为不搞“智育第一”，不追求片面的升学率。从全面培养人的角度看，这些学校是办得很好的，不光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革命大批判引进了课堂，学生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文化水平也比较扎实，彻底克服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当然，个别学生也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倾向，但绝大多数学生积极性很高，是非常愿意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国家从一九七〇年开始，陆续采用推荐、

选拔的方法，选送一部分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回乡的、下乡的）到大学、中专学习、深造。他们毕业后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农村教育的大好形势，还由于当时教育制度的大改革，这主要体现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民办教师是个新生事物，城里的教师也大量到农村去，甚至原来的公办教师，自动放弃拿国家的工资，以普通社员的身份参与农村教育，这更是一种高尚的社会风尚，再加上回乡和下乡知青经常补充到教师队伍中。以上这些新事物新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农村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公社、大队、小队办教育积极性最高、干劲最大的十年。

总起来说，蓬勃发展的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文盲人数大大减少。科学种田水平，农业机械的使用水平，讲卫生的水平，文化知识的水平，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普及面之广，进步速度之快，是几千年农村社会发展的最高峰。

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内走资派总说文革十年耽误了一代人，主要是指没能让他们的子女都上大学，没能培养出精神贵族，没能选拔出他们所需要的接班人，没能使少数读书人迈进脱离劳动人民的知识精英的阶层。而贫下中农，广大的社员群众则认为，文革十年使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都能得到教育，都能学到知识本领，这是穷苦老百姓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事情。

讲起农村的医疗卫生，运河地区革委会成立后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人民公社的社员早就羡慕城里人和干部们的公费医疗，在革委会成立后就狠抓了这件事情，这就是根据毛主席教导，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建立农村赤脚医生制度。

赤脚医生是个非常形象的称呼。无论是把脉问诊的老中医，还是穿着白大褂带着听诊器的西医大夫，过去给人的印象总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决定着人们的病痛和生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城市老爷卫生部”，落实了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解决了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难，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赤脚医生，可以和农民一样赤脚下田上坡，又可以赤脚走门串户给农民看病治病，是一种扎根农村，完全农民化了的医生。赤脚医生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大医院抽调出来的医护人员，二是由公社、大队选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或一定文化的人员进行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的待遇和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等经费开支，国家发给一部分，生产队生产大队补助一部分。

赤脚医生打破洋框框，发掘中华医学宝库，在中药配制、针灸推拿等方面走出了适应中国农村需要的医疗道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对地方病、常见病、疑难病进行了大胆探索和研究，做出了许多领先世界医学水平的贡献。

由于赤脚医生制度强调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中西医结合，就地取材，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有个小病小灾，社员只要拿上医疗证，到大队卫生所就可以看病、拿药、打针、治疗，不花一分钱。重病、大病需要到大医院治疗时，大队或

公社开个介绍信，费用大部分由大队、公社拿，病人只拿小部分，有的大队、公社公共积累多，也可以不让社员个人拿钱。

赤脚医生还担负着宣传卫生知识、预防疾病传播、建立卫生检查制度的任务，通过宣传和检查督促，让社员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疾病减少，地方病，常见病得到有效控制，都与赤脚医生制度有关。

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动知识分子，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吹捧的知识精英来说，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而对运河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文革时期成了革命文化大普及、大提高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

运河地区革委会成立之后，旧的文化被批深批透批臭，新的文化在萌生、发展、建立。

首先，革命样板戏大普及。连目不识字的老汉，也能哼几句《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词，李铁梅更是大姑娘小媳妇模仿演唱的榜样。田间地头，打麦场上，饲养棚里，清晨上工的路上，夜晚静静的河边村头，都会听到学唱样板戏的嗓音。

大家并不满足京剧唱腔，还把样板戏进行翻版移植，改成地方上的柳琴戏、吕剧、豫剧。

自编自演自唱的文艺节目就更多了。几乎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随时把好人好事好风尚编入歌唱的节目中，也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新问题，把刚刚暴露的坏人坏事反映在文艺节目中。各大队互相比赛，相互交流，时常邀请其他地方的宣传队来自己大队

演出。

其次是组织体育活动。过去，只有大的学校，城里单位才能组织体育活动。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的思想解放了，交往增多了，精神愉快，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大家因陋就简，组织起兰球、排球、乒乓球、拔河等项活动。这可是农村亘古未有的新鲜事。经常举行联赛，友谊赛，打破了村与村，大队与大队，公社与公社的界限，增强了交流，特别是青年男女接触的机会多起来，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得到切实的实行。

还有，文化大革命中民兵工作组织得普遍而且效果好。青壮年社员上操跑步已成家常便饭，真枪实弹的演习也不是稀罕事。开天辟地，历代统治者，怕人民造反，总是对农民耍枪弄棒十分恐惧，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更是对人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维护他们的“团结和稳定”，不准群众上访，三令五申收缴民间枪支弹药。连农民的猎枪，玩耍用的大刀长矛，也成了颠覆他们统治的可怕武器，严令交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与文革时期的全民皆兵，全民武装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这些文娱、体育、民兵等集体活动，大大拓宽了人民公社社员的视野，开阔了青年男女的眼界，友好的交流，友谊的培养，已不限于本村、本大队、本公社。大家的革命情操，衣着打扮，风俗习惯，都互相影响，共同进步；各种形式的友好往来，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同志式的竞争比赛，都健康地发展着。发育成熟的青年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他人介绍地谈起了恋爱，自主地确定了婚娶形式。

因为各种集体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使他们有了商谈今后如何组建家庭的时间和能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都搞得很好。地区革委会和各县革委会的任务，就是树立典型，帮助落后社队，随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把工作都搞得很好。

生产队搞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专门作了调查。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由于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人的思想，人际关系变得单纯起来。谁也不需要依靠谁生活，谁也不需要看谁的眼色行事，大家都是平等的。只要一身正风，好好劳动，不对的敢说，错误的东西敢管，一个优秀社员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那么为什么搞不好呢？关键在领导。人们常说，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又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生产队的领导人尤其是个关键。一个生产队长必须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能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不受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派歪理邪说的蛊惑；还要有革命干劲，不能三分钟的热度，要事事处处走在前面，劳动带头，工作第一，能掌握农活的一般规律，有事同社员商量，同时，生产队长必须办事公道，坚持正义，不谋私利，敢与歪风邪气作斗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威信。大队、公社一定要注意培养出好的生产队长，给生产队长以支持和指导。

在生产队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生产队长的素质。安排农活时，

有没有把轻活、便宜活（出力少，拿工分多的活）自己去干或委派自己的亲属去干？雨后的下种，锄草是否及时安排？收割时是否精打细算，颗粒还仓？劳力的调配是否恰当？分配实物和现金时，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怎样兼顾才是正确的？等等。这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活跃的“斗私批修”的素材。如何抓住这些素材，描绘社会主义的图画，生产队长的担子很重很重。

运河地革委成立后，根据调查的情况，协助各县革委会，在公社、大队配合下，抓住解决生产队长这个关键问题，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生产队有 80%变了模样，成了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单位，从而整个运河农村来了个大飞跃。

运河农村巨变的内容还很多很多。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贫苦的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更使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在下层的贫苦人们，广大妇女，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获得了更多的做人的尊严。一系列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旧传统受到批判，一系列新风俗新习惯建立起来，干群之间，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家族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充满了社会主义新风尚。结婚只讲感情基础，不讲排场不搞形式，不送彩礼不大吃大喝；丧葬改革，全部实行火化，不搞庸俗的守孝活动，不搞宴请宾客；过年过节，打破了门第观念，扫除了尊尊卑卑、上上下下的壁垒，生产队搞集体聚会，其乐融融，社员一家亲。农村出现“三少”；打架斗殴的少了，不孝敬老人的少了，小偷小摸，各种犯罪活动少了。有的大队不光“少”，而是根本“绝迹”。

写农村的巨大变化，还应看到水、田、路、住宅的变化。运河地革委和各县、公社、大队革委，在农村这些硬件的建设上更是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农村虽然有了生产队、大队的统一管理，但住宅还是分散的，道路是崎岖不平、九曲十弯的，田地的调整，还不到位，还有许多小块地，交叉地（队与队，社与社地块的交叉）。由于田地的位置还存在问题，沟、渠、塘的布局就不尽合理。

所以，各级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进行了建排房，整修道路，调整地块，进一步兴修水利的工作。

社员住宅排房化的设计，基本上是以生产大队（村）为单位进行的。规定好每户宅基地的大小，取直村庄的中心大道，在大道两侧依次建房，每两排之间有小街道连通。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大节省了住宅用地，把那些多占的荒芜的院落、闲地都改造成很好的耕地。困难是要拆掉一些不符合道路规化和排房要求的旧房建新房，给社员个人增加了负担。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给予补助，有物质的，金钱的，也有人力的。绊脚石是些大宅院的社员，不愿放弃多占的宅基地，设置了不少障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开展斗私批修，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大部分思想通了，个别的不通也得通，因为他们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大队（村）排房化的推广、实施，使街道有人扫，雨水有处排，卫生条件好了，厕所规范了，蚊蝇彻底减少了。有的大队、生产队还建立了沼气池，供社员烧火做饭，减轻了空气污染，使天空也变得更

蓝了。整个农村，面貌整洁美丽。

田地的调整，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巩固了集体经济，加强了大队、公社的领导，才能得以实现。土地质量的优劣，离村庄的远近，水利条件的好坏，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使地块的调换得到成功。调整后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地块大了，易于平整，机械化耕种方便了，机井浇灌顺利了，再加上四通八达的水渠，池塘，做到旱涝保丰收。

运河地区大部分是平原，有一部分丘陵，还有一些湖地（南四湖周围），需要分别治理。特别铭记在运河地区人民心中的是治理洪山口工程。

洪山口是当时运河地区所辖的滕县、邹县的分界线，连结运河地区和枣庄市的济枣公路就在此处通过。这里的山坡，由于缺乏治理，光秃秃的，只有少数可数的酸枣树生长。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人民的意愿，学习大寨精神，解决洪山口两侧大队可耕地少的问题，发动全区人民大战洪山口（邹西会战）。

动员的劳力主要是滕、邹两县各大队的社员，同时，各机关、各单位、各学校，甚至工矿企业，商业财贸卫生系统，都抽调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洪山口的建设。

费时两年，上百万人次参加，硬是在洪山口南北两侧开垦出数千亩肥沃的梯田，附近山峦都栽上了松柏和果树，不少机关、学校还包种了试验田，建立了劳动基地，荒凉的洪山口变成了花果山、米粮川。每逢大忙季节，山南山北，红旗招展，人群簇动，歌声、劳动的呼喊

声回荡在山谷。

洪山口的建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见证，是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一座丰碑。

这是治山的伟绩，下面是治水的一个侧面。

附：难忘红卫河——赴红卫河工地慰问演出追记

红卫河，可以理解为红卫兵河，也可以理解为红色保卫者的河。

听到“红卫”二字，革命的人民马上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是伟大导师毛主席亲自率领亿万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大搏斗的年代，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年代，是红卫保卫者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年代。

当然，走资派对“红卫兵”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对“红卫”二字心有余悸，在他们篡党夺权成功之后，首先把“红卫河”的名字去掉。所以，从二十世纪末的山东省或运河地区的地图上，已找不到“红卫河”的名字，把它改成了不伦不类的“东鱼河”。然而，河在、桥在，当年镶嵌在桥墩上的“红卫河”三个大字，依然熠熠生辉。这活生生的史实，是小丑们永远也抹不掉的，红卫河两岸受益的人民群众，会永远铭记“红卫河”的恩德的。

红卫河位于运河地区西南部，东西穿过鱼台金乡两县，与菏泽地区成武县河段连结。红卫河是条地地道道的人工河。

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平原的接触带上，有西北——东南的带状湖群，通常称为鲁西湖带，运河以南的叫“南四湖”，运河以北的叫“北五湖”。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从湖群中穿过，把鲁西湖带同海河，黄

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沟通在一起，在全国交通、水利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对南水北调更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南四湖包括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微山湖，四湖南北连通，宛如一湖，绵延 150 公里，总面积 1375 平方公里，把运河地区南部分成湖东，湖西两部分。

湖西的鱼台、金乡两县，地势低洼，经常受到黄河、淮河、湖水灾害的侵扰，解放前经常处于“洪水漫流，庐舍为墟，田禾尽浸，人畜漂流”的悲惨境地。解放后，开挖疏浚了沿湖河道，不仅提高了防洪排涝能力，免除了灾害威胁，也为两县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

金乡、鱼台两县从六十年代初，响应毛主席“以粮为纲，发掘农村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伟大号召，进行因地制宜，科学种田，推广种植水稻，使大量闲置和荒芜的涝洼积水地派上了用场，特别是水稻优良品种的培植和推广，更需要兴修水利，保证稻田的稳产高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省革委的领导下，进行了施工勘测，决定修建一条抗旱排涝，保障金乡、鱼台两县稻田耕作的人工河——红卫河。

红卫河，是运河地区治水史上的壮举，是广大农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民公社社员冲天革命干劲、排山倒海革命热情的真实写照。共组织了全地区农村劳动力数十万人，大战了一冬春，硬是在茫茫涝洼地上开挖河道数百公里，建成桥梁近百座，创造了鲁南地区修建河渠的奇迹。

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元旦过后的严冬日子奔赴红卫河工地的。坐在汽车上，虽有棉大衣盖着，还是把我们冻得挤在一块，在鱼台县城下车时，冻麻的双脚很长时间不敢着地。就是这样，我们一点不感到苦，想到工地上的社员同志在拼命大干，就浑身充满了力量。下车后根本没有休息，就背上行李，步行 10 余里，赶往工地。由于道路不熟，有的走迷了路，闹出不少笑话。一阵急行军，把寒冷驱走了，大家脱掉棉衣，只穿单衣，头上还直冒热气。

来到挖河工地的席棚宿舍，天已黑下来。迎接我们的社员同志连忙把我们安排在暖乎乎的住地，随后做了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

由于晚上有演出，我们忙着化装，熟悉节目。社员同志也不加班了，一些青年人围着我们看。演出的平台早已搭好，晚会很快就开始了。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头戴解放军军帽，带着红卫兵袖章，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舞台亮相，立刻博得黑鸦鸦的社员民工的热烈掌声。接着的语录歌，是台上台下一起唱；毛主席语录的舞蹈节目，我们表演得认真，台下观众看得开心。京剧样板戏的唱段，我们虽然学得不好，也赢得了大家一阵又一阵掌声，因为台上台下的人们，与李玉和、铁梅、李奶奶、杨子荣等戏中人物的感情是相通的。一曲“造反有理”高亢的歌声，把革命造反派的激情煽起来了，有人带头呼喊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党内走资派！”“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致敬！”“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工地上的社员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都激动得两眼直流泪。接下来是批判刘少

奇等党内走资派的活报剧，把战斗在工地上社员同志们往日批斗会的情景，搬到舞台上，使人感到无比亲切、真实，也更激起了对党内走资派的仇恨。大家决心用修好建好红卫河的实际行动，回击党内走资派对贫下中农的污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

由于过于疲劳和兴奋，演出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时各个工棚已没有一个人，全上了河堤。我们急忙吃了早饭，也上挖河工地去参加劳动。

新挖的河床已有两米深，几十米宽。河的两岸、河上河下，满是人，顺着河道方向远看，一眼望不到头。各公社的队旗高高竖起，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各种宣传的红旗，红色宣传标语，毛主席语录牌，插在高处，象一簇簇火苗，非常耀眼。

挖土的、抬筐的、推车的、开拖拉机的，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寒冬腊月，零下十来度，社员们个个汗流夹背，有的干脆赤臂上阵，连单褂子都不穿了。由于实行了民兵编制，分工明确，整个工地进行得井然有序。

有一段河道已经挖成，正在修建河坝。分配干这项工作的人，真是一丝不苟，坡度一点不差，坚实程度一点也不马虎，不符合技术要求的，马上返工，推倒重来。

最令我们惊喜的是，休息的间隙，一个公社的社员民工们还自发地组织了小型批斗会。原来，有一个进行劳动改造的地主分子，来到工地，参加劳动不积极，还自言自语地说怪话。有个社员听到后，给别人一学说，大家都很气愤。在休息时自动围拢在一起，把地主分子

叫来，让他坦白交待。

虽然，在工地上，我们没能干多少活，只能铲铲土，帮助推推车，但是我们体验了劳动的快乐，学习了贫下中农忘我的劳动精神。

虽然，这次红卫河工地宣传演出只进行了五场，只接触了五个公社的贫下中农群众，但却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以致于 30 多年过去了，我们还非常自豪地向人们谈论这悠悠往事的点点滴滴，还非常幸福地向子女夸耀这次红卫河工地之行。

五、运河教育放异彩

运河地区革委会成立后，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狠抓教育革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关于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有过一系列指示和教导。

1953 年 5 月 17 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教育问题讲：“办好学校，首先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着重一些。”

1958 年 8 月 13 日，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时讲：“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高等学校要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教育工作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1年7月30日，毛主席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

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针对学校教育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同年，3月10日，在《对北京铁路二中一封信的批示》中，毛主席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1964年7月，毛主席跟正在上学的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中，严肃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大学生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在实际中学习阶级斗争。

1964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那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

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要“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对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个调查报告批道：“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毛主席谈到教育问题：“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要逐渐的接触实际。”“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中毕业后，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1966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对学生的要求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7年，毛主席作了重要的《三·七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

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1967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8年7月22日，毛主席关于理工科大学问题作了如下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度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8月26日，毛主席下达了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同年9月——10月，毛主席一再明确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对于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毛主席教导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

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见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红旗》杂志第三期）

从以上毛主席一系列批示、指示和教导，可以勾画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蓝图：

一个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大约需要九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学习期间，应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应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从小学高年级起应接受军事训练教育，应逐步把学得的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尽量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

到十六、七岁高中毕业之后，要上山下乡，进工厂，到连队，参加两年左右的再教育，培养工农感情，学习工人、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德，学习一定的生产、生活能力。然后，通过推荐、选拔，去大学继续深造。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推荐选拔的比例逐年增大。

大学，文、理科要分别进行改革。文科应多以社会为大课堂，理科应以课堂教育、实验教育、生产实践教育相结合。大学毕业后，国

家统一安排到各部门、各行业工作，按照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标准，按照工农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需要，使这些大学毕业生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

而不能升入高中、大学的学生，也应推荐选拔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人才。

当前迫切的任务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尽快普及五年、七年、九年的义务教育；在大学招生中，应推荐、选拔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到大学学习，待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基本工农兵化之后，再主要招收他们入大学学习。

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一个学校教育革命的问题，包括教育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学的方式方法、学制长短、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吸收学生参加，使学生变成学校教育的主体，彻底批判师道尊严，消除师生对立，让师生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为了保证学校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贫下中农）参与领导和管理，组成革命学生、革命教师、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相结合的领导班子。而这个班子的成员可以随时进行更换，以保证它的活力和先进性。

实行开门办学，工人（贫下中农）领导管理学校，这样就把学校教育同整个社会结合起来，杜绝了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弊病。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认真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教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普及义务教育。首先，学校设置增多，做到村村有小学，城区小学增加2—3倍，每个大队尽量设置一处初中，每个公社要有一处高中，运河地区的高中由原来的两处增加到7处，并把原运河师范学校提升为运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运河医护学校提升为运河医学专科学校，巩固和加强了曲阜师范学院，这样，使运河地区的高等教育出现了新局面。

其次，实行小学全部免费义务教育，中学大部免费义务教育，高等院校全部免费教育。

2、教师队伍的充实、扩大、调整。把工人、贫下中农中有一定文化知识、有教学能力的优秀分子充实到教育队伍中来，各学校都请了工农兵、老革命干部、劳动模范、各条路线上的杰出人物做兼职教师，或课外辅导员，同时，把原有的教师队伍，特别是小学教师队伍，进行调整，尽量做到教师不出大队、公社，这样便于教师的思想改造，也减轻了由于教师队伍增大而造成的住房、经费等困难。

3、在教材方面，除使用国家规定的教材之外，大量编写了乡土教材。把运河地区、各县、公社、大队的战斗英雄，革命烈士，英模人物编入教材；把本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编入教材；把山东、运河秀美的山河、丰富的经济资源编入教材；把本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及伟大的远景规划也编入教材。

4、学校的管理，体现着党的教育方针、毛主席教育思想的落实。

由于培养目标不一样，不同的阶级对学校的管理也不一样。封建地主阶级培养的是士大夫，读书为了做官，所以一切以封建官僚的标准来管理学校；资产阶级培养的是金钱奴隶，读书为了名和利，所以一切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去管理学校。无产阶级的学校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学校，其管理方法也截然不同。

各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进行建立连排编制的工作。一个教学班就相当于一个排，一个年级可以编成一个连，学校可相当于营、团。任课教师也编入连排，一起进行集体活动。连排干部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担任。学校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与共青团、少先队一样，长期存在。

必要的规章制度，由师生共同讨论，共同制定，共同遵守。出现了坏人坏事要展开说理、批评、斗争。学生对教师的意见可以随时提出，并将得到教师的解答，不论是知识方面的，还是其它方面的都应如此。学生中的不良现象，老师除耐心说服教育和正面批评外，还可以让学生集体进行讨论，辩明事非，提出处理意见。学生、教师、干部，只要有意见，都可以拿起“四大”的武器，进行说理斗争，让管理层的工作时时处处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

5、教育革命使教师的教学担子更重了。以满腔热情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是非常神圣的事业，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改变不行，自己教学方式方法不进行不断的改革不行。过去那种填鸭式的教学，照本宣科的讲授，把学生当成敌人似的考试，以增多课程加大作业量来提高学习成绩的方法，都不符合毛主席教育思想的要求，

都在批判、改正之列。代之以生动活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以少而精、学以致用教学方式，来全面提高学习成绩。

尽管运河地区的教育革命，受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各种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但在地革委和各级革委会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旗帜，取得非常辉煌的成绩。

六、工人阶级的行动

运河地区的工人阶级，在运河地革委 1968 年 5 月 1 日成立之后，充分发挥了领导阶级的威力，在响应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号召中，立了新功。

毛主席在 1968 年 8 月 13 日指示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下面以一个工厂的《文革十年总结》为例，说明运河地区广大工人阶级落实毛主席伟大指示所取得的巨大变化。

题目：旧貌变新颜

（1）学习理论成习惯 马列主义大普及

过去，刘少奇、邓小平一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他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妄图阻止广大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胡说工人是大老粗，学不懂理论，竭力破坏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厂

出现了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理论学习大普及，路线觉悟大提高。广大工人，经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改进世界观，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忘我劳动。机修车间的工人，已养成了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自习惯，每逢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都是全厂第一个欢呼庆祝、认真学习。经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又必须加以限制道理，批判了“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的修正主义思想，从而使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积极参加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大大发扬。在“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的口号下，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百分之三十。

敢于反潮流，是理论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有的人一心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有的人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为党内走资派鸣冤叫屈，评功摆好，有的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抹杀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于是社会上、工厂内不断掀起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潮流。我厂工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总是走在全地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前列，时时不忘手中“四大”的武器，与反动逆流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与右倾保守思想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我厂现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蔚然成风，除了以班组为单位的一百多个学习小组之外，还组织了十五、六个业余学习小组，举办了四期政治学习班，参加人数 300 多，并成立了政治夜校，学文化学理论，帮助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进步。我厂基本做到了，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正为广大工人群众所掌握，一代能文能武、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人正在茁壮成长。

（2） 参加革命三结合 生气勃勃干劲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涌现出了领导班子三结合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毛主席说的情况十分符合我们厂。经过大批判，我们不仅揪出了厂里的坏人，而且批判了厂领导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需要把政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

我们厂有一名工人代表参加了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还派出了5名觉悟比较高的工人同志参加工宣队，进驻运河一中和运河师范学校。同时有七名工人代表成为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委员，十个车间，三个处室也输入了新鲜血液，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还有五十多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革命造反派入了党，更有一名革命造反派的青年工人成为四届人大的代表。

实现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大变样。老干部接受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训，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认真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虚心向工人学习，向青年干部学习。青年干部有朝气有活力，但经验不足，需要中、老年干部的言传身教。这一点厂党委书记老韩和党委付书记小李配合得很好。他们一起下车间蹲点，有事一起商量，互相取长补短，工作很有成效，受到全厂工人的赞扬。经过摔打锻炼，一批有觉悟有能力的工人新干部成长起来，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革命的好传统好经验，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厂工人参与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成为带领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战斗指挥部。

（3） 建立理论队伍 做到能文又能武。

工人理论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又一新生事物。在我厂，一支朝气蓬勃的工人理论队伍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全厂15个工人理论小组，扎根在工人群众之中，分布在各个车间处室，学习理论起骨干作用，反修防修起尖兵作用，大干社会主义起带头作用。无论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还是在评论小说《水浒》，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以及反击一次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中，都是一马当先，给全厂工人树立了表率，在全运河地区也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批林批孔中，有的工人群众对孔老二儒学的本质认识不清，又由于曲阜就在运河地区，孔老二的影​​响较深，再就是对林彪与孔老二的思想联系挂不上钩；在评论《水浒》刚开始时，有的人对宋江“只

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实质搞不清楚；在一次次刮起右倾翻案风时，个别人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性质存在糊涂思想，对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孔老二、宋江等人的思想体系模模糊糊，难以找出内在联系。针对这些问题，理论小组的工人同志把群众学习中的难点，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教导，学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重点选学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的著作。在理论小组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写文章、出黑板报、广播、开宣讲会等，把群众中存在的难点、疑问逐一解决。

例如，讲孔老二的修身养性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抽掉了阶级内容，是愚弄人骗人的思想；讲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的维护旧秩序，强化官僚特权体制，一心想当国家主席（相当于皇帝），这是从孔老二“克己复礼”，顽固维护和加强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那里学来的；讲邓小平搞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把社会主义倒退到“巩固新民主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让劳动人民重遭二茬罪，重受二遍苦；讲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国家的总头子，农民要翻身得解放，就必须打倒皇帝。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他反贪官的目的是为了效忠皇帝。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占据了领导地位之后，就想架空毛主席，搞他们的所谓清官政治，实质是想做皇帝，保护他们

那条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与宋江的思想实质是一致的，是宋江“把晁盖摒一百零八人之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花样翻新。宋江是农民起义的叛徒，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宋江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宋江被革命人民所唾弃，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也会遗臭万年！

所有这些，只有学习了革命理论，学习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了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导，才能明确起来。大家这时才真正认清了孔老二维护封建统治的发动本质，认清了宋江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反革命真面目。结合现实的斗争，大家就比较容易识破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可耻伎俩，从而认识到毛主席号召“学习理论，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的伟大意义，这样就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

全厂共办工人理论学习班三十多期，有八百人次参加，有一百多人登台演讲自己的心得体会，共写出一百五十多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有的还被运河地区的报刊、《大众日报》等选用。现在，各理论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加，研究的课题也更广泛，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学艺术、国际形势等内容，也列入了理论小组的计划。工人理论队伍的出现，把群众性的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使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4） 占领文化阵地 大力兴无灭资

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盘踞着思想文化阵地，封、资、修的黑货到处泛滥。那时候，我厂也有少数工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

通过文化大革命，冲刷了修正主义路线保护下的“四旧”，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使思想文化阵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我厂，思想文化阵地已被工人阶级占领。到处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到处是进行思想教育的课堂。革命样板戏这一新生事物，象烂漫的山花，越开越茂盛。许多班组都有教唱革命样板戏的，工人几乎个个都能哼几句样板戏的唱词，大家都用样板戏中的英雄形象激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斗志；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茁壮成长，几年来，工人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就有八十多个，有的还被运河地区出版社出版；宿舍区成立了向阳院，看革命书籍，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已经蔚然成风。工人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必将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5） 生产战线三结合 技术革命开红花

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人员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做到了三破三立：破技术人员“高明”的思想，立拜工人为师的决心；破技术私有的观念，立全心全意为全厂事业服务的思想；破书生气的旧习，立拼命干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他们还迈开双脚，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接受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

几年来，我厂科技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共同搞设计，搞科研，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六十二项技术革新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十一项被全系统推广学习，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毛主席指出的“科学技术人员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是一条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工业建设的金光大道。我厂科技人员现在已坚定了走三结合的道路，并获得了政治思想、劳动生产双丰收，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被选拔为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还有不少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科技人员同工人相结合，实行开门搞设计，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厂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科技人员与工人群众，与生产实践的三结合，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坚持和发展这一新生事物，就是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最有力的打击。

（6）改变旧观念 大立新风尚

这一方面的工作牵涉到很多具体问题，我厂只总结以下几个方面：

A. 彻底解决男女同工同酬问题。过去，总是把男工人的工资标准定得比较高，有些活妇女同志能干也不让她们干，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女工们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坚决执行同工同酬政策，把妇女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不光各车间、各工种都有妇女同志挑大梁，而且把表现突出的女工人选拔到领导岗位。这些变化，是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是对孔孟之道对妇女诬蔑的有力批判。

B.六七十年代以来，我厂就注意抓了计划生育工作。这是个崭新的问题。由于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残酷统治，再加上常年战争的破坏，使得全国人口锐减。解放之初，我国暂时不提计划生育是正确的。现在，人口问题已摆在党和政府面前，所以毛主席号召要优生优育，节制人口的增长。我厂做这项工作时阻力大，主要是一些旧观念作怪，认为“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不愿做节育工作。经过批林批孔，这个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大多数人树立了新的生育观，基本做到了“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受到运河地革委的表彰。

C.解决了“关心人民生活”与“物质刺激”的区别，树立全心全意为厂职工服务，逐步增加福利待遇，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新观念。文化大革命中，我厂盖了两座职工宿舍楼，解决了部分职工的住房困难。在分配住房时，让困难职工、第一线工人先住，所有的干部都暂时不分住房，待绝大多数职工都分配到住房之后，再考虑干部问题，打破了刘邓路线影响下的“领导干部先住房住好房”的资产阶级行为惯例，赢得了全厂职工的一致好评。

另外，除实行全部公费医疗之外，这几年我们厂在子女教育问题，老职工的退养问题，病残职工的照顾问题等方面都批判了旧规定，立了新习俗，处处渗透着共产主义的因素，成效十分显著。

D.工资观念大改变，公共福利大发展，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进一步限制，全厂上下处处体会到社会主义的温暖，处处洋溢着共产主义朝气。

这些都有力地驳斥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修正主义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意攻击，他们胡说什么“革委会只管生产，不管人民的死活”，“只知道政治，就是不知道人民的生活”，“光批物质刺激，就叫人民去喝西北风”。这是别有用心的造谣，这是党内走资派对工人阶级的恶毒报复。

（7）企业管理变化大 工人作主又当家

在我厂广大职工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大批修正主义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自觉做好国家的主人，企业管理由过去的“管工人”变成“工人管”。广大职工认识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善生产关系，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大问题。因此，大家都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把全厂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主人翁的态度帮助领导干部把好方向、路线关。

三车间工人理论小组，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了“当好社会主义的家，理好社会主义的财”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有理论、有实际，对如何使工人参与管好企业的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代表了全厂工人的心声。它提出的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企业的八大措施，得到厂领导的重视和采纳，有

力地促进了全厂的企业管理工作。

（8） 抓住根本学大庆 一代新人在成长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骗子破坏工业学大庆。那时我厂虽然也喊学大庆，但没有抓住根本来学，只走形式摆花架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端正了学大庆的方向，认识到大庆的经验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抓住这个根本学大庆，就学到点子上，就可以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使我厂跨入学大庆的先进行列。

在抓根本上，我厂曾展开过群众性的大讨论。通过讨论，解决了以下问题。

首先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工厂中的分别表现有：是首先考虑社会主义企业的整体利益，还是只追求本单位的利益；是让工人明白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大干苦干拼命干，还是诱导工人为了个人利益去干活；是充分发挥工人的革命自觉性还是用物质刺激来发展自私自利的自发性；是把创造的财富贡献给全社会还是分配给一部分人去拿高工资高奖金；是用企业的发展远景展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还是把企业的发展变成个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是把工人作为企业的主人还是使工人变成“管、卡、压”下的奴隶；是拼命大干还是光说不干；是把领导干部当成普通一兵，还是让领导干部变成高高在上的工头和老板。

其次，应弄清，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一类骗子不让学大庆，或不把学大庆向正路上引？要批判他们的险恶用心，要挖出他们的真实目的。

明确了以上问题，我厂学大庆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热火朝天的局面，涌现出大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现在，全厂已有三个车间成为运河市学大庆先进集体，一百零三人成为先进工作者，大批优秀工人入了党入了团，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有的被推荐选拔上了大学。学大庆运动培养了工厂企业的革命接班人，为我厂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奠定了基础。

（9）集中兵力搞会战 “龙江”风格大发扬

在文化大革命中，“龙江”风格家喻户晓。“龙江”风格就是革命样板戏《龙江颂》表演的共产主义风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继续革命的方向就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无论斗争党内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还是斗私批修，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是为了扫清向共产主义迈进时道路上的障碍，使前进的步伐加快。

现在，我们厂革委会在运河地革委的领导下，学习和发扬“龙江”精神和风格，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集中兵力搞会战，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齐动员。这些会战有车间与车间之间进行的，也有我们厂与外厂之间进行的；有攻克技术难关的会战，有解决原材料的会战，有生产机器部件方面需要的会战，也有整体组装方面的会

战，更有基础建设方面的会战。会战，使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最大限度的利用；会战，使斗私批修开展得红红火火，使共产主义精神落到实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厂一车间的人手少，任务重，往往完成任务有困难。三车间知道后，每次都是自觉地、义务地替一车间分担任务，抽出人力去支援一车间。这样的事例，每个月，各车间之间都会出现。由于厂房扩建，我厂的生产任务一时没能完成，兄弟厂马上调人来支援。兄弟厂在上项目时，遇到了技术难题，我厂知道后，立即派技术员和老工人，带着我们搞出的图纸，前去增援。

我们的经常性会战，体现了资源共享，技术无私，人多力量大，社会主义是一家；无私无畏干劲高，上天入海都不怕。只有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10） 革命解放生产力 促进经济大发展

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纤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的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内债，又无

外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还找了一些可靠的数据，向全厂职工宣讲，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如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都是1975年全部完工投产的；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等大型煤矿；电力建设有刘家峡水电站的投产发电，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大型火力发电站的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八条主要铁路干线的建成通车，长距离输油管道的完工，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的竣工，人工胰岛素的合成，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

同时，我们厂的实际发展也说明文化大革命是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效益、生产建设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厂从1965年不足百人的小厂，经过十年，已发展成近千人的大厂，工人人数增长近10倍。厂房面积增加4倍多，固定资产翻三番，产值增长15倍。由于在治厂过程中，厂革委会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激发了广大干群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工厂的发展、建设和生产中，大家豪迈地提出：宁叫汗水遍地流，不叫任务拖一天，革命加拼命，大干促大变。我们厂年年、季季、月月都超额完成任务，劳动生产率比一九六五年提高一倍

多。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已稳步向低工资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方向迈进。文化大革命期间，绝不能以工资多少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公有制，一是不能拉大工资距离，特别是不能拉大干群之间的工资差别。干部与群众保持一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能享受高工资，而最多只能与工人中最高工资持平。二是工资的基本部分应体现在共同福利之中，这是不算工资的工资。工厂的共同福利有几十项，而且逐年还要增加，连洗澡、理发、手巾、肥皂、洗衣粉、用水用电、用煤（煤气）都是免费的。一年四季开水供应（包括家庭），消暑降温解渴的饮料，一年几换的工作服，这些又能折合多少工资？再加上粮、油、菜的平价供应，一切吃、穿、用、住、行的低价消费，又能折合多少工资？我厂从前年开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工人子弟全部免费，连课本、作业本、笔都是免费的。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厂的共同福利会越来越多。

从我厂上述仅仅列出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只有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工人阶级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担当起领导一切的历史使命。今后，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巩固和发展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迎头痛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妖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

七、必由之路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政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办了“五·七”干校，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在本地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照“五·七”指示办，是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广大青年学生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没有思想革命化，光有经济基础的变更，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所以，这两个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

“五·七”学校（干校）来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是毛主席绘就的一幅幅各行各业的革命蓝图。按照这些蓝图，全国到处都会建成“五·七”学校，那么，为什么还要单独办“五·七”干校呢？

这是因为：①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的把持下，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队伍逐渐庞大，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计划经济得到完善和巩固，需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②由于一些干部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较深，有的成了走资派，需要经过集中学习、劳动的再教育，转变其立场观点，才能再继续工作。③一部分知识分子，既受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又受刘、邓路线的影响，世界观还是旧的，不集中进行学习、劳动、改造思想，不能解决世界观问题。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所以才专门对上述人员开办“五·七”干校。

机关干部，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城里，只知道坐办公室的知识分子，对于“五·七”干校这种上班形式，一开始是难以接受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毕竟触及了大部分人的灵魂，要想消灭三大差别，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就必须接受生产劳动的锻炼，就必须有吃苦的准备，就必须有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决心。

全国最早的“五·七”干校，是黑龙江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其学员大部分是机关干部。那些长年从事文职工作的干部，托土坯，和泥灰，挖房基，干瓦工，很快就干得得心应手，一座座新房就是在他们手中拔地而起。“五·七”战士象当地农民一样，种粮种菜，养家畜

家禽，又脏又苦又累。上田间劳动，每天要往返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路程，没有吃苦精神不行，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不行。结果，经过半年多的干校生活，大家精神、思想、身体都有了大变样，深深体会到这是一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办“五·七”干校真是个好办法。随后，柳河“五·七”干校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

当然，思想锻炼有个痛苦的过程。公安部“五·七”干校的总结中曾写过这样的事情：

“去年八月的一天，二排正在锄高粱，突然乌云密布，暴雨欲来风满天。一些青年学员扛上锄头就往回跑。当时我们军宣队考虑，这正是他们害怕艰苦的表现，如果让他们回去，就助长了他们的娇气。我们作了动员，谁也没有回去，继续坚持战斗，直到把地锄完，雨也哗哗地下起来，大家的衣服都淋透了。事后，许多青年深有感触地说：大雨淋透了我们的衣服，但冲刷了我们的娇气，磨炼了我们的意志。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青年们已养成了不怕大风大雨，顽强作战的作风。今年七月，在一次支援兄弟队的夏锄战斗中，天气突变，乌云四起，顷刻间雷雨交加，但是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越干越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运河地区的“五·七”干校设在南四湖农场。干校周围有农民，有渔民，农场内有工人，干校学员都按连排编制。由于地处湖滨区域，夏季蚊子特别多，冬天又很冷，净是黑土地，耕作比较困难。但“五·七”干校的学员都表现得很出色，当地群众高兴地说：“当年的八路军游

击队又回来了。”学员中的老干部也激动地说：“解放十几年，当了干部，只知道在上面开会，发号施令，脱离了群众。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现在又回到水中，我们才有生命，才有活力，才能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块奔向共产主义。”

运河地区的“五·七”干校，前前后后共有一千多名学员。大家都是满怀革命豪情而来，带着丰收的硕果又奔向新的工作岗位。以致30多年过去了，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当年的学员还幸福的回忆“五·七”干校生活、战斗的情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修正主义分子、无耻文人污蔑“五·七”干校是“监狱”，是“劳改队”的可恶行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通过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向全国发出的。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学生，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具有巨大的革命热情，“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成了做人的最高准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女知青侯隽，邢燕子等人就给广大知识青年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便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始，六六届、

六七届、六八届中学毕业生，都坚决地热烈地欢欣鼓舞地离开学校，离开城市，离开家庭，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还有很多非毕业生，特别是还在上初中的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甚而不惜与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参加了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列。

运河地区的“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到农村插队落户，除安置地区专署所在地的运河市和各县城的知识青年外，还接收了一部分省城来的知青。他们二十个人左右为一个知青队，到一个大队去，集体食宿，集体活动，分散到各生产队劳动。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非常欢迎他们去，认为这是自己队的光荣，总是想尽千方百计，腾出最好的房子让知青住，安排最热心的贫下中农社员给他们做饭，叫最可靠的社员带领他们干活。公社、大队都有专门干部负责他们的工作、学习。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七年，每年都有几千名青年学生分别到各知青点去，每年也有成百上千名经过锻炼的知青因招工、升学返回城里，也有部分知识青年在当地做了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大队、公社的干部，甚至有的结婚生子、安家落户。

这些知青生活、学习、劳动、思想，到底怎么样呢？下面摘录几篇当年的知青日记，就可以一清二楚。

一九六九年×月×日

终于挣脱了牢笼，坐上了上山下乡的汽车。“我解放了！”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呼喊。那震耳的锣鼓，迎风飘扬的红旗，千万张欢送的笑脸，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瞅见妈妈站在人群的后面，望着我掉眼泪，我一点也不心酸，也不心软，更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

这几天，我就是斗争中度过的。其实，斗争从我参加革命造反派红卫兵那天就开始了。父亲是地区文化局的头头，是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又沾染了一身官僚气。由于我是独生子女，从小在溺爱中长大。小时候，只觉得父母百般疼爱，吃的穿的用的也比别家女孩子好，心里乐滋滋的，认为很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总感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一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不一样更大了。父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全在家庭中宣泄，我成了反对派，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我干脆不愿回家了，住学校集体宿舍，住同学家。

前天，学校一号召上山下乡，我第一个报了名，接着回家告诉了父母。这下可炸了锅，他们软硬兼施，就是不让我去，最后把我姥姥，大姨都搬来，做我的工作。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决不改变主意。他们的心意，我是看透了，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大学生，过更优越的生活，甚至透露要把地区书记 B，那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介绍给我做朋友，这样父亲的官会继续上升。我愈听愈生气，要不是赶紧准备下乡的衣物，真想马上给他们贴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三年了，他们除了冤气怨气不服气，就是一身难改的资产阶级臭气，他们真该深入到工农之中去改造。听说，运河的“五·七”干校办起来了，他们也许马上会去的。我管不了那么多，匆匆忙忙拿了提包，跑到同学家过了一夜，今天踏上了革命征途。车上的喜闹劲，革命口号的呼喊声，雄壮悦耳的青春歌曲，给我鼓舞和力量，使我忘掉了一切烦恼，象天上的鸟儿，飞向新生活。

一九七〇年三月×日

给我们这个知青点做饭的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爷爷。他身板硬朗，做饭的手艺很好，18个人的吃喝全由他一个人完成，每天都是变着花样吃，粗粮、细粮、蔬菜，搭配得很科学，隔天就有或鱼、或肉、或蛋，改善生活。有时，同学病了，他亲自把面条端到床跟前，碰巧没有鸡蛋，他就拿自己家里的，从来不要一分钱。他把我们比亲儿孙还疼，我们感到他比亲爷爷还亲。

今天，我们分成三个小组进行社会调查，准备写一部村史。我所在的二组是去访问一位七十岁的老奶奶。

这位老奶奶一生有过八个孩子，七个在解放前都夭折了，只有第八个是解放后已四十多岁生的，活了下来。解放前受的那个苦，我们听着都心酸落泪。可老奶奶非常开朗，心劲很高，1958年就识了二、三百个常用字，近几年学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非常积极。她说：“旧社会的苦记住就是了，问题是现在怎么走。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硬要停止革命，还用蒋介石的老办法治理咱们中国，这个心眼就坏透了。我们大队搞得不怎么好，并不是社员不愿走集体道路，是一些干部有私心，不好好领着干，光想着自己的好处，不算队里的发展。这能说毛主席领的路不对？俺公社不少大队都很好，我们得向人家学习，选个好带头人，听毛主席的话，奔社会主义。”

一位农村老太太从解放前说到现在，有这样的见识，真让人佩服。我得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一辈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

今天听了大队组织的一次批林批孔报告会，受到很大震动，政治思想认识有了极大提高。

作报告的是县革委付主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头头，年龄二十出头，长得很精神。他讲的内容有三处，给我以极深的印象。

一是林彪为什么自绝于人民？他说，林彪有野心，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为什么一个有功之臣一下子会变成人民的罪人，这就有更深层的原因。林彪想接的毛主席的班，从一开始他就没认识到，这个班不是资产阶级的权势班，而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班。正因为这样，林彪认为打倒了刘少奇，他这个接班人名正言顺地应该当国家主席，建立自己的一套权势班子，继续作威作福统治人民。林彪死抱着权势高于一切，“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毛主席针锋相对，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权是为路线服务的，路线是政权的灵魂。毛主席一眼看出，林彪是抱着建立自己的权势而接班，这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路线的，所以革命的班不能交给这样的人。林彪如果不是遇着毛主席，而是遇着和他的政权观、世界观相同的人，那就不需要搞抢班夺权的阴谋，而会感恩戴德，顺顺利利地接过权势班。

第二个地方，他讲得更是振聋发聩。他说，毛主席通过刘少奇、林彪两个所谓接班人的失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很有可能被世界观没改造好的人篡夺去，从路线上一变，政权就从本质上来个转换。所以，毛主席在挑选一两个高层接班人的同时，十分注意培养一代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即使一两个人没选好，千百万人还有

选择的余地，还会接过革命的火炬，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传递下去。而在要培养的千百万接班人中，也应该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广大上山下乡的知青同志。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键看是否掌握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在于当不当干部。

第三个地方，他讲到，为什么毛主席说林彪是形“左”而实右，也十分深刻生动。

他说，人们都批判林彪是极“左”，报纸广播上也是这么宣传。林彪爱说绝对话，把真理引向谬误，蒙蔽群众，让人看上去象极“左”。但他一心想接权势的班，又是在毛主席的大树下，不来这一套，他能混下去吗？但林彪的这一套只是手法，是策略，是现象，不是本质。本质与刘少奇一样，建立资产阶级的权势班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难道不是右吗？所以毛主席说林彪是形“左”实右，鲜明地刻画出它的本质。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批极“左”，把人民群众中发自内心的热情也当成极“左”，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过冲击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当权派，也有走资派，一肚子怨气、冤气、不服气，正无处发泄，借着批极“左”批到群众头上去，这就很容易把毛主席的本意和革命人民的激情及愿望，统统批掉。

一九七三年七月×日

最近，我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

接班人的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

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毛主席说的是“大多数”，这既与“少数人”相区别，也与虚伪的“全体”相区别。这样，就与“全民国家”“全民党”划清了界限。世界上哪有什么“为全体人类”，“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行为？人都是有阶级性的，只有劳动人民才是人民的大多数。一个生产队、生产大队、一个公社，劳动人民、贫下中农总是占大多数的。我就是要立志为这些人谋利益。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做到公而忘私，肯吃千般苦，肯历万般难，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上山下乡就是最好的历练。实际上，一个人只要心中装着大多数人民，个人享受就会最少最少，只要保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

我看现在大多数干部还做不到这一点，离巴黎公社实行的原则还相差很远很远。据说，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时，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授，成立专门班子，研究苏联高层领导的腐败问题。根据他们的研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两次减薪。这两次减薪招来不少非议，不少高级干部牢骚满腹，中下层干部也有的随声附和，跟着起哄，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埋怨十几年不长工资，没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享受。

我们整天高喊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么就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象雷锋那样。我相信，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我们青年人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一代新人一定会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

一九七四年八月×日

今天上午我随八队社员到村北锄地瓜地。

我认为锄草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用劲锄就行，谁知一锄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光看着人家社员们锄得又轻快又自如，动作象舞蹈一样，一左一右，野草一扫而光，地瓜苗鲜活显眼的挺立在锄过的土地上。而自己，原来感觉不重的锄头却变得越来越沉重，深一锄浅一锄，渐渐地落在最后边，最糟糕的是连着锄掉了两棵地瓜苗，我认为别人没有看着，把锄掉的地瓜苗埋藏在土里。人家到地头，我才锄到地中间。队长顾不上休息，赶紧帮我锄起来。他边锄边给我进行示范讲解：锄地要深浅适中，过浅了既不能松土，又不能把草连根锄掉；过深了，容易伤着庄稼的根，又太费劲。锄的过程中，要调换姿势，这叫“换舞姿”，先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两脚相距约一步远，从右边锄到左边；然后，右脚不动，左脚前迈一大步，锄头随之甩到左前方，从左边锄到右边。同时，锄苗的根部，要用锄尖，轻轻挖掉苗根部的杂草，这样不会伤了苗的根，更不会锄掉苗。

显然，队长已发现我锄掉了两棵地瓜苗，在休息时，他把我埋在土地里的地瓜苗轻手轻脚地找出来，又重新栽上，并用喝剩下的已经凉了的茶水，浇了浇。这时我已经累瘫了，躺在树阴下，一动也不想动，可是两眼还不时瞅瞅自己锄掉苗的位置，所以队长的行动都一一看在眼里，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真想大哭一场。

我抑制住眼泪，认真做了自我批判：一是把农活看得太容易，一切都认为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学问，进而认为当个农民是非常轻

巧简单的事。实际上，不光锄地，农活处处有学问，当个合格的农民是很难很难的。半个月前，我跟着社员在打麦场上扬麦子，就看出不少门道，比如看风向，掌握风力大小，簸箕举的高度，用力多少，散开面积的大小，都用到不少课本上的知识，而好些又是书本知识没有写道的。掌握不好，扬的效果很差，麦粒和麦皮剥离不开，麦粒和沙石分不清楚。

二是太虚荣，太自私，太不爱护集体财产。一棵地瓜苗被锄掉，就是犯了一个错误，是承认它，还是掩饰它，这是道德品质问题，是个世界观问题。自己在学校高喊“革命造反”，高喊“斗私批修”，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果一开始就虚心向老农请教，不是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也就不会锄不好地反而锄掉地瓜苗；如果对集体财产非常热爱，爱惜它胜过自己的生命，就会非常细心地照顾到每一棵地瓜苗，非常珍惜每一棵地瓜苗。须知，一棵地瓜苗，秋后就会结出好几斤地瓜，生产的收获，就是这一棵棵地瓜，一粒粒麦子，一株株玉米，累计起来的。更不应该的是，把地瓜苗锄掉之后，还埋在土里，以为别人不知道，这是多么可耻的行为啊！

三是自己下乡时决心向农民好好学习，今天真是学到不少东西。队长对农活的渊博，待人的和蔼可亲，舍己为人，处处为他人着想，时时都走在他人前头，一切都任劳任怨，真够自己学习一辈子的。对农业劳动，有人认为只有苦和累，而队长他们却乐观开朗欢快得很。不说整个劳动过程他们笑语不断，就说这锄地动作的名称也满含诗情

画意。因为锄地的劳动过程，就象一套舞蹈动作，那么其中一个姿势变换成另一种姿势，叫“换舞姿”，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你看农民多么乐观啊，想像力多么丰富啊，那像自己这么患得患失，只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打转转。

这一天的劳动，我怎么也愉快不起来，虽然后来我已学会了锄地的方法，速度也上去了，并且质量很好，再也没有锄掉一棵地瓜苗，队长还口头表扬了我。我知道自己的路还很长很长，离革命接班人的要求还很远很远，我会努力的，看我的行动吧！

一九七五年 冬

我们知青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走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或者上大学，或者招工去了，也有的在大队当了民办教师，还有五个人安家落户，结了婚，成了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社员。

我是第五批来的知青，正逢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昨天听了一位知青大哥哥的报告，他讲得生动有趣，激动人心。

他说，毛主席和邓小平最大的区别就是，毛主席教人民以公，邓小平诱人民以私。公和私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摘苹果的时候，一位社员看周围没人，正想把一个最大最好的苹果放到嘴里吃掉，一转脸，看见我在后面一棵树下摘苹果，赶快把送到嘴边的苹果放到装苹果的筐里。通过这件小事，他说，这说明每个人都是有羞耻的，都认为自私自利是可耻的。古人讲，知耻者勇。知道侵吞集体财产是可耻的，这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的本色，是毛主席教人以公的结果。而邓小平却大搞物质刺激，说人是自私的，只有物

质利益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这位社员想吃一个好苹果，是种私欲，而且认为这种私欲是耻辱，怕人看见，一旦觉悟了，马上改正，这样今后热爱集体的责任心会更强了，这是对邓小平混蛋逻辑的最好批判。

想不到来到知青点就上了一堂公私分明的理论课，农村真是个大学校，我们的知青点肯定是很棒的。

一九七六年六月×日

现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轰轰烈烈，也取得很大胜利，但我总是很担心。因为邓小平一边说“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一边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是典型的两面派，秋后算帐派，但关键是不是就只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邓小平有多大市场？以后还会不会出王小平、李小平、江小平？况且，毛主席也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他老人家百年之后，邓小平们是不是会重新跳出来？

我又重读了毛主席的《七律·冬云》，前四句“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好象聆听到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可能出现大挫折、大反复的心里话。毛主席肯定预见到，当今世界大多数共产党变修之后，人民革命会陷入空前的困境，革命者将遭受到连藏身之处都没有的劫难，魔鬼们纷纷出笼，弹冠相庆，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事业，都遭到亵渎和贬损。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罪恶，将重新受到肯定、扶持、吹捧，肆行无忌。毛主席的这种预见，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同志的

一封信中也有所表露。无论是“借助钟馗”的警告，还是“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提醒，都是伟大领袖忧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思考。

也许，我考虑得太悲观了，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办事要从坏处着想，向好处争取。现在就做好心理准备，努力磨炼自己，去迎接革命的风浪。毛主席现在让我们上山下乡，就是一种最好的准备。“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年轻的一代，有能力去战胜各种挑战。

五月十六日

八、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给广大人民群众显现了这种“联合体”的一缕曙光。如果说共产主义上是天堂，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通向天堂的金色桥梁。通过桥梁可以到达无比壮丽美好幸福的彼岸；站在桥上，已经眺望到共产主义大厦的风貌。

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高屋建瓴地说：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严格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它也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私有制，粉碎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和全国所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诞生的、而不是穿新鞋走老路的革命委员会一样，在实践着共产党人的宗旨。

仅以“赶社会主义大集”来说，就体现了革命委员会的巨大优越性，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学习辽宁省“哈尔套经验”，在各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把“赶社会主义大集”活动，办成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阵地，办成“人的自由发展”的课堂。

社会主义大集的内容包括物资交流、人才交流和思想交流，而这种交流都是为集体、为公、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互通有无如何进行？依靠个人？依靠小商小贩？这都有悖于共产党人的原则。正确的途径就是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发挥具有商贸潜能人才的作用，调动革命干群的积极性，以满足各集体单位和每个人的需求。

各单位、各生产队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而这些集体中不一定都能把方方面面的特殊人才、杰出分子、能工巧匠都调动起来，利用起来。怎么办？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大集进行交流，各取所长，各补所短，使个人得到自由发展，使集体事业取得更高的效益。由于是通过集体

进行交流，个人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私人生活、家庭安置、到工作环境，都能创造最佳条件。这样，才真正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思想交流更是社会主义大集的一项新鲜活泼的内容。那些说书唱曲的艺人，变为宣传好人好事的积极分子，他们演唱样板戏，进行曲艺革命，从而达到革命思想交流的目的。社会主义大集还增加了一项特别吸引群众的内容，那就是斗私批修的讲演活动。这项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干部，也有个别群众。干部趁社会主义大集的机会，把工作中的失误、思想作风方面的不足、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大胆地亮出来，斗私批修，进行自我革命，并让群众提意见，随时随地监督。这样，把干部的特殊感、优越感一扫而光，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当干部的神秘面纱，真正做到能者上、不称职者下、干部可以随时撤换，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性。

当然，社会主义大集必须有革委会统一协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时间、地点、次数、内容都要做到因时因地制宜。社会主义大集这个新生事物曾受到党内走资派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运河地区这项活动只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良好尝试，就变为时断时续，后来干脆被迫停止。但社会主义大集所闪耀的共产主义光辉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照亮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上面所写“革命委员会颂歌”部分，只能是九牛一毛，只想用一块粗糙的砖头引出人们如椽的大笔，书写文化大革命时代金字塔般的辉煌。

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总有它的合理性，不同的阶级对这种合理性会作出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你诅咒它也罢，你歌颂它也好，它总是存在了十年，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闪光的十年。今后的历史会如何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可以肯定，这闪光十年的点点滴滴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程中反复出现。单以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文革十年，它是加强了。加强的重要标志是政权阶级性的鲜明，阶级斗争理念的深入人心，专政方式由旧式官僚统治、警察专政的国家形式，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统治、群众专政的人民国家。再以经济基础来说，文革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大加强了，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进一步限制，人们以公为主，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还可以用逃脱“其兴也勃，其败也忽”的周期律的尝试，来审视文革十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普遍应用并写入宪法，群众组织、革命大串联等在政治运动兴起时期的广泛运用，不都可以称为是伟大而卓有成效的尝试么！

总之，肯定文革，就应肯定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就应赞扬文革所取得的成绩，就应对文革中打倒走资派的主力军——革命造反派充分肯定。为什么革命造反派从一九七六年“十·六”政变，从邓小平一上台，就马上意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右倾保守势力，即使它的左翼，也直到 10 多年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他们的认识仍不彻底，还认为应该恢复文革前的社会形态，还认为文革有错误，还认为老干部至始至终都是对的，只

是在刘、邓问题上，在现实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有了可喜的进步。两者相比较，革命造反派不是更可贵吗？

不解决对文革中新生事物的认识，不解决对革命造反派的正确看法，不去大声讴歌文革时代，肯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句空话！

文革岁月，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可歌可颂可赞可书可写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它像没有开采的金矿，需要人们戴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拿起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开掘，去精选，去提炼；它像一块蒙尘很厚很久的美玉，需要人们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不受形形色色偏见的局限，静下心来，精心擦拭，仔细地洗掉那些不属于它的污点，还它光华四射的真面目。

多年来，那些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被资本主义复辟狂的宣传所愚弄的人，一听到文化大革命就吓得大喊救命，“文革”二字成了灾难的代名词。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革命委员会颂歌”这些真实的记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附 1：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成果(摘自 2000 年出版的《运河市志》)

一、经济建设项目大事记

一九六六年

1、5—11 月，第一条沥青公路完成（岚兗线曲阜至兗州段）。

2、8 月，筹建中国医药公司山东新华制药厂（运河），1968 年建成投产，结束了山东省不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

3、9月，青岛印染厂运河分厂开始兴建，1967年8月棉布染色生产线投产，1968年7月印花生产线投产。

4、9月，兖州矿区自行设计年产150万吨煤的南屯矿动工，1973年12月26日建成投产，这是全省自行设计、施工的大型矿井，也是全省首先采用多绳摩擦轮绞车提升的矿井。

5、9月，学习二极管生产工艺的青年工人，一次试产成功的点接触型锗金键二极管（ZAKI—20系列），填补了运河地区晶体管生产的空白。

6、运河市城区路灯全部改成250瓦水银灯。

一九六七年

1、2月，汶上的植棉经验受到国务院表彰。

2、红卫河动工，1968年完工，历时1年（两冬一春），仅干流挖土方2228.9万立方米投入工时1246万个，投资1041.8万元。

一九六八年

运河电化厂建成投产，年产烧碱2000吨。

一九六九年

1、11月，运河地区化肥厂建成投产，年产合成氨5000吨。

2、11月底，青岛、烟台、淄博等地迁入运河地区企业11个，其中纺织行业5个，机械行业4个，化工行业1个，电子行业1个，迁来职工24300人，有力地促进了运河地区工业发展。

一九七〇年

1、2月，自行设计年产万台拖拉机的山东拖拉机厂在兖州破土

动工。

2、7月，筹建运河矿山机械厂，生产规模为年产矿山设备4000吨。

3、9月，运河公共汽车公司成立。

4、10月，运河合成洗涤剂厂建成投产，年产洗涤粉5000吨。

5、10月，欢城煤矿建成投产，年产煤15万吨。

6、11月，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在泗水县培育推广杂交高粱。

7、于1968年筹建的运河市自来水厂开始供水，供水能力250吨/时。

一九七一年

1、运河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成立。

2、空军机场动工兴建。

一九七二年

1、4月22日，全省第一家具有5000毛精纺锭规模的运河毛纺织厂筹建，1975年投产。

2、9月，兖州矿区北宿煤矿兴建，1976年投产。此为第一个全矿井巷道支护锚喷化的矿井。

一九七三年

1、2月，运河拖拉机配件厂研制泰山—25静液压传动拖拉机成功。

2、3月，南四湖湖腰扩大第一期工程开工，1975年完工，完成土石方1500万立方米，投资4163万元。

一九七五年

1、2月，兖州矿务局兴隆庄煤矿开工兴建，设计年产量300万吨。

2、7月，邹西大会战，完成土石方1.12亿立方米，整平土地100多万亩，打机井4100眼，扩大、改善灌溉面积89万亩。

3、10月，提出“苦战三年，全地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九七六年

1、6月，兖州矿务局建成全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

2、8月，落陵煤矿建成投产。

3、“北三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开始，共治理大洼13处，削平土岗12个，填平旧河道8条，修建沟路渠1935条、2480公里，打机井534眼，植树105万株，扩大和改善除涝耕地13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7万亩。

二、数字统计

1、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工业总产值由19168万元增加到89372万元，农业总产值由44577万元增加到91736万元（新口径80年不变价）。

2、物价指数：

年份	零售物指数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1966年	99.2	99.2
1976年	100	100.4

3、农业产量（公斤/亩）

年份	粮食作物		小麦	水稻	玉米
甘薯	谷子	高粱			
1966 年	104.5	83.5	150.5	122.0	
173.0	116.5	106.0			
1976 年	174.5	159.0	256.5	188.5	
232.0	136.0	111.5			

4、果品与水产品的产量：

年份	1966 年	1976 年	单位
果品	1764.5	3764.5	万公斤
水产品	13566	24035	吨

5、一轻系统局属企业、棉纺织业、麻纺织业、印染业总产值（单位：万元）

年份	1966 年	1976 年
一轻系统局属企业	2642	8530
棉纺织业	350	1524（1975 年）
麻纺织业	187	334
印染业	200（不足）	3295

6、纺织工业：1965 年总产值 323 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 2377 元/人

1975 年总产值 7423 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 11033 元/人

7、农村用电量：1966 年 3398 万千瓦时，1976 年 13424.4 万千

瓦时。

8、机械工业：1966 年工业总产值 2257.05 万元，职工人数 3397 人，

1976 年工业总产值 9608.14 万元，职工人数 11805 人。

9、电子工业，1975 年总产值已达 1565.2 万元，而 1980 年倒退到 1190 万元。

10、合成氨产量：1970 年 13129 吨，1975 年 36707 吨。

11、化学工业：1966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 4 个，工业总产值 797.5 万元。

1976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 26 个，集体企业 5 个，工业总产值 9457.01 万元。

12、医药工业总产值：1966 年 107.2 万元，1976 年 2176 万元。

13、机动车辆：1965 年货运 197 辆，客运 39 辆。1975 年货运 336 辆，客运 132 辆。

14、公路货运量：1965 年 341 万吨，1975 年 1076.5 万吨。

15、公路客运量：1965 年 275 万人，1975 年 470.8 万人。

16、货运周转量：1966 年 453333 吨，1976 年 1419657 吨。

17、银行存款余额：1965 年 5838 万元，1976 年 20806 万元。

18、基本建设投资：1965 年 2861.8 万元，1976 年 14817.8 万元。

19、财政收入：1966 年 5127 万元，1976 年 12034 万元。

20、财政支出：1966 年 5534.1 万元，1976 年 12183.1 万元。

说明：一、以上经济建设成果的统计是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派

复辟资本主义之后搞的，有意贬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仅供参考。二、人民币贬值，资本主义复辟后的 10 元人民币仅相当于文化大革命时的 1 元人民币（有时还不到 1 元人民币）。

附 2：世界银行官员对文革十年中国卫生健康状况的评价（摘自《南方周末》报 2003 年 5 月 15 日）

世界银行负责领导中国健康项目的官员 jagadish upadhyay 指出，“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1965—1976 年间应该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黄金时期。城市里的国有企业工人不仅享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而且“单位”也会负担其退休之后的医疗费用。农村通过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他们在受到训练后以最低的花费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健康保健，并在农村发展起了世界上最广泛的卫生保健体系。

第四部分 曲折历程的壮歌

一、形“左”实右

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不是春和日丽、鸟语花香的季节，也不是安静祥和歌舞昇平的日子，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激烈搏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取得胜利，极其雄伟悲壮的岁月，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鹰击万里长空的年代。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社会就不会进步；不斗，反社会主义的污泥浊水就无法荡涤。毛主席在 1967 年夏，独具慧眼，认为当时的所谓“乱”，是形势大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

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就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这只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作出这样英明的判断。毛主席一生对《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称赞有加，而孙悟空的辉煌，不是在花果山享受山大王的清福，也不是取经成功为神为佛的超凡脱俗，而在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途中，而在大闹天空的犯上作乱之中。

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反复，革命造反派受到的一次次劫难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曲曲壮歌，都为文革十年，这个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增光添彩。如果说真有个观世音为孙悟空解脱灾难，那么，革命造反派的观世音，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伟大舵手毛主席。不论文革十年多么曲折复杂，都是毛主席指明航向，拨正船头，战胜风浪，绕过暗礁，把破坏航船的歹徒击溃，把自己满腔的爱洒向劳苦大众，洒向为斗走资派冲锋陷阵的革命造反派。

一、形“左”实右

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间，有过两次正式估计，但都没能实现，所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延宕了十年之久。

第一次，毛主席估计 1967 年经过一月革命风暴的夺权斗争，逐渐走上“斗、批、改”的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了。不料，“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延误了时间。第二次是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之后，毛主席也想结束这次文化大革命，但林彪等人形“左”实右的干扰破坏，又使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增添了更多内容，展开了更长时间的斗争。

如果说，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二月镇反”是赤臂上阵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出于一些老干部的不认识，不理解，有冤气怨气不服气，还可以原谅，也比较容易识破，反击也会很快取得胜利，那么，对于形“左”实右反文革势力的斗争，就艰难得多，曲折复杂得多。

形“左”实右的最大特点，就是接过革命的口号，摇身一变，达到反对革命的目的。“解放干部”，“吐故纳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都在运河地区受到形“左”实右的歪曲和破坏。这是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用右的一手反对文化大革命失败后，采取的新的反革命策略。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悔改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这里的大前提是“不再坚持错误”，接受教育，认真改正，为广大

革命群众所谅解。接受谁的教育？笼统地说是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接受群众的，接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教育。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是广大群众、广大革命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走资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对干部，特别是当权派，其中包括走资派，进行了批判斗争。批判斗争是教育的一种形式。怎样“改正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一是在实际行动中，不再按刘少奇、邓小平路线那一套办事，而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二是对“教育”自己的群众、革命造反派，要心存感激，要和他们心连心，共同行动，搞好文化大革命。还有，“不都是坏人”、“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是不是一定要让这些干部都“官复原职”呢？虽然毛主席没说，但毛主席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2、“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这是毛主席对文革前十七年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由于十七年来，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时时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少时候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出现，广大干部不易分清哪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哪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黑货，所以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真正在路线问题上一点错误不犯的，是极少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

批判斗争是对的。但批判斗争的目的是教育，不一定是打倒，真正被打倒的是百分之几的少数，一个时期内被打倒了，只要认真改正了错误，还是可以重新站起来。但，“确有坏人”及“百分之五”是不能忘记的，是要区别对待的。

3、“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干部不要一棍子打死，最顽固的也要给一碗饭吃。”

“不要象对待地主那样，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我是一贯反对这样做的。”

这是毛主席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革命造反派的批评教育。批评什么呢？批评他们在运动中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但并没批评他们搞运动，没有批评他们的正确做法。这些不正确做法的来源，就是革命造反派还没有掌握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因为这不同于以前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一些方法，两者的做法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为了发动群众，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打掉干部的当官做老爷的作风，消除群众的气愤，运动一开始的方法简单粗暴过火，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纠正的，毛主席就是教育大家正视这些做法的负作用，采用正确的革命方法来对待干部，对待走资派。而受批判的干部则不许因为群众有过火行为而打击报复。

一九六七年九月份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曾和纪登奎有过一段对话：“老朋友，今天又见面了。……挨了多少次批斗了？”纪登奎回答：“一百七十多次。”毛

主席又问：“没有一点好处吗？”纪登奎激动得滚下热泪，很动感情地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说：“大有好处。通过接触群众，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好地继续革命。”毛主席高兴地笑了，满脸放着红光说：“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象纪登奎这样挨了一百七十多次批判，还激动得滚下热泪，承认“大有好处”，愿意更好地继续革命，这是毛主席树立的干部榜样，也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提拔重用。

4、“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毛主席之所以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关键问题，”就是突出了干部的作用包括好坏两个方面的作用，就是怕解决不好。解决不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揪住干部的缺点错误不放，该解放的干部解放不出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二是干部本身，特别是要参加三结合的干部，没能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有的甚至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也被当作革命干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运动的反复埋下了隐患。

那么当时运河地区是不是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上述干部政策呢？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单位没能做到这一点。

先说革命造反派。由于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理解肤浅，只是凭着革命热情，凭着对毛主席的崇拜和热爱，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了文化大革命，造了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反。现在需要正确对待干

部，面临着去参与建立和掌握新生的革命政权，各种思想就暴露出来。一是听风就是雨，盲目地跟，盲目地喊，上面一说解放干部，就不问三七二十一，赶紧解放。认为这样才是革命，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慢了就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就成了保守派。这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二是个别私心杂念较多的革命造反派，认为今后还是干部掌握大权，趁着现在解放干部，给当权派卖个好，自己以后会跟着沾光。三是极少数革命造反派已经认识到，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解放干部、结合干部的严重后果，但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不能也无力量坚持自己的主张。

那么，当时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谁造了这种形势呢？

这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策动下，刮起了一股形“左”实右的歪风，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歪曲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干部问题的论述，造成了一种“谁不尽快解放干部，谁不积极地把原来的当权派结合进入革命委员会，谁就是以我为核心，谁就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谁就是极左派，野心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以及“王、关、戚就是他们的下场。”这样一种舆论，一种形势。

这股歪风，这种形“左”实右的形势，把广大革命群众吹得晕头转向，把没有转变现点的保守派吹得沾沾自喜，把党内走资派吹得飘飘然，把一些革命干部也吹得不敢多说话。原地委常委，现在已是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 A，就曾无可奈何地说：“大家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赶快解放干部，成立‘三结合’吧。”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导致运河地区各级革委会中革

命群众代表形同虚设，一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一有秋后算帐的妖风，马上就出现整群众、整革命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虽然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些暗流不敢明目张胆，但总是时缓时急，一有机会就向文化大革命反扑。

到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前夕，运河地区的所有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都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全部被解放出来，并且大部分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这是很不正常的，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宗旨的。尽管这些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大部分是可以改正的，但也确有不肯悔改的，就是能改的，也有一个时间过程。由于没能很好地加以区别对待，就出现了“一风吹”，保护“一小撮”等等偏差。

由于干部问题没能解决好，一些没认真改正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抵触情绪，还有冤气怨气不服气的干部，以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结合到革命委员会后，虽然不能象文革初期那样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把造他们反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但由于他们中刘邓路线的毒较深，资产阶级意识十分严重。他们的低头认罪，检查承认错误是被迫的，是形势的需要，是为了东山再起。所以他们在革命委员会中总是与革命群众的代表（革命造反派），与革命造反的干部，面和心不和。他们不是暗地里嘲笑群众组织负责人没能力，就是公开地挑这毛病找那缺点，他们总是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的旧观点，以当官做老爷的旧眼光，挑剔新事物。最后他们以“群众代表不能脱产干革命，要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教学”为名，把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排挤出

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的代表虽然看出了他们的阴谋，但又不好明说。说了又怕落个“想当官”的罪名，谁叫咱们不是干部身份呢？只能陆续离开了革命委员会。起初，还隔三差五开个革命委员会的会议，后来一建党组织，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革委会形同虚设，革命群众代表的副主任，常委、委员职务就“销声匿迹”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革命造反派与被批斗的干部（主要是当权派）一时无法达到真正一致时，是用谁？向哪边倾斜？这个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反复，甚至导致最后的资本主义复辟。

干部问题之后，就是党组织问题。要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关键在党的领导，关键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关键是如何建设党。

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上写道：“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整党的重要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我们的权力是

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什么样的标准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什么是“故”，什么是“新”，如何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怕各人会有各人的理解，立场不同，相差会有十万八千里。

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些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斗士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首先向走资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革命造反派算不算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通过《红旗》杂志社论就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这里的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就包括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可是，在被冲击的当权派眼里，在参加了保守组织的党员眼里，革命造反派永远成不了先进分子，只能是“捣乱分子”，“不安分守己的人”，是“个人野心家”，是“牛鬼蛇神”，是“不是有点么就是为点么”的不良之徒，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入党呢。

所以，运河地区一九六九年开始的整顿党组织，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基本上把革命造反派排斥在外。历史的原因已造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革命造反派队伍中党员比较少，现在又不能作为先进分子吸收入党，所以整个运河地区共产党的大门一直是对革命造反派关闭的。

得不到党组织承认的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在干部眼里仍是二等三等公民，是异己分子，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当然，文革十年，虽然不断地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排斥和刁难，但并不影响毛主席指示的贯彻执行，不影响各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健康成长，因为毛主席的威信太高了，毛泽东思想已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因为一九六六年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在党中央占了绝对的领导地位，任何人也不敢公开跳出来进行挑战。只不过通过歪曲整顿共产党组织工作，把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须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是广大革命造反派啊！

在解放干部和党组织“吐故纳新”工作中吃了败仗的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又面临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厄运。

清理阶级队伍，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每个阶级在夺权掌权的全过程中经常要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是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要整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加强战斗力，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掀起高潮，取得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胜利，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就是重整自己的阶级队伍，认清敌人，对准斗争目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己的基本队伍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也就是革命造反派。这一点，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一”《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过，在同年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更明确地指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在一九

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毛主席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时，满含感情地说：“请代我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那么应该清理谁呢？文化大革命已把斗争的矛盾定位在党内走资派，但考虑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特殊背景和实际情况，党内走资派不都是清理对象，只有极少数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才是清理对象。而表面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基本上没有，因为连党内走资派的头子刘少奇、邓小平都写了检查，承认错误，表示悔改。所以“清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几乎等于零。那么有没有识别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办法呢？有。一是看走资派是制定还是执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和政策，是真承认错误还是假承认错误，是“永不翻案”，还是时时“翻案”，二是看走资派是真改正错误还是假改正错误。在走资派没有重新站出来工作进行考验之前，真假承认和改正错误的标准，可以用对革命造反派的态度来衡量。这里说的对革命造反派的态度，不是对某个革命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对革命造反派的某个头头，而是对革命造反派队伍的整体。真正认识到革命造反派批自己斗自己是对的，是挽救自己；真正把革命造反派看成亲人近人，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意地对他们提出建议，把自己的经验教训，把自己正确的工作方法传授给他们。做到这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才算改正了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可惜当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标准，这个条件，也没有树立和宣传这方面的好典型，致使大量的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蒙混过关，不光逃过了清理，反而成了清理别人的人。

由于清理的主要对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好识别，所以其他问题就成了清理的主要对象。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簿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写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明确指示，虽然其中没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但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任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在彻底打倒之列，更是清理的对象了，更何况有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本身又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这些“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应该说，在干部队伍中有，在群众中有，在革命造反派中有，在保守派中有。可是，由于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进入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老干部，一是冤气怨气不服气没有消除，对革命造反派仍抱着成见，所以老是把清理的目光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中，二是他们掌握着档案材料，掌握着每个人的政治历史状况，所以这些老干部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掌舵人。群众的怀疑，群众的审视，只是感情材料，真正的炮弹，还是来自老干部掌握的情况，档案材料中的记载，知情人的揭发。而这些“掌握的情况，”“记载”的东西，“揭发”的材料，也不是十分准确的，甚至带有各种偏见的。这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认真掌握好政策。

所以，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指出：“清理阶级队伍，

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应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运河地区清理阶级队伍中之所以出现偏差，原因就是没能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对毛主席的有关批示采取了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错误态度。除了个人“斗私批修”不够，更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认识有关。作为当权派。由于文革运动中一直受到严重冲击，满肚子气无法撒，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是宁“左”勿右；作为保守派群众，认为右倾保守的名声不好听，错过了（或者不愿意）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对付阶级敌人，应该加大火力，努力表现一番；作为革命造反派，虽然认为清理阶级队伍应首先清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应该注意政策，但又说不出口，怕别人说自己有派性，包庇牛鬼蛇神，坏了革命造反派的声誉，所以也陷入清理阶级队伍的偏差之中。这三股力量，都是高喊着斗争叛徒（变节分子）、特务，漏网的地富反坏右，其火力之猛，声势之大，打击面之宽，对人迫害之重，超过了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之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特别是普通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与此有极大关系。

下面以一个学校出现的偏差问题，来说明运河地区基层清理阶级队伍的大致情况。

这是一所地处农村的地区重点中学，初、高中 18 个教学班，将近 1000 名师生员工。建校之初，一些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混迹在教职工队伍中，直到五十年代末，才有新中国培养的师资力量充实进来。由于学校长期片面追求升学率，不少工农劳苦人民家庭学生，父母没文化，生活条件比较差，又有家庭劳动的拖累，往往因为学习成绩不太理想而受到歧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部分刚从师范院校分配来的青年教师和学生骨干一起，造了学校领导的反。而另一部分，所谓党支部的红人，大多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则拼命保学校领导。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斗争，革命造反派胜利了。但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匆匆忙忙把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又没能彻底认识错误的原学校主要负责人岳××结合进校革委，成了一把手。于是，排挤、打击、压制、迫害革命造反派师生就开始了，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

张××，是一个中年数学教师，地主家庭出身，只因运动中曾贴过校领导的大字报，岳××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指使曾管理教师档案的心腹，将张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及本人曾犯过的错误，透露给保守派的师生。于是这部分师生就认为可抓住了一个阶级敌人，你们造反派批斗当权派，我们就拼命往死里整张××。只一天功夫，张××忍受不住，夜里跑出校门，跳井自杀。

李××，是一个后勤管理员，中农出身，曾参加三青团，属一般历

史问题。只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革命造反派比较亲近，但没参加任何组织，也被岳××列为清查对象和重点，几次三番派人给李××谈话，施加压力，并亲自向李进行威胁，擅自说李是敌我矛盾问题。李非常害怕恐慌，乘着看管他的人不注意，逃了出去，跑了二十多里，跳井自杀。

刘××，是一位骨干教师，中农出身。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经常议论学校领导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造了岳××的反。岳趁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发动几个教师对他的言行进行揭发，检举他说过周恩来的坏话，评论过林彪，欲把刘置于死地。刘××在强大的压力下，精神崩溃了，在一天凌晨，跑到男生厕所，上吊自杀。

这个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共死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都是岳××一手造成的，都是因为直接或间接造过岳××的反，这说明犯过走资派错误，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若不深刻认识错误，坚决彻底地改正错误，其打击报复是多么严重。这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它反映了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在解放干部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的恶劣后果。

对于解放干部，吐故纳新，清理阶级队伍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已有所觉察，所以发动了“反复旧”运动。

由于王效禹政治能力不足，又没能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干扰了全国的统一部署，特别是，再加上以济南军区政委、林彪死党袁升平为代表的右派保守势力的强大，山东问题还波及到徐海地区，影响了周

边省份，所以山东的“反复旧”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共中央给王效禹和山东的“反复旧”运动，定性为“带方向性的”是“前进中错误”。从此王效禹，这个红极一时的革命造反干部，开始走了下坡路。

二、王效禹问题

奇怪的是，王效禹出问题，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效禹以一名革命造反干部，原青岛市副市长，轰动了全国，成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在“九大”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可谓红极一时。但从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开始，逐渐成了批判对象，到一九七零年底，短短一年多，就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究其原因，也不奇怪。

姑且不说王效禹本人的不足，只说当时的情势，有两股政治力量在夹攻他。

一股是林彪的军队势力。象王效禹这样一个资历不深，只靠革命造反而上升的政治明星，现在凌驾于济南军区、山东军区之上，权力欲极强的林彪手下，早就心怀不满，蠢蠢欲动，伺机向王效禹进攻，不把王效禹拉下马誓不罢休。“九大”开过，全国加强战备，无疑提高了以林彪集团为主的军队势力的地位，这就造成了济南军区以袁升平为首的个别人反王效禹的有利形势。

另一股是山东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他们对所有的革命造反派都看不惯，对站出来造反的革命干部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看到王效禹跳得这么高升得这么快，早就恨得牙都痒痒。只是苦于被批判被打倒的地位，无力进行公开反扑，但地下活动，互相串连，造谣生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机会终于等到了，代表人物终于跳出来了。

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是林彪线上的人。本想通过支持山东的“二·三”夺权，能被赏识，重用，可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支持王效禹，让他压在自己上面，老是无法高升。于是袁升平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林彪集团的核心人物诉苦，向林彪表达忠心，说了王效禹不少坏话。并到处散布“济南军区受压”，“王效禹是太上皇，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一切都以王效禹为核心，这样下去会出大乱子”，等等。林彪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决定大力支持袁升平。所以，反王效禹的代表人物就披挂上阵了。

山东的“反复旧”运动，给袁升平所代表的林彪势力和反文化大革命的反右倾保守势力制造了机会。

在反复旧运动中，一是一些革命造反派人物不恰当的歌颂王效禹，成了可抓的辫子；二是山东的“反复旧”运动又影响了徐海地区的大联合，引起江苏等省的强烈不满；三是“反复旧”采用运动的形式，既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又不符合毛主席当时的战略部署。这下，给袁升平等人的反击，制造了良好的机会。

当时的中央形势也有利于袁升平的反击。

应该说，打倒以刘少奇为头子的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彻底批判解放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

线深入人心，林彪是有功劳的。但林彪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学说，知之甚少，更不愿身体力行地去做，他满脑子是“权”，他向往的社会是官僚特权阶级掌权的假社会主义。所以“九大”前后，他的目标就是由他们的人马掌权，一切恢复旧秩序，一心一意去巩固和建设“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自从反“二月逆流”胜利之后，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军队内的刘邓路线也受到批判，毛主席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进入“斗、批、改”阶段，一切应该走上革命的新秩序。在“秩序”二字上，毛主席跟林彪是一致的。所以这时王效禹再搞什么运动，去解决复旧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复旧问题只能依靠已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逐级加以解决。

对袁升平更为有利的是，林彪正着手抓自己的班底，准备篡党夺权工作。林彪既与原先的右倾保守势力合不来，又对新起的革命左派看不惯，二者权衡，他认为，以江青、张春桥等人为首的革命左派对他今后的夺权掌权，威胁更大。所以林彪不惜与右倾保守派勾结，把反文化大革命的势力收罗在自己帐下，以建立自己的亲信班子。这些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革命造反派上，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可是后来，林彪集团一垮台，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反林彪的英雄，继续进行着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勾当，继续制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悲剧。连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也对他们是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在山东、

在济南军区，袁升平就是林彪集团物色的对象，最理想的人选，所以袁升平也就成了林彪的死党。

袁升平是个权欲熏心，一贯好耍阴谋鬼计的林彪集团的死硬分子。早在一九六八年底，他就秉承林彪集团的旨意，在山东大肆活动，替林彪树碑立传。在“九大”上，袁升平被林彪集团选中，进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林彪集团利用“九大”成立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之机，安插了不少自己的死党，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他们除了阻止党内右倾保守势力进入中央委员会，最恨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新生革命力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当林彪一伙需要借助毛主席的威信，整倒右倾保守势力的时候，他们是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的；当右倾保守势力被暂时打倒之后，他们又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拼命打击排挤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完全是代表右倾保守势力说话。所以毛主席说林彪集团是形“左”实右，是极右。

袁升平身上非常鲜明地具备了以上特点。“九大”会议还没有结束，他配合林彪一伙反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行动，在山东酝酿反王效禹。除了提出王效禹擅自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问题，又利用毛主席建议让还没有“解放”的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当中央委员一事，向王效禹发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让袁升平的阴谋得逞，不光让王效禹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还进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袁升平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向林彪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于是中央决定“九大”结束后，让在北京的山东省革委

会和济南军区的 27 人集中进行学习。在学习中，袁升平一伙上窜下跳，发起一轮又一轮向省革委中革命造反派干群的攻击，指责他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解放军，不认真解放干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唯我独尊”，“唯我独左”，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甚至编造了“全国有红太阳，山东有个月亮”，影射王效禹把自己比作山东的月亮，诬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不围绕红太阳转。”

事情愈演愈烈。袁升平在上面坐阵，党内走资派在底下大肆活动。济南市五月初连续发生了冲击省革委的暴行，运河地区也发生了“4·10”保地革委和砸地革委的群众性武斗。山东问题闹得严重，袁升平一伙与王效禹势不两立，林彪集团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势，一心要把山东控制在自己的死党袁升平手里，所以从一九六九年六月份，王效禹一步步走下坡路，全省的革命造反派也跟着遭殃。虽然，毛主席批示“照办”的 1969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件上，明确指出“反复旧”运动是“前进中的错误”，文件“不许登报”，以免造成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袁升平依仗着有林彪撑腰，又获得山东省党内走资派的支持，所以根本不管这一套，在山东全省，利用军队支左人员左右运动的优势，开展了大张旗鼓地纠正“反复旧”的错误。首先把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造反派群众代表一律清除出去，罪名是“跟着王效禹跑，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同时加强了各地军队支左人员的领导，地方的事情必须经过部队党委通过才能施行。随后又把犯了走资派错误和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根本不需要检查认错，一律解放出来，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运河地区搞得最厉害的是滕县，因为滕县驻军六一

八九部队政委周克玉，原来是袁升平的秘书，当然执行袁升平的指示最坚决最积极，他在滕县作威作福，简直是滕县革委会的太上皇。

三、真假 5·16

林彪集团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拙劣表演，赢得了中央反文化大革命右倾保守势力的喝彩，使得党内走资派蠢蠢欲动，认为秋后算账的时机快要到了，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表示了极大义愤。对此，毛主席早有警觉。

以“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为焦点的党内斗争，是林彪认为羽翼已丰，进行突然袭击、采取“清君侧”的策略、企图恢复资产阶级旧秩序、建立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阴谋大暴露。他利令智昏，把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扭转了庐山会议上的风向，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对林彪进行规劝，也给了趁机反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以敲山震虎。所以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袁升平，这个祸害山东文化大革命的林彪死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紧跟林彪、陈伯达，摇旗呐喊，兴风作浪，当时华东大组出现的乌烟瘴气，就有他的不少功劳。他伙同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陈励耘，在华东大组讨论会上，一唱一和，恶毒攻击毛主席信任和依重的革命左派张春桥，说什么“你有多大能耐，竟敢和林付主席比高低，……以左派自居，反对老干部，整军队，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还坏，是我们党内军内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应该揪出来示众，

批倒斗臭。”同时对林彪大唱赞歌，说林彪是“伟大的天才”，“应该担任国家主席”，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认为讲话“语重心长，非常重要，对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袁升平参加完九届二中全会，在山东、在济南军区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批陈整风”的战略部署，一方面继续大肆吹捧林彪，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让《大众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林彪视察海岛的题词，让济南军区上上下下搞庆祝活动，纪念林彪为《前卫报》题词。另一方面，除散布张春桥、江青、康生的谣言外，又进一步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开刀。其卑鄙阴险毒辣的手法，就是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部署全省的“清查 5·16”运动。

“5·16”分子有没有？该不该清查？

一九六七年，北京确实存在着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五·一六”组织。它是从极“左”的方面反对、破坏、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势力，它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专门破坏和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战略部署。这个“五·一六”组织或明或暗，时大时小，总是变幻着策略，在关键时刻，向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开火，配合右倾保守势力，起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作用。这个“五·一六”组织经常受到党内走资派的利用，挑唆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水搅浑，以利于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脱身，达到逃过批判和斗争，潜伏下来，准备东山再起，秋后算账的罪恶企图。实际上，整个文革十年，“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都

在以极右和极左两种形式，干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勾当。

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注意到“五·一六”这股反革命势力，对清查“五·一六”有过明确指示。1967年9月5日江青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姚文元9月8日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都代表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都指出：“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有三个中央文件专门谈清查5·16问题，界定了“5·16是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范围“重点在北京”，“有关地方和部门”。同时，这些毛主席亲自批示审阅的中央文件，一再强调：“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5·16”，“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并且进一步点明：“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要求清查5·16活动在中央专案联合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实行“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就明确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而山东的清查 5·16，在袁升平的一手操纵下，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策划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迫害革命造反派的阴谋活动。

首先，山东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极少存在中央所确定的 5·16 分子。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要说有 5·16 分子，那么大量的应该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林彪集团在山东的余孽。而袁升平把济南的“5·7”事件作为清查 5·16 的重点，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疯狂进攻。运河地区以“4·10”武斗为由，迫害革命造反派，是袁升平阴谋的翻版。

其次，山东清查 5·16 完全是林彪死党和走卒来清查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需要。当时，窃居济南军区政委的袁升平，是个不折不扣的林彪死党。由他来具体领导山东的清查 5·16，他又网络了如张致秀（当时任军长，又提升为军区付司令员），周克玉（当时任团政委，又提升到军区政治部）等党羽，成为清查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把清查的对象定为“反军分子”，凡是反对军队的都是 5·16 分子，袁升平还特别规定：反黄永胜、吴法宪、邱令作、李作鹏，反杨 XX 的都是 5·16。

第三，山东的清查 5·16，完全是与中央文件精神对着干。中央不让大搞群众运动来清楚 5·16，袁升平他们偏偏在全省发动了大规模的，长达四、五年之久的群众运动；中央不让在公开组织中抓 5·16，他们偏偏在山东省四大组织（山工指、山贫指、山红指，山东文艺造反

司令部)及相关群众组织中抓 5·16,并且专抓这些组织的头头;中央强调专案联合小组的排查工作,而袁升平则要求各单位排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件,把斗走资派,冲杀资反路线,反对军队支持保守派,反击“二月逆流”,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等等,都作为清查内容,把矛头指向了所有革命造反派;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只能配合中央专案联合小组的行动,袁升平胆大妄为,另搞一套,规定清查工作由军队、军代表直接领导,地方党委不得过问,把各级革委会完全抛在一边,甚至成为清查的重点范围,袁升平还片面地开展“四大”,实行“一言堂”,强行要求把清查 5·16 与“一打三反”结合起来,任意扩大打击面;中央明确指出,5·16 是个秘密组织,范围不大,人数不多,只不过能量很大。但袁升平却在山东大讲敌情,大讲“5·16 是明火执仗”的,并制定在山东文革中公开发生的十四个大事件作为实施方案。

第四,山东的清查 5·16 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是蓄意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在袁升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实施方案”中,把一九六七年山东的“二·三”夺权,“5·7”事件,“五点声明”、“公开信”,中央负责同志来济南的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山东的光辉批示,都进行了否定,把相关的革命行动、革命事件都作为清查 5·16 的内容。

第五,山东清查 5·16,是林彪形“左”实右路线与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相结合的产物。这两股势力相当强大,所以山东清查工作搞得十分惨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迫害之重,残害之深,殃及之广,时间之长,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并且在 1971 年“九·一

三”事件之后变本加厉，林彪死党袁升平继续得到山东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支持和拥戴，继续高举清查 5·16 的屠刀，砍向全省的革命干群和部队官兵。这是山东清查 5·16 的怪胎。

直到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 12 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后，这场使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重大反复，让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给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带来沉重灾难的袁氏阴谋活动——山东清查 5·16 运动——才宣告破产，袁升平这个罪恶累累的林彪死党，以及其他走卒才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第六，山东清查 5·16 运动，用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白如冰的话说：“山东问题，责任在省委，根子在袁升平”。“清查 5·16 这样的大事竟一次也没有向中央报告过。”袁升平是报告过的，只不过报告的是林彪集团。所以中共中央（1973）4 号文件中指出：“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无怪乎，袁升平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of 的省委和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上，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后痛伤万分，公然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竟为之散会。但豺狼本性是难改的，只要不死，它总要咬人、吃人，并且愈到临死的关头，愈加显示出兽性的疯狂。袁升平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把对主子命丧黄沙的哀痛，化为仇恨，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化为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歇斯底里的大开杀戒，更加疯狂地把山东清查 5·16 运动引向火坑。直到一九七三年底，毛主席党中央已对山东问题有了明确指示，袁升平还公然叫喊对中央“要顶住”、“中央首长受了骗”，并派自己的

私党张致秀，曹某某四方游说，上窜下跳，耍花枪、放暗箭，诬蔑群众上访是干扰清查工作的大方向。

山东清查 5·16 的问题，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英明指示下，顺利地解决了。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黑线并没有完全根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正未有穷期。

四、英明的预见

运河地区清查 5·16 是从一九七一年八月初开始的，“九·一三”事件之后达到高峰。大家一直感到奇怪，甚至发生错觉，认为革命造反派是和林彪集团同命运的。你看，林彪集团完了，革命造反派也一个个被打成 5·16 分子，受到清查，遭到迫害，把革命造反派与林彪集团捆绑在一起。⁴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这是袁升平使用的遮眼法，这是袁升平发泄哀痛和仇恨的罪恶行径，这也是山东，包括运河地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派保守势力，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与林彪死党集团进行幕后勾结，狼狈为奸的铁证。

你看，明明袁升平是林彪死党，就是因为他大肆在山东搞所谓清查 5·16 一系列活动，起到了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山东文化大革命的效果，所以深得从中央到山东省到全省各地党内走资派，右倾保守势力的欢心和鼓舞，一再为袁升平评功摆好、呐喊助威。例如，一九七二年底山东省委某些负责人拖延不传达毛主席关于纠正清查 5·16 出现问题的指示，在地、市级会议上要求“坚定清查的信心”，要“肯

定清查的成绩”，“不要因时间长而松劲，要排除干扰，清查到底”。

直到一九七三年，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四号文件，捅了山东省委的马蜂窝，点了袁升平的名，有些原党政军负责人还到处讲话，替袁升平遮掩错误，赞扬袁升平前段工作的成绩，甚至拍着胸口对清查 5·16 的专案人员嚷道：“山东清查 5·16 大方向出了问题我负责，出了什么问题我承担，军队的要赶快回来坚守岗位，犯了错误不脱军装，不复员，不转业！”

由此可见，在镇压革命造反派上，林彪集团及其死党，与党内走资派，何其亲密，何其一致！

林彪集团的形象，毛主席是心知肚明。他们完全是为了向上爬而借助毛主席这个共产党的钟馗，来打倒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看法，与党内走资派，是一丘之貉，一言以蔽之：反对！只不过一个从右的方面反对，一个以形“左”实右的方式反对。他们都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向往的都是官僚特权统治，他们要建立的都是官僚特权阶级统治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他们最终是殊途同归，都走到复辟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反复学习著名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会对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

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于他的杂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相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

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

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向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这是一封情深意重的革命伴侣间的私人通信，这是伟大领袖向自己的战友、同志、妻子畅谈国内大事的政治书信。它表述的思想深刻，意义深远，充满了革命的辩证法，字里行间洋溢着夫妻之爱、战友之情，同志之诚，有导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也有领袖对助手的循循指点。全信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从政治角度来学习这封信，可分成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一九六六年五、六、七三个月形势的分析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义和前途

的展望。第二层是由林彪一九六六年“五·一八”讲话引发的感慨，这种发自内心的伟大的思想火花，最初产生时，总是向自己最亲近、最知己的人进行首先倾诉，这是这封信的重中之重。无论从文字之多，还是感慨之深刻，都可以看出，这是触发毛主席写信的主要动机。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主要是两个重点，一个是讲政变问题，一个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关于林彪所讲政变问题，毛主席在信中只有这么几句：“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这句话是褒是贬？是赞成是反对？或者兼而有之。觉得“既透彻又担忧”？那么毛主席担忧什么？从后来的发展变化，可以体会到毛主席当时一是担忧林彪过于看重政权。满脑子都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而忽略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才是最重要的。光迷恋政权会滑向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泥坑里；二是担忧林彪醉心于政变权术的说教，对历朝历代的政变这么精通，成了政变专家，会不会如法炮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点政变活动？何况他又手握兵权呢！不幸，毛主席的担忧都成为事实。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在反对张春桥等中央左派进行“清君侧”的活动中，在纵容其子和手下搞罪恶的“571 工程纪要”时，林彪都把毛主席的担忧化为现实。这是毛主席最痛心的！所以，林彪事件大大损伤了毛主席的健康，“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缩短了这位伟人的宝贵生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关于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信中用绝大篇幅抒发了自己的见解，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把毛主席凌驾于马、恩、列之上，有合理的部分，但主要暴露了林彪不懂马列主义，不懂辩证法，形“左”实右，怀有个人政治目的的政客作风。特别是把天才挂在嘴边，把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能“立杆见影”等，更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无稽之谈。以致后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早请示晚汇报，把毛主席的塑像当神供奉，等等，更是林彪一伙唯心主义、封资修思想膨胀发展，是反革命两面派伎俩的蹩脚表演。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同意把林彪的讲话发下去呢？信中说了原因：“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大家都很珍视毛主席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科学预见性。除了对林彪的担心变为残酷的现实，表现了毛主席洞察一切，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敏锐地发现苗头，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以科学的预见指导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信中还有其他一些预见性，已经或正在得到验证。

例如，“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

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中国发生没发生右派政变？发生了但不公开反共，甚至至今还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这就是慑于毛主席科学预见性的威力，右派变得狡猾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和九十年代中，曾有两次右派想公开打出反共的黑旗，一次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一次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但都没有成功，其原因就是害怕加速右派政权的灭亡。右派的欺骗，固然延长了它的生命，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得到安宁过，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中，“一切革命者”都在代表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利益”，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斗争会愈来愈激烈，革命者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右派政变所篡夺的政权，一定会交还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右派政权无论怎样伪装，假的总是假的，伪装一定会剥去，它的寿命不会长久的。

再例如，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跳出“兴勃败忽”的历史怪圈的科学预见，在这封信里指明了具体方法和道路，这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披着中国共产党外衣的邓小平、江泽民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腐败堕落，绝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没能跳出历史怪圈，也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失灵了，而是中国发生了右派政变，无产阶级的政

党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无产阶级政党，又认认真真地按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办，那么毛主席跳出历史怪圈的科学预见，一定能实现。

这封信中还有关于黑话的戏谑和反语。毛主席有两处说到自己所写“近乎黑话”。那么“近乎黑话”的话是指哪些呢？细读全信，有这么几处：“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认真体会毛主席所谓的“近处黑话的话”，对照党内外斗争，会提高不少识别右派的能力。

更重要的，认真学习毛主席这封信，可以看出，林彪形“左”实右的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极右路线，是一个藤上的瓜，是一对难兄难弟，它们是互为表里，有着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和右倾保守路线，最终都会导致右派上台，中国的当代史就是这样演变的。

林彪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无限拔高，吹得神乎其神，时时处处忘不了“天才”二字。当毛主席领导下的左派队伍提出不同意见时，就被他们打成“右派”，打成“5·16分子”，打成“反军乱军分子”。而真正的右派，刘、邓路线的追随者，党内走资派，则拍手叫好。叶剑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军队中最早最积极拥护林彪的将帅就是叶剑英。“五·一八”讲话的前前后后，叶剑英表现得十分活跃，热情讴歌林彪，与林彪一唱一和，亦步亦趋。可是叶剑英从骨子里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派，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和一九七六年“十·六”政变的参与

者、策划者、指挥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是在 1973 年，林彪事件过去将近两年才公开发表的。这时，毛主席已经看出，右派正利用林彪事件，利用毛主席所说的“近乎黑话”的话，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迫害革命造反派，最终打倒真正的共产党。所以通过这封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信件的发表，来说明林彪是极右，是形“左”实右，是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一样，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看出的问题中，当然包括山东省，包括运河地区。因为山东省，特别是运河地区，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才大张旗鼓地利用清查 5.16，继续向革命造反派开刀，疯狂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样，对运河地区清查 5.16 的时间和清查内容，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这一切更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是屡试不爽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比神还要神”，信矣哉！

五、真 5·16 清查假 5·16

运河地区清查 5·16，从一九七一年八月开始，到一九七三年毛主席发觉山东清查 5.16 出现了问题，并着手纠正解决，到给被清查的对象平反昭雪，前后将近两年时间。受清查，受牵连，受迫害的人，数以万计。大批大批的革命干部，各级革委会成员，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一般革命造反派的群众，被非法绑架，秘密关押，不准家人探视，不准和熟人、亲朋接触，不准看报纸，比一般囚徒还不如，完全采用法西斯的审查手段。这一切是在美其名曰“办学习班”的招牌下进

行，是在日夜轮战、大搞疲劳战术、百般精神摧残的酷刑下进行的，是在拳打脚踢、揪头发、撕耳朵、180度大弯腰，皮带棍棒一起上的暴刑下进行的，是在“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恐怖气氛中进行的。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中，对清查 5.16 情节的描写，完全符合运河地区的情况：“不让被审人吃饭睡觉。一熬就是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的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六六年横眼立眉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本单位的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干校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象染了颜色一样的，红一块、灰一块成了小花脸。”

是谁对革命造反派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对他（她）们这么残忍、残酷、毫无人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韦君宜奚落、嘲弄、幸灾乐祸的笔下，不难找到答案。那就是党内走资派，那就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之流！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对分子！

除了有象韦君宜描写的被逼疯的典型，运河地区还有被逼自杀的，被逼越狱逃跑到遥远的东北西北当“盲流”的，被逼妻离子散的，被逼

落下各种残疾的。

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这类刺激人们神经的最后通牒的威胁下，在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的摧残下，在保守派骨干“掺沙子”的监视之下，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经受着最残忍的法西斯待遇。他们或者宁死不屈，“顽抗到底”，或者虚与周旋，打“消耗战”，或者故意编造谎言，“诱敌上勾”，把“逼、供、信”人员调动得团团转。不论用什么方法，这些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革命造反派心里都坦坦荡荡，问心无愧，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斗走资派是“十六条”规定的运动大方向。只要毛主席在，只要毛泽东思想在，革命造反派就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解救我们的。别看他们气势汹汹，他们手中没真理，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真理在我们一边，这个冤案一定会翻过来，这场真 5·16 清查假 5·16 的冤屈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革命造反派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熬过了六、七百个日日夜夜，终于盼来了真理的曙光。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省清查 5·16 运动严重问题”的英明指示下达了！

山东清查 5·16 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林彪死党袁升平这个真 5·16 分子清查假 5·16（革命造反派）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袁升平一伙已经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个个奔走相告，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运河市区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批林批孔批袁汇报团”、“批林批孔批袁指挥部”，向以袁升平为代表的真 5·16 分子发起进攻，强烈要求：1、给被打被压被迫害的假 5·16 平反伸冤，2、给因清查 5·16 再次受株连的所谓“孙、孔、王右派集团”平反，马上释放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已死去）3、清除混进各级革委会中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4、增加革委会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把造反的干部、群众代表补充进去。

于是，各县各单位各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纷纷集会，声讨袁升平！召开各种形式的控诉会，讲演会，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把满腔的愤怒喷射出来；发表声明，书写讨袁檄文，张贴公开信，决心把批林批孔批袁斗争进行到底。

下面摘录几段运河地区滕县革命委员会 28 名成员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发出的“致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一封信”。

题目：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信的开头说：“正当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 1974 年 12 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了。喜讯传来，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山东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是正确解决山东问题的根本方针，是推动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胜利发展的强劲东风。我们坚决拥护，

坚决贯彻执行。”

全信共有七条。第二条写道：“二、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批袁斗争的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林彪死党袁升平的反革命罪行。紧密联系我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袁升平疯狂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倒退的罪行，迎头痛击右倾复辟思潮。”

信的第三条有这样的话：“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县委必须立即改变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袁、捂盖子，怕群众的被动落后状态。”“欢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混在干部队伍里进行破坏活动的个别坏人。对我县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马启廷（文革前的县委书记——抄者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以养病为名，借故逃跑，长期擅离职守，对抗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必经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按照中央 12 号文件的规定，切实把我县县委、县革委机关的批林批孔批袁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

信的第四条点了滕县驻军政委周克玉的名，说周克玉是“袁升平的私党”，是“破坏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支左工作的罪魁祸首，必经彻底揭发批判。”

信的第五条要求全县革命造反派应做工农业生产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信的第六条指出，革命革命造反派

要继续促进革命大联合，要增强党性，反对派性，记取走资派利用派性，“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深刻教训。”“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袁升平身上。”

信的最后第七条是：“七、我们必经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林批孔批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提高警惕，坚决揭露和打击破坏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克服左右干扰，特别是右的干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让我们乘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重要指示的强劲东风，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障碍和阻力，把批林、批孔、批袁的斗争进行到底，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这场反击“真 5·16 清查假 5·16”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虽然没能取得全面胜利，但又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附：一个红卫兵在清查所谓 5.16 运动中的遭遇

卫东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原是学校团组织和学生会干部，后来成了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校革委会副主任，1970 年回家乡学校当民办教师。

一九七一年十月底的一天上午，卫东刚下第一节课，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说是公社有人找，了解一点情况，说得简单而轻松。卫东要求把教科书收拾一下，另两个人（一个认识，一个不认识）说，不

用了，很快就回来。

卫东随这两个人出了校门，离开村庄，向公社所在地走去。刚踏上公路，就改变了方向，两个人一前一后跟紧卫东，并威胁卫东老实点。卫东这才意识到被绑架了，大声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一个恶狠狠地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卫东无意再争辩，心里很坦然，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路上，卫东要上厕所，两个很紧张了一番，生怕跑掉，最后选择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让卫东解了手，卫东心里感到十分可笑。接着来到汽车站，坐上去县城的公共汽车。下车后步行三里，到达位于县城东郊的县师范学校，进了戒备深严的校门，两个押解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卫东一看，接待他的是高中毕业学校的负责人和对立派——保守派——的头头。那目光、那脸色、那架式，象来了一个重要的敌人，什么没说，命令卫东先到宿舍去。

宿舍是原来的教室，两边靠墙铺着木板，中间是走道。卫东在木板上没坐多大会，他的铺盖行李就被送来了。这下，卫东心酸了，想象着年已五十岁的老父母，刚刚生了小孩的妻子，他们被勒令准备行李，送给不能见面的亲人，会多么难过，多么担惊害怕啊！

卫东已没多少时间自己心酸，立刻接受了残无人道的审查。

一上来就给了个下马威。卫东被带进审讯室时，口号就喊了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必须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一看满屋的人，大都是自己高中的老师、同学、学校领导，只有一两个生面孔。个个满脸肃杀之气，有

两三个还气愤得涨红了脸。卫东这下傻了眼，原以为不过是办个学习班，审查一下，看来已把自己当成了敌我矛盾。审讯一开始还让坐在屋中间的板凳上，由于交待不满意，态度不好，立刻被喝令站起来，低下头。一个保守派的头头，还和卫东一块当过团支部干部，十分粗鲁野蛮，尽管口吃得厉害，但审讯问话最多，也不知卫东哪点触犯了他，上来就给了卫东两个嘴巴，还猛踢了一脚。一位逍遥派的老师可能看不惯，把他拉开了，卫东少挨了点打。

第一天的审讯批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卫东脑子里一片空白，真不知道他们要自己交待什么，所以所答非所问，显得前言不搭后语。主持人感到没能达到目的，气得拍桌子，命令卫东回去写出书面交待。于是，卫东被一位负责看守的教师带回宿舍。

卫东长得孱弱。虽然经过两三年红卫兵革命造反生活的摔打，有过斗争走资派、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锻炼，意志坚强了许多，但体格仍不够健康。躺在硬棒棒的床板上，全身象散了架一样，脸上的红肿火辣辣的，被踢的地方，还隐隐作痛。不一会，审讯批斗卫东的人，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地回来。他们把饭菜打完，剩下一点，喝斥卫东起来吃。卫东两眼噙泪，也不知是由于疼痛，也不知是由于屈辱，勉强爬起来，把饭菜盛在自己碗里，手拿筷子，两眼模糊，却怎么也吃不下去。这是长到20多岁，第一次该吃饭时不觉得饿。

以后的日子，就是在时而写检查，时而被审讯批斗中熬过。一开始，卫东的检查写得很认真，也比较真实，尽量回忆，把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桩桩件件，按时间顺序写出来。这时，卫东还感到一丝快

意，因为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总结一下，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把革命造反过程中经验教训找出来，从思想上得到提高。所以独自一人伏在床板上书写时，心里感到很坦然，甚至有几分自信。但这样的检查，不是被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成了下一轮批斗的罪证。

卫东真的迷茫了，自己怎么写他们才能满意呢？反反复复就是那些事啊！虽然他们凶神恶煞，把自己看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可我自己绝不是敌人啊！自从初中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直是学生干部，学校的任何一次活动都是积极分子，都是学生骨干，为什么唯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有罪了？自己信仰没有改变呀！为什么真心实意、执着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这么难！为什么一造反，一批判走资派，那么多原先夸奖自己，赞成自己，拥护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自己，在批斗会上也跟着咒骂！难道造反错了？不该批判学校和社会上的资反路线和走资派？卫东辗转反思、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心中充满了苦恼、矛盾、徬徨。

在连续审讯批斗两个多月之后，卫东的身体垮了，精神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烦恼之中。一天三次批斗会，上午、下午、晚上，他们可以轮番上阵，可“敌人”就卫东一个啊！再交待还是不行，再上纲上线还是不够，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

在卫东去医院草草看了一次病，又拖着病体连续审讯批斗三昼夜之后，认为卫东实在愚蠢，实在顽固不化，不点点他永远不会开窍。于是通过监管卫东的一位数学教师，对卫东进行个别启发，让卫东承认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卫东说：“我们的《东方红》红卫兵没定为反

革命组织呀？”这位老师说：“你真糊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死抱着你们的《东方红》是革命造反组织？那就是反革命组织，不过得换个名称，这样才能交待过去”为了这名称，卫东又被斗了几场，因为老是不能使主持者满意，最后看到卫东实在病得厉害，才同意他胡乱说个名称（因为卫东压根就不知道 5·16 组织），算是有了思想转变，可以再去医院看病。

有一段时间，卫东只想死去。这也许是一个红卫兵没经过革命风雨的锤炼，而暴露的软弱，当然，更有他身体老是闹病，折磨得意志消沉。每天夜里，卫东都因为生病要几次小便，每次还必须有人跟着，所以看守他的人十分烦，不停地辱骂，甚至把卫东小便速度慢，小便时放屁，等等，作为奚落的话柄，让卫东除了批斗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抬不起头来。

卫东真正的悲愤绝望发生在与一位亲戚见面之后。这位亲戚瞒过了与卫东的亲戚关系，借口找批斗卫东最积极的保守派头头，来到了卫东所在的宿舍。但只谈了几句话，这位亲戚就被撵走了。就是这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卫东崩溃了，绝望了！原来，最疼爱自己的爷爷病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也得了肺炎，卫东的父母、妻子几次来清查 5.16 学习班，要求卫东回家看看。但是，清查负责人不光一口回绝，还封锁消息，不让卫东知道。卫东的这位亲戚带来了噩耗：爷爷、儿子相继死了！这巨大的悲痛，把卫东压垮了！两眼发直，欲哭无泪，两天没吃没喝。审讯批斗卫东的人慌了，派他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做工作，好言相劝，细心开导。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卫东

丢掉了烦恼，心中充满了仇恨。他看穿了，这帮家伙的审讯批斗是别有用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报复，自己根本没有错，根本不应该写什么检查。他们没有点好心，完全是坏心、黑心、是狼心狗肺。他们对自己的批斗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自己应该挺起腰杆和他们斗。于是，卫东接二连三写了申诉、控诉，用纸和笔向清查所谓 5·16 的混蛋们开火。说来也怪，卫东的态度强硬起来之后，挨的批斗反而少了，那些横眉竖眼的清查积极分子，也收敛了不少。其实，卫东不知道，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已发现了山东清查 5·16 的问题，对全国各地下达纠正清查 5·16 运动扩大化错误的指示，只不过山东的袁升平他们拒不执行罢了。

从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卫东整整被监禁了八个月。

一九七二年七月初，卫东被遣送回家。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卫东终于又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了自己生产队的白茬茬的麦茬地，看到了葱绿一片的玉米苗，生活是美好的，这比牢房还牢房的清查 5·16 学习班，使卫东成熟起来。如果光有革命造反的顺利，和与资反路线明刀明枪的厮杀，不经受这法西斯一般的审查，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还理解得没有这么深刻。自己从一个逃荒要饭的苦孩子，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上了小学上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推选当了校革委会的副主任，生活得值，路走得对。卫东一路想着，觉悟又提高了不少，虽然迎接他的是个破碎的、悲痛的、苦难的家庭，但此时，他心中有一股豪气在上升。

正是有了这股豪情，卫东度过了生活的难关，继续迎接新的挑战，

回家后的第二天，大队民兵就送来了纸条，让自己在家好好劳动，定期写出书面检查，卫东心里不屑一顾地笑了；在生产队劳动，队长奉上级指示，要对自己进行监视，并不准分配轻活干，卫东鄙视地忍受着。

到一九七三年春天，卫东实在忍耐不住，开始了他的上访和“盲流”生活。他到省城济南，首都北京，所有接待他的人都很友好，而济南只有同情，北京却给了他希望。他来到东北大森林，参加伐木队，挖树坑栽树，在农场割草、干杂活。几次由于劳累和疾病，晕倒在树丛里，昏死在小河中，差点夺去了生命，是工人同志帮助和挽救了他。他熬煎着，等待着。

终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开始落实，卫东被叫到生产大队办公室，县里来的人当面向他承认，清查 5·16 中对他迫害是错误的，补发了他民办教师的生活补助，烧毁了所有的黑材料，恢复了他民办教师身份。

六、隐患

运河地区与山东省各地一样，纠正清查 5·16 错误是不彻底的。

首先表现在对受迫害的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造反派，落实的政策不彻底。也就是该恢复职务的没有恢复，该安排工作的没有安排，该行使权力的没能行使。在清查 5·16 中，已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的革命造反派，全部成了阶下囚，这不光是极大的冤案，也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动。现在落实政策，把冤案平反昭雪，就应该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安排在领

导岗位，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证各级政权不改变颜色。

其次，这次纠正错误，只搞了形式的，而没有进行思想上的纠正。也就是没有挖出真 5·16 清查假 5·16 的根源，包括思想上的，组织上的，路线上的。实际上，山东清查 5·16，贯穿着一条干扰、破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林彪集团的形“左”实右和党内走资派的极右相结合的产物。这次纠正，只抛出了林彪死党袁升平的形“左”实右，而没有触动党内走资派的极右，没有挖出山东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的总根子。这样，一遇风吹草动，这股右倾保守势力就会改头换面，重新集结，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扑来，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扑来，向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扑来。由于纠正山东清查 5·16 的错误，作为全国来说，只是个局部问题，并且从北京，从中央的角度来看，清查 5·16 工作是对的，因为确实存在着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极“左”的面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势力。这就对山东省、运河地区的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带来了困难。党内走资派，右倾保守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个困难，再加上有不少转变观点不好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各级党委的一把手，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气，对革命造反派的反感，成了彻底纠正清查 5·16 错误的最大阻力。如果暇以时日，经过革命造反派的斗争，再加上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山东省及运河地区问题，会得到圆满解决的。但可惜，这时党中央也面临着危机。

林彪的叛逃，“571 工程纪要”政变计划的暴露，对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的打击是巨大的。显然，毛主席没有预料到林彪集团会走到这一步。尽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同志的信中，毛主席已予见到林彪的一些过“左”的作法会引起严重后果，但为了革命大局，毛主席还是“平生第一次，违心地同意了”。毛主席对林彪是极尽培养之职的，对于他的才能，对于他的号召力，对于他斗争刘、邓路线的积极性，毛主席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但对于林彪的缺点错误，哪怕一点点苗头，毛主席也不放过，都进行了善意地、委婉地、策略地批评教育。可惜林彪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只是个半截子革命派，是个资产阶级政客式的人物。他与毛主席的后期关系，虽有右派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从中挑拨离间，但主要是他的内因在起作用，越到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越暴露出他无法承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重担的先天不足，越来越滑到毛主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即便这样，毛主席也是从团结出发，从大局着眼，决不愿抛弃他，更不愿对他进行公开批评或斗争，只想从内部和平地、温和地、不引起太大震动地予以解决。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席承受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把这么坚强无比的领袖的身体都压垮了，由此可见一斑。但中国这艘革命的航船需要继续前进，毛主席不得已过多地依赖了举足轻重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老好人。他对毛主席的敬仰和忠诚，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构成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产生了他行为的是是非非。让他出面主持文革中国的大局，天平就从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向否

定文化大革命倾斜。他看人看事，不从路线上分析，不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着眼，只看人的能力，只看事件的成效。而这种能力和成效，又往往是以维持现状、恢复旧秩序为尺度来衡量。所以，从文化大革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看，他起的作用就功小于过，甚至是很坏的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以保护老干部自居。其实，毛主席才是真正保护老干部、真正爱护老干部的。但毛主席是让老干部犯了错误之后认真改正，继续革命彻底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做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远为共产主义去奋斗。大凡一个经过枪林弹雨的老干部，都比较自负，个性比较强。解放后有功臣自骄自傲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受冲击，极易顶牛，这时需要的是继续革命思想的灌输，才能转变观点。这时也很容易接受同情，而周恩来的爱护老干部恰恰是从感情出发，以友谊为纽带，以工作需要为出发点，所以往往陷入阶级人性论的泥坑，成了老干部免受批判的保护伞。

从 1972 年起，周恩来就开始保护老干部的第二步工作-----使用老干部。由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所以过多过重的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错误；由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所以过多过重地认为老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这种不分是非的同情，使周恩来更愿倾听老干部的意见，更愿意使用老干部。另一方面，对新干部，对革命造反派，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只不过这种情绪，由于他的涵养，由于他政治斗争经验的丰富，隐藏得很深，表达得时

机得当，很难让人看透罢了。

周恩来使用老干部的重大行动，就是创造条件，让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上台。他很能把握毛主席的忧虑，不失时机地利用和加大了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中革命左派的不同观点和矛盾焦点，又善于给老干部、给邓小平一类走资派制造东山再起的机会。周恩来的本意，不一定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的行为，却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是个死硬的走资派，又是个狡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两面派。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抓住林彪事件的契机，作了一番批林、永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演，并要求在工作中改正自己所犯错误。毛主席心力交瘁，需要依靠周恩来稳定大局，也给了周恩来面子，让邓小平再次亮相，在他有生之年辨别一下真假猴王。于是，从一九七三年底到一九七六年初，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作了第二次反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如果说第一次伙同刘少奇是赤臂上阵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么这次在周恩来的庇护下，代表党内走资派和右倾保守势力，是非常狡猾阴险地进行翻文化大革命案的罪恶勾当。

邓小平有着国内外政治斗争经验，善于抓住根本问题作为实现目的的破口，他首先利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通知中传达的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制定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行动路线。“三项指示为纲”的内容是：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歪曲毛

主席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把专政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胡说什么“抓革命，主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这是对思想政治领域讲的”；他抓安定团结是一边倒，即只许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用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用修正主义的纪律秩序压人、整人，镇压革命造反派，而不许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方向，不许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不许抓阶级斗争，不许和走资派进行斗争；他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幌子，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把大批没有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招揽在他的黑旗下，把各地受压的革命造反派的正当要求视为大逆不道，进行残酷镇压，并蓄意栽赃陷害，大肆逮捕革命干群。他所谓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在管理上搞“管、卡、压”，继续进行“物质刺激”，继续宣扬学习资本主义。

在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蛊惑下，各地领导班子进行了重组。把那些不怕被骂为“还乡团”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死硬派拉进党委，成了“以生产压革命”的英雄。而“三结合”中的革命干群的代表，都以“肿”“散”“骄”“奢”“惰”的罪名被清除，被排挤。邓小平挥舞着所谓“反对派性”的黑旗，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诬蔑为“派性斗争”，把革命造反派都打成“派性发作的坏头头”。这样就从政权机构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性质。

邓小平以三项批示为纲，对各行各业的整顿，就是妄想把中国的革命航船引向资本主义航道。这一点，在 10 多年后，邓小平的吹鼓手们，还为 1975 年的失败而惋惜，使得邓小平的事业直到一九七九

年才得以继续发展。

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前后的表演，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留下了隐患，给全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临终前留给共产党人识别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笔宝贵财富！

七、指路明灯

面对邓小平刮起的复辟翻案妖风，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同全国人民一样，表示了极大愤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理解广大革命群众的心，最坚定地带领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前进，最不能容忍走资派的兴风作浪。

下面摘录部分 1974 年至 1976 年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语录和指示，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斗争的性质和尖锐程度。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他这个人（指邓小平——抄者注）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他（指邓小平——抄者注）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

不翻案’，靠不住啊。”

“翻案不得人心。”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人民知道。”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

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看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为了鼓励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又一再发出号召：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对于毛主席上述指示的背景，有几个方面值得很好地探讨一番。

首先是清华问题。

在一九七〇年恢复高等院校招生之后，清华大学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思想品德好，路线斗争觉悟高，有一定的基础文化知识。他们的入学，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

迟群、谢静宜是毛主席亲自派到清华大学军、工宣队的负责人，

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左派。他（她）到清华后，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教育改革一系列工作中，都做得十分出色，成为毛主席赞许的“六厂一校”中的“一校”，他（她）们以军、工宣队名义写出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被毛主席党中央批转全国，成为学习的榜样。

无论是军、工宣队进驻，还是工农兵学员的入校，都触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邓小平等人拼命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利用当时重新站出来所捞到的权力，一方面大力为这些人谋个人福利，制定了所谓“五子登科（解决房子、炉子、孩子、妻子、车子）”计划，另一方面是煽动这些人带头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以写信的方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拼命污蔑工农兵大学生，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就是他们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阴谋之一。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所谓问题，攻击大学教育改革，以抓教学质量为名排挤工农兵大学生，等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邓小平一手操纵进行的。

所以毛主席说：“清华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的问题，确实波及到社会上，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成为谣言四起的三个月。先是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谣，除了编造历史问题，就是胡说什么他们是“四人帮”，已受到毛主席的

批评，毛主席已不信任他们了。把政治局委员生活会的内容，把毛主席对江青等人严格要求的谈话，都进行片面的、别有用心的无限扩大，通过各种渠道，到处传播。显然，能够编造这类谣言的人，一定了解中央内幕，除了邓小平，还有叶剑英等人。这也是“清君侧”的惯用伎俩，这也是林彪集团的故伎重施。后来一看光造谣不行，就指使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分子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以此表达所谓的“民心”。可惜这些信空洞无物，千篇一律，好象出于一人手笔，发出的是一个腔调，都是污蔑攻击江青等人，都是对邓小平等人进行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因为这时他们还不敢用露骨的语言来公开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制造流言蜚语的方式来造反革命舆论。

其次，关于历史小说《水浒》问题。

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年龄不饶人，身体的其他机能逐渐衰老，但头脑一直非常清楚，思维相当明晰，一直到逝世时刻，还保持着统帅全局的能力。当毛主席听到了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以来的谣言，看到了一封封经邓小平的手转来的所谓“人民来信”，又观察到了邓小平一伙的所作所为，认为到了反击的时候了。所以，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借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的机会，发出了政治信息，这就是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

毛主席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

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后发动的一次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光解放后，毛主席就发动过对“《红楼梦》研究”等文学作品，对《情宫秘史》《武训传》等影片，对秦始皇，孔丘等历史人物的评论，其“古为今用”的革命斗争目的是再明显不过的。所以，对《水浒》的评论也值得好好学习和研究。

毛主席对《水浒》评论的中心意思，是批判投降派，反对投降派，号召革命人民与投降派进行斗争。投降派的主要特征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就是在维护、巩固旧制度的基础上，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它是革命队伍中的右翼，对革命人民起着消蚀麻痹的作用，它与统治集团中的改良派、清官政治是遥相呼应的。在封建社会，投降派是维护封建皇帝的宗法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投降派是拜倒在资本主义“平等、自由、博爱”“金钱第一”“物质至上”的虚幻宣传之中；在社会主义社会，投降派则拼命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保护党内走资派，保护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

投降派的思想基础就是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把社会主义改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成与时俱进的个人理论和思想，一两字之差，谬以千万里。

投降派的作用就是危害革命，替“皇帝”效力，当“皇帝”的爪牙，打击、镇压、消灭真正的革命派，推迟革命的进程，延缓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投降派也有不满，也有牢骚，也有斗争，但这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是争权夺利的斗争。投降派打出的所有漂亮的旗号，五颜六色，就是为了迷惑人，欺骗人，一旦投降派上台了，就会露出狰狞丑陋的面目。

投降派的下场就是“奴才“，永远是皇帝面前直不起脊梁的癞皮狗、哈叭狗，摇尾乞怜的丧家狗。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莫不如此。

那么，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中国，有没有投降派？识别投降派的标志是什么？确实有，并且存在于中共领导上层。那些重新站起来又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派也是投降派，他们向资本主义投降，作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向帝国主义投降，成了新老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象华国锋这种“不忠不肖不仁不义”之人，也是典型的投降派。只可惜，毛主席当年相信了他们的表象，认为通过批判投降派，可以让他们提高觉悟，可以警戒他们不当投降派。象华国锋一类人物，就是不理解不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私心严重，权力欲强烈，只考虑个人的恩怨得失，思想深处还是

个资产阶级王国，向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投降，成了党内走资派、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帮凶和走狗。

广大革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遏制了投降派在革命队伍中的蔓延，在一九七六年四月揪出了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取得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胜利。

第三，关于“翻案不得人心”。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就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当中共“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充分肯定和赞扬，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把批判修正主义作为党员的义务，把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阶级敌人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之后，这股势力就时时窥测方向，进行翻文化大革命案的罪恶活动。这股势力的指挥者、操纵者、幕后策划者，就是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它的社会基础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因循守旧思想，它所代表的是官僚特权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

人们都认为“翻案不得人心”是针对邓小平说的，其实，毛主席这个英明论断，不只是对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人；不只是在当时适用，而且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反对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走资派上台，就要复辟资本主义，这不已经被中国的当代史所证明了吗？这怎么能得人心呢？

事实上，单从中共上层，当年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人也不只邓小平一人，而是有一大帮，有的还隐蔽得很深，其中叶剑英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毛主席在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告诉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人：“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不是和他有关系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毛主席的这些话，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公开过，主要为了集中打击邓小平。这样一来，很多人没有认清叶剑英的真面目，导致叶剑英参与反对所谓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还把他捧为英雄和功臣。

第四，毛主席的晚年，仍在孜孜不倦地思考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对象，依靠力量，应实行的方针、路线、政策。要巩固这些成果，要继续前进，就应该进一步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毛主席晚年一再号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次伟大号召，是毛主席一生留给广大革命人民最后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它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而响应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这一伟大思想，当数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怪乎，在当时及

资本主义复辟的今天，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么起劲地反对、诋毁、谩骂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原来这篇文章代表了毛主席的声音，代表继续革命的声音，戳在了资产阶级的痛处，挖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祖坟，给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敌对势力以致命的一击。所有真心实意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愿意搞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人们，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都应该从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主要论证了在无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一九七五年，“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以及“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政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解答了“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问题。

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历史过程解释还欠完全。“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应该有个发展过程，“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内容决不完全相同，应该有个侧重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它强调，阶级的存在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是与生产发展相联系的；存在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反复较量，最后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最终进入无阶级社会。所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必然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漫长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第一回合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第二回合的斗争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加强对资产阶

级的全面专政。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内容就是消灭和改变“四个一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阶级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也就是实行两个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或者说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和奴役等内容。更简洁地说也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一个过程，象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有一个限制、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快慢，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而在一定意义上讲，物质又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张春桥文章中说的，“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但有了物质基础，也不一定能加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指导思想不对还会加强资产阶级法权，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并且物质的积累，也是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改造过程中完成的，决不能搞为生产而生产，搞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要区别。

所以，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又一个分水岭。你是马列主义者，就应该对资产阶级法权加速进行“限制、改

造、消灭”的过程，你是修正主义分子，就会死抱着资产阶级法权不放，极力扩大，加强巩固资产阶级法权。

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人人起来管理国家，人人都有权参与决策，人人都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来维护社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限制、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才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总之，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一系列公开发表的最新指示，既是对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是革命人民继续前进的指路明灯。运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全国一样，在毛主席英明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于一九七六年四月迎来了春光明媚的季节。

八、最舒心的日子

一位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革命群众代表）说：“一九七六年的四月至九月份，是最舒心的一段日子。”这也许表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段时间的情势。

1、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问题的决议。

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刘、邓路线一直是批判对象，刘少奇、邓小平是不分家的，自从中共“九大”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邓小平就成了焦点人物。邓小平能不能认识错误，幡然悔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善良的人们期盼着等待着，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则积极做工作，既严厉批评邓小平的错误，支持革命造反派揭发批判他的罪行，又把他与刘少奇分开，体现党的一贯政策，给予出路。邓小平这个狡猾的修正主义头子，是个惯于耍两面派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看到大势已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不可逆转，多次写检查，认罪服输，并保证拥护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并趁着林彪事件之后，中央权力机构出现危机之时，一再要求出来工作，参加批判林彪。毛主席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让邓小平重新站出来，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看看他在工作中的表现。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不应该安排邓小平这么多重要职务。毛主席却不这样想。毛主席认为，既然让邓小平站出来了，就应该重用他，让他放手工作，这样才能暴露他的真实思想，看看他是否真的改正了错误。不工作，不担当独挡一面的重要工作，是难以看清他的真面目的。毛主席还认为，如果邓小平还要捣乱，执意翻文化革命的案，与其今后，不如现在。

邓小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大权在握，又有周恩来的支持，依仗着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老干部是跟着刘、邓路线走的，都是反对

文大革命的，所以就从整顿入手，接过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谈话，改头换面，发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指示，并大肆起用那些“不怕被骂为还乡团”，“敢于担当复辟风险”“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人”，彻底整顿他所管辖的部门的领导班子。一时之间，出现了“黑云压城”的局面。邓小平曾跟他的死党胡耀邦说：“主席年纪大了，我们造成既定事实他也就没话说了。”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当然遭到江青、张春桥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和批评，这也就是邓小平等人特别恨他（她）们、再次激起复仇之火的原因。

毛主席是从一九七五年九月开始察觉邓小平问题的。在这之前，毛主席一直有意多批评江青等人，让他（她）们不要过多干涉邓小平的工作，不要对邓小平求全责备，寄希望于邓小平能改正错误，拥护文化大革命，站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但自从邓小平发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所谓整顿，毛主席就开始了对邓小平的规劝和批评。先是发出评《水浒》批宋江的指示，号召大家不要当投降派，要警惕投降派；继之，又在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付书记刘冰的信上作出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还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在迟群身上，……”这就既批评了刘冰等人，表示了对迟群、谢静宜的支持，也给邓小平敲了警钟。同时，毛主席又一次出面告诫一些老同志：“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从以上不难看出，毛主席对邓小平，与对刘少奇、林彪等人一样，总是对事不对人，总是本着“团结----批评（斗争）-----团结”的公式，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一道前进，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想把他们拉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

可惜，邓小平与刘少奇、林彪等人一样，由于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作祟，资产阶级本性难以改变，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一个以“还乡团”为荣的死硬分子。他变着法子和毛主席对抗，千方百计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使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东山再起。直到一九七六年初，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一些尝到以整顿为名搞右倾翻案“甜头”的文革反对派，借周恩来逝世，到处挑动群众闹事，妄想阻挠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批评，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向党中央施加压力，所以才有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的决定。至此，邓小平也不得不哀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指毛主席）。”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运河地区的革命人民听到党中央的决定，欢心鼓舞，衷心拥护，给继续革命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因为从此掀开了从 1975 年十一月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篇章。

2. 反击右倾翻案风，接着进行批评邓，这才把运河地区的路线斗争摆正确。文革十年，先是刘、邓路线，后是林彪、袁升平反党集团的破坏，接着邓小平上台搞整顿、搞翻案，一些党内走资派，反对

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也一次又一次兴风作浪，运河地区政治风云变幻，翻来覆去，路线斗争一刻也没有消停过。最突出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党内走资派有没有，该不该斗，刘、邓路线严重不严重，其流毒该不该肃清，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派是不是新生的革命力量，是否需要提拔重用，等等。

由于搞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运河地区出现了“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光荣”，“斗走资派有功”的群众舆论，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修正主义非批不行”，“党内走资派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就是代表官僚特权阶层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敌人”。“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力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才代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等等，一边倒的正确认识。

3.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河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革委会中的革命造反派干部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又“吃香”了。他们有了发言权，有了监督权，有了独挡一面的权力，他们可以代表革命群众的意愿，向各级党委提出批评和要求，可以参与各级政权的决策。那些被邓小平在整顿中树立的典型，再也不敢向文化大革命、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了。人们的心情真是无比舒畅。

4、一些犯过走资派错误，执行过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邓小平刮起“翻案风”“算账风”中又犯了错误的老干部开始转弯子。他们认真学习了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布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大多数人彻底改变了观点和立场。

这个批示的全文如下：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都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到这时，所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所有对文化大革命有不正确认识的人，才真的服气了。

5、公安工作第一次明确提出研究“对党内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公安工作已逐步改变了那种“秘密办案，少数人办案”的资产阶级作风，实行了“开门办案，群众办案”，把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专政机关回到人民群众之中，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要进行群众专政。现在，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河地区公安机关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

公安机关应配合群众的批判运动，“特别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迫害，要研究怎样对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行专政的问题。这不光运河地区，在全国都是个崭新的课题，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需要面对这个实际问题。一九七六年六月的全国公安会议及随后召开的运河地区公安会议，都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缕胜利的曙光。

6、教育是邓小平复辟倒退，大刮右倾翻案的重灾区。他反对军宣队、工宣队、贫下中农长期在学校驻下去，策划了清华大学党委个别人的诬告信；他支持反对工农兵大学生，以考试、分数把工农学员拒之门外；他提倡培养尖子，把学生关在书斋里，造就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贵族。

针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回潮，运河地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加强了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力度；为了批分数挂帅，也仿照中央的做法，对所属的大学教师，进行考试。结果表明，决不能单以分数高低来衡量教师，也不能以分数好坏来衡量一个学生。教育战线的师生员工理直气壮地说：“阶级斗争是学校的一门主课。”“我们要的是又红又专的人材。只红不专，可以补上文化专业知识，如果只专不红，成了精神贵族，那就是资产阶级接班人，是个危险品。”

7. 一场政治运动就是一次整党运动，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运动的结束，必将使共产党以更加完美的形象得到加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号召下，能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分子吸收

到共产党内，是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从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吐故纳新”的指示以来，在“故”和“新”的问题上老是纠缠不清，造成各地党组织的整顿工作不平衡。现在把邓小平又一次揪出来，明辩了大是大非，运河地区各级党委把吸收优秀的革命造反派入党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许多一贯表现突出，经得起一次次路线斗争考验的革命造反派被发展为候补党员，开创了运河地区整党建党的新局面。

8.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中国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当数唐山大地震。这次地震裂度之大，发生之突然，造成的损失之严重，都是前所未有的。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关心程度之高，各级党委反应之迅速，有关部门援救之及时，善后处理之得当，防震救灾之声势浩大，动员人数之广泛，人民群众精神面貌之饱满，社会程序之良好，都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巨大效应，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出的丰硕成果。这一切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运河地区先后接纳救治了上千名地震灾区群众，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模范事迹。由于运河地区当时也是防震重点区域，各项防震措施都做得非常细致周到，整个社会风气，道德品质表现得从来没有这样好，助人为乐，争做好人好事，舍小家顾大家，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防震棚里时时奏出一曲曲共产主义精神的赞歌。

运河地区在整个抗震防震救灾的日日夜夜，从没发生一起恶性案件。人心达到这样齐，个人私心做到这样少，大家的积极性这样高，社会风气净化得如此好，应归功于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气候。因为群众中稍有不良行为，就会被指责为刘少奇、邓小平、林彪、

孔老二的流毒没有肃清，就会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9. 一九七六年，运河地区夏粮获得大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这得力于社员群众的干劲大，积极性高，科学种田的意识强，集体主义精神大发扬，社会主义经济得到空前巩固。经过批刘、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少社队已经不留或只留很少的自留地，大家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各种社队企业也红红火火发展壮大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为集体、敢闯敢干愿吃苦的青年人，被选为社队领导。他们心气高，干劲大，提出“要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要为革命造反派争气”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运河地区的工业生产，也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东风，月月捷报频传，每天都迈上新台阶。

总之，运河地区踏着全国一盘棋的步伐，经过曲折反复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迎来了它灿烂明媚的春光，预示着它应该有一个圆满胜利的结束。

第五部分 没有完结的斗争——命运之歌

一、风云突变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于这种唯心的思想是应该批判的，因为风云是可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测”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祸福是旦夕发生的，但总有它的前因后果，绝不会毫无联系，毫无根据的从天而降。这句话的可取之处就是风云的突发性，祸福的偶然性。因为在公元一九七六年九月到十月的中国，就出现了突发的风云，旦夕降临的祸福。

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的红卫兵战士，写下了他亲身体验的第一次严峻时刻。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三点，我正怀着刚生下娇儿的幸福心情，蹲在蔬菜园里给大白菜清理根部的杂草。突然，广播里奏起了哀乐，我并没十分在意，以为是中央那位老干部又去世了，但听到‘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立刻停住了手中的农活，慢慢地僵直地站起来。我不相信了自己的耳朵，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不相信了西落的太阳，感到天地已经不存在了。我没有听完‘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下面的讣告内容，就丢下干活的工具，两眼噙泪，急转身，跌跌撞撞快步向家走去。母亲正坐在庭院里做针线活。我急三步走到母亲身边，再也抑制不住万分悲痛，趴在母亲的膝盖上，失声大哭起来。母亲急问：‘怎么了？’我哽咽着回答：‘毛主席去世了！’顿时，母子俩都哭成了泪人。”

这样撕肝裂肺般悲痛的经历，在同一时刻，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何止亿万人！

山西侯马的纪实文学作家师东兵，曾这样描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和委员叶剑英这两位重要人物是如何面临这一严峻时刻的：“张春桥连眼皮都没有顾上合，甚至将消息瞒着家里的人”，“他几乎不敢回头再往停留领袖尸体的那个方向望一眼，更没有勇气报告这个消息。只要一开口，大滴大滴的泪珠就会滚下来，那克制强忍的力，在他嘴唇上留下了牙痕的迹象，……。”“叶剑英猛地一怔！啊，果然成了残酷的现实，那个活生生的伟人已经消失了！他腾地跳将起来，没

有去接伸到他面前的黑纱和白花，却睁大了眼睛，神驰意往起来。”

如果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幸逝世是自然规律，那么，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凌晨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则反映了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规律。

不少人把中国的演变与苏联的变修混为一谈，认为都是共产党没能抵御住和平演变的挑战，都没能跳出“兴勃败忽”的历史怪圈。其实，大不然。

苏联，由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它的领导权，在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被代表官僚特权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派所篡夺，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不进则退”，不革命就会逐渐厌倦革命，到反对革命，这有什么话说！

中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指导，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它的政权已经不容易被党内走资派篡夺。所以，要想保护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只有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也符合政治斗争的规律。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中国，绝不同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苏联。尽管有毛主席逝世的巨大悲痛压在心头，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权还牢牢地掌握在毛主席生前所依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只要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计划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份召开），确定了党中央主席和集体领导，中国一定会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力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沿着毛主席革命

路线，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阔步前进。这就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含义。

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切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伺机算文化大革命帐的还乡团们，对当时的形势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已经失败但不甘心灭亡，所以用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拼命挣扎，在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只有 27 天），可以说尸骨未寒，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国丧的悲哀之中，就迫不及待地、孤注一掷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连政变头目华国锋、叶剑英事后也承认，“当时并没有多少把握”，“形势非常危险”，可见政变者多么心虚，象一切窃国大盗一样！

政变者们尽管巧舌如簧，百般丑化“四人帮”（指毛主席的妻子、同志和战友江青、毛主席亲自提拔、培养重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个无产阶级革命派），似乎自己理直气壮，甚至杜撰了毛主席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那么我们要问，你们为什么不敢召开党的会议，进行说理斗争呢？你们为什么不敢召开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正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问题，象毛主席通过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通过九届二中全会解决林彪、陈伯达的问题一样？你们的政变挂帅人物华国锋一再讲，毛主席一次也没有单独和他谈过话，毛主席经常和江青、张春桥单独见面谈话，那么试问，你们昭告天下和大肆宣扬的“毛主席遗嘱”，“毛主席的谈话”有谁可以做证呢？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毛主席临终的嘱托公布出来，反而大量销毁不利于自己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讲话呢（有华国锋与采访记者的谈话为证）？你们如果有理，为什么在中央进行了政变，还必须在全

国进行秘密大逮捕呢？你们如果有理，为什么不敢和全国人民公开辩论文化大革命问题，而是采取法西斯手段，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定为“三种人”，进行残酷迫害呢？

够了，你们没理！你们是通过卑鄙的、齷齪的、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发动宫廷政变，才篡夺政权的！你们是历史的罪人！你们与中外历史上一切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的坏蛋一样，将永远被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你们篡夺到的政权是伪政权，是永远不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的！你们的政权才是中国历史上地地道道的、证据确凿的怪胎！

一切通过不合法手段夺得政权的窃党窃国大盗们，都需要进行自我包装，以正统自居，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跳梁小丑们，也作了蹩脚的表演。

首先是把政变的前台指挥官“扶正”。华国锋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否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是否就一定要当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变者既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又没有通过召开中共中央全会来取得合法手续，就匆匆忙忙于政变的第二天（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宣布，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相当于封建社会中继承了皇位。这个“皇位”的宝座是在腥风血雨中取得的，是踏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尸骨走上去的。人们有权去指责评说历朝历代的篡位者，那么更有权力批判当今中国用武力政变进行篡党夺权者。

其次，政变的第三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就盗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政变者根本没有时间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是先声夺人，惧怕他们政变夺取的政权不合法，造出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假像，急匆匆祭起毛泽东的大旗。这个假像欺骗了中国老百姓，这面大旗已使政变者吃了二十多年。且不说当年《毛主席纪念堂》的工程是何时开始的，就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的“选集”1~~~4卷早已出版，第五卷也早已编辑完成；而“全集”，时过27年也毫无音讯，何须急匆匆地向全国人民宣布？政变者当时心虚得很！

第三，全国人民已记不清是何时，——也许三天之后，也许一个星期，也许十天之后——才正式听到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因为政变者需要封销消息，完成他们的反革命部署。他们首先需要进一步制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对手，其次是各省市、各地方、各部队的高层反抗者。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在封锁信息的情况下，假借中央名义，调入北京，进行秘密逮捕。一时间，北京街头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参与政变的全付武装的部队，随时开进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家中，闯入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办公室里，冲到不少外地党政军负责人来京下榻的宾馆招待所，随处成了大逮捕的屠宰场。

第四，利用散布小道消息，利用私人关系打招呼，假借中央的名义，齐头并进，政变者大搞行骗活动，充分玩弄散布他们政治对手所谓“罪恶”的伎俩。这些所谓的“罪恶”根本不值得一驳，因为他们的政

治对手都是积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执行的路线、他们开展的工作，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肯定和支持的。政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顽固态度，经过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一个又一个回合的斗争，经过全国人民的一次又一次群众运动，已经大白于天下。当政变者给他们的对手制造这样那样的罪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否把你们制造的罪行公开对证一下？可否开展一下大民主，让全国人民都参加辩论？

更为可笑的是，政变者们在上台执政时间不长，就开始了新的争吵。

争吵的话题之一，就是反革命政变中谁立了头功。华国锋曾洋洋自得地对访问他的作家说：“我粉碎‘四人帮’的这个功劳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要是没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中国也不会有现在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抄者注）。”又说：“四个政治局常委，我要抓两个，那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确实，在欢呼政变喜悦的最初岁月，一直把华国锋捧为发动政变的英明领袖，但这只是表象。另一个争功者叶剑英，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说明自己才是政变的真正策划者、指挥者，华国锋不过是被利用的傀儡而已。为此，御用文人专门写了一部书，叫《叶剑英在 1976》，把叶剑英描绘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统帅，是 1976 年 10 月 6 日反革命政变的大英雄。还有另一个更加阴险狡诈的人物邓小平，对华国锋、叶剑英的功劳都嗤之以鼻，“你们算什么？没有我的路线，没有我的影响，你们能政变成功？充其量，叶剑英只是个好伙伴，华国锋不过

是我玩于掌上的阿斗！”

邓大人说得不错，政变后不到两年，华国锋就被赶下台，叶剑英也随后只得靠边站，真正掌权的还是邓小平。

争吵的话题之二，就是这次政变的性质是什么。华国锋这头呆鹅，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以为坐上了政变后的第一把交椅，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就可以大权在握，以毛主席的接班人自居，堂而皇之地向全党全军全国人发号施令。可悲的是，华国锋这个反革命政变的前台指挥官，还没有弄清这次政变的性质，愚蠢地认为，政变后还可以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照毛主席以往的指示（当然不包括对江青、张春桥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的指示）办事，可以修改一下毛泽东思想的原意，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能接受，这样就可以在“抓纲治国”的号令下，舒舒服服地去建设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政变的后台老板一看华国锋没能真正领会政变的意图，还顽冥不化。于是，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光一脚踢开了华国锋，而且曝露出政变的性质和目的。原来政变是为了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场狗咬狗（专指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争吵，真给全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

争吵的话题之三，谁最需要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谁在驾驭政变后的发展方向。

既然政变是为了打倒文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推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地位，为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障碍，那么谁最仇视文革，谁最

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一心复辟资本主义，谁在文革中失去了统治地位被推翻、被批斗，那么谁就为了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去冒天下大不韪发动政变。政变后也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发展。所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大大小的资产阶级分子，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势力，才是最需要发动政变的，也只有他们才代表了政变后的发展方向。但是他们名不正言不顺，又不掌握军权。叶剑英是 1976 年多次受到毛主席批评后到北京西山去休息的人物，实际上已经靠边站，邓小平是 1976 年被第二次打倒的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所以他们必须推出华国锋，制造和利用了他与所谓“四人帮”的矛盾，先让华国锋实施了政变计划，随后又让华国锋挂个虚名，而暗地里安插自己的人马，等待时机，从后台走上前台。这个过程是通过 1977 年的中共“十一大”和 1978 年的五届人大来完成的。

华国锋，这个反革命政变时的前台指挥官，政变后的傀儡头目，虽然没有盖棺，亦可定论。他从参加革命队伍那天起，就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们并不怀疑他对毛主席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但他绝不是毛主席属意的接班人。他参与和具体指挥了 1976 年 10 月 6 日的反革命政变，把中国人民交给了狼心狗肺的资本主义复辟狂，把毛主席开创的丰功伟业毁于一旦，不光给自己清白的前半生抹了黑，而且背叛了毛主席的教导，成了千古罪人，变成一个不忠不肖不仁不义的人。象华国锋那样的人，由于私心权欲太重，根本没有什么路线觉悟可谈，只适宜做些具体的实际工作。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他夹着尾巴做人，会很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所以毛主席提议他

当党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据说也是江青、毛远新的建议）是完全适合的。可惜毛主席一去世，华国锋就暴露了长期压抑隐藏的个人私心，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自不量力，野心勃勃，完全没有路线斗争观念，不听毛主席生前要他“抓大事”的告诫，跟随错误路线进行反革命政变，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泥坑中，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现在回到这次政变为什么能够得逞的话题。偶然发生的祸福尚且有其前因后果，何况这么震撼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大政变呢！

政变的起因还要回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毛主席不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会惹恼党内走资派，就不会得罪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主席一再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一个庞大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存在于党政军各个方面，存在于上、中、下各领导层中。虽然经过毛主席带领革命造反派浴血奋战，打掉了不少反革命的土围子，但毕竟这样的土围子太多，并且打掉的还会长出来。人们几千年因循守旧，习惯于官吏的统治，习惯于官吏的作威作福，而共产党员是“打下江山坐江山”，天经地仪，谁不想享受一下，做到名利双收？谁愿意出头，搞什么继续革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那个傻瓜愿意革自己的命？毛主席在世时，他老人家威望太高了，有些人不得不听，有些人口是心非地听，有些人盲目地听，真心实意地听并且明白毛主席意图身体力行地去做能有几个？

现在毛主席去世了，要进行以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分子江青、张春桥等人为目标的宫廷政变，确实有绝大的社会基础，确实得到了党内走资派，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确实获取了深受封、资、修思想毒害的人群的盲目拥护。这是 1976 年 10 月 6 日政变能够得逞的必然性。

至于，华国锋等人的叛变，叶剑英的老练狡猾、邓小平的阴谋诡计，还有其他，主要是共产党的元老、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的八方串联，四方呼应，等等，都是些外部原因，都是成功的反动政变必不可少的。

最可气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无能（当然，所谓无能也说明她（他）们不搞阴谋诡计）。政变固然使他们身陷囹圄，使全国人民遭殃，更重要的是，政变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毁于一旦，使历史进程倒退了几十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说江青、张春桥等人无能，除了他们自身性格方面的缺陷，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远见。试想，你们为什么不首先抓住华国锋、汪东兴两个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团结他们，一起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成毛主席未竟事业呢？这种团结难道一点可能也没有吗？要知道，华国锋、汪东兴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手提拔的，反革命派对他俩一直是有看法的。他俩的私心、权欲，你江青、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一下呢？有个材料披露：在政治局全体成员焦急地盼望毛主席病情时，张春桥沉痛地从毛主席身边走出来，刚宣布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叶剑英这只老狐狸马上和身旁的人小声叽咕句什么，立刻把头扬起来，对坐在中央位置的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又是毛

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现在应该由你来说话了！”而江青、张春桥等人此时竟被叶剑英的话乱了方寸，被叶剑英的话所激怒，白白把华国锋推给了叶剑英。虽然这个情节无从考证，但说明叶剑英最早紧紧抓住了华国锋，充分利用了华国锋当时的地位。

也许，江青、张春桥等人怕华国锋弄假成真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利。可是，华国锋是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叶剑英说了算的，也不是华国锋想当就可以当的，只要有你们在政治局，可以慢慢地使真相大白。再者，华国锋当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正常分工，决不会让他再当党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后来，让华国锋兼了，那完全是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玩的木偶戏，既不正常也不能当真），二者必取其一，而且按照华国锋的情况，继续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可能性最大，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安排的。那么空下来的党中央主席一职由谁担任？只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发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党中央主席的位置还能跑掉吗？只要紧紧抓住华国锋、汪东兴，不让他们叛变，顺利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主席会圆满地产生。这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政治短见，表现无能所出现的失误。

江青、张春桥等人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难道就不能学学毛主席的一招半式？“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毛主席说的这些话是无比英明正确的。但正确路线的产

生，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决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通过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要采取各种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体现路线的正确。

远的不说，只一九四九年之后，毛主席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制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起来，一次也不容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为了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起用了林彪，依重了周恩来，事实证明，林彪、周恩来也不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分明。毛主席也没有自恃自己的路线正确、威望高而掉以轻心，也是作了周密的计划，并且亲自出马，去南方视察，还在所有的公开文件和讲话中，把林彪安在应有的位置，并一再表明，林彪和自己的意见、看法完全一致。当然这是后发制人。但“后发”者准备更应充分，思虑更应周到，否则，“后发”就发不起来。江青、张春桥等人“后发”就没有发起来。苏联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打了“时间差”，中国七十年代的反革命政变者也打了个“时间差”，皆因为后发者毫无准备，或者准备不周到。

有意思的是，当年毛主席本想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和平解决林彪问题，而 1976 年毛主席逝世后，汪东兴也多次向华国锋吹风，惧怕召开十届三中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据华国锋供认：“汪东兴告诉我‘当初毛主席和江青、张春桥他们就是准备要在九届三中会全上解决林彪的问题的’，‘现在又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了，肯定是要解决你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三中全会对你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听了汪东兴的话，我当时感到很紧张，觉得不尽快除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

迟早是个害。这时我已经没有任何的退缩的余地了”。虽然无法和汪东兴对质，但华国锋交待的基本属实。汪东兴显然是奉叶剑英等人之命来做反革命政变的说客的。他们用自己之口，已经把自己摆在与林彪集团同命运的位置，说他们是反革命政变不是货真价实吗？！反革命者，反对革命也。1976年10月之后的中国还革命么？反对革命么？事实胜于雄辩！反革命的桂冠戴于邓小平、江泽民等人头上，那是再恰当不过的！

“十·六”反革命政变有个演变过程。1976年10月6日完成的是抢班夺权，1977年的“十一”大则实现了组织上的清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在思想上理论上“功德圆满”。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世俗的眼光，“历史是由统治者写的”也只反映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虽然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反革命政变成功了，并且还至今统治着中国人民，用谎言继续欺骗善良的人们，但这并不反映事实真像，更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历史的风云突变是经常发生的，只有经过突变事件，才会成就正反两方面的社会进程，才能让人类一步步从初级到高级，从盲从到科学，从必然到自由，获得真理，达到飞跃。

二、罪恶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反革命宫廷政变造成的罪恶，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四个字来形容。公元六八四年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历数武则天的罪恶，那是站在李氏王朝立场上说的，其中“一抔之土未干”，是指唐高宗死后仅一个多月所作的

“讨武檄文”，从此“檄文”传诵至今。可是真正有意义的檄文应该指向逆历史而动的反动派。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发动政变，是违背了人类社会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历史规律，最应该享受“讨伐檄文”的“殊荣”。隋末李密对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尽；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话，移用到公元一九七六年的政变者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这次政变使中国历史倒退了数十年，使亿万革命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英雄儿女的头颅和鲜血付诸东流！

反革命政变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祭起了他们的法宝，运用了他们的统治诀窍，施展了他们腐蚀人民灵魂的诱饵。

他们的法宝，就是“不争论”。政变的原因不许争论，政变的性质不许争论，政变后要走什么道路更不许争论。所谓“不争论”就是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宣传舆论一边倒，“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稍有争论的苗头，一出现不同意见，立即进行封杀，打棍子，戴帽子，动用军队、警察对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轻者软禁，重者投入监狱。如果胆敢反抗，诸如上访、游行、示威一类的反抗，马上开枪动武。臭名昭著的“六·四”事件就是他们不许争论酿成的恶果。

他们的诀窍说来也简单。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二是渐进式的改变开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共产党的红旗，社会主义的红旗，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护身符，是他们维系政治生命的宝贵财富，这是必须要打、要抗的，否则一天也混不下去。不过，他们本来就是反面人物，思想、立场、感情都是资产阶级的，硬要充正面人

物，要代表无产阶级，不光表演得不像，并且时时会露出马脚，惹得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愤怒之余，也投以嗤笑。他们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开放就是投降帝国主义，而改革开放是在渐进式语言“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的招牌下进行的，这就产生了麻醉人的效果，达到在人民群众晕头转向的情况下完成反革命勾当的目的。

他们的“物质刺激”，“一切向钱看”，“处处讲个人效益”，是精神鸦片，物质钓饵，是诱发人们私心私欲的催化剂，是爆炸在社会主义中国上空满载着罪恶细菌的原子弹。人们有了食品，有了工业品，满足了物质生活的暂时需要，一定会问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样来的？是偷来的、抢来的？上一辈留给的？卖国卖主求荣得到的？是吃的子孙饭卖的子孙田吗？是付出高昂的代价才图得一时的温饱吗？有多少是自己的劳动所得，用自己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呢？反革命政变后的统治者们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也不许人民群众提出这些问题，只希望人民群众服下他们炼制的安眠药，乖乖地听话地跟着他们走向黑暗，走向灭亡，因为中国亡了，他们已在国外经营好了自己的安乐窝！

先看农村。广大农民对反革命政变带来的倒行逆施，用一句话概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分田到户是反革命政变后举起的第一把屠刀。土改后，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村走过了改天换地的光辉道路，亿万农民迎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艳阳天。一声令下，“全部分田到户”，把人民公社社员二十几年心血汗水浇灌成的平整、肥沃、一马平川的耕地，切成虾米条，豆腐块；把打倒地主老财分到的、集体购

买的农具、牲畜，全部拆散，归到各家各户；把工农联盟的结晶，战胜旱魔的有力武器——机井，包给村干部个人，然后向农民收取高昂的水费；把成社以来多少个冬春季节开挖修整的沟渠塘坝全都破坏殆尽；把集体的森林树木、山竹草坡，到处乱砍乱伐，拉到个人家中。一句话，一切私有化。连剩下躯壳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也嫌碍手碍脚碍眼，不能和旧社会接轨，必须改成国民党时代的乡、镇、村，小组。什么合作医疗，什么养老院、幸福院，什么大队办的小学、中学，什么民兵组织，什么群众专政的治安治保，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革命体制，统统诬蔑为极“左”产物，或解散，或归个人所有。每个贫下中农面对着这一切“屠杀”似的改革，都痛苦得心酸落泪。

再看工矿企业，先是用发奖金，发福利等物质刺激的手段，把广大职工引向福利主义，“一切向钱看”，从而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武装；随后，砸烂社会主义的铁饭碗，让广大工人整天战战兢兢，朝不保夕，为养家糊口焦虑劳碌；最后给工矿企业实行动手术的三部曲：第一步实行厂长负责制，把工矿企业交到厂长经理个人手中。第二步实行股份制，掏尽职工群众的腰包钱袋，让工矿企业成了私人产业，把职工的命运掌握到公司经理手中。第三步，明目张胆私有化，半卖半送，将工矿企业拱手交给私人老板，工人成了名符其实的打工仔，雇佣工，陷入了下岗失业的痛苦深渊。

面对如此惨痛的巨变，目睹了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牛马不如的境地，八十四岁的著名作家W老气愤地写道：我一生经历了两件事，一

件是旧中国变成新中国，一件是新中国变成旧中国。

反革命政变后二十多年，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满目忧患：

1、到 2001 年，国有净资产还只剩下 9,882 亿人民币，各种负债总计 162,826 亿人民币，两者相抵，净负债 152,944 亿人民币，全国人民平均每人负债 11,765 元人民币。

2、经过“走私潮、贩毒潮”，“承包制、双轨制”，“土地和股票投机热”，“卖土地、卖企业”四轮致富高潮，在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公有财富大转移，养肥了近 1000 万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3、全中国已无一方净土（除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极少数地方外），几千万大大小小的官吏，已经是无官不贪，无官不沾，无官不大吃大喝人民的血汗，官场腐败到极至，“赌、毒、黄、淫”遍及各个角落。

4、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已不是什么一般的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社会上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人群同社会上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人群相比，2000 年基尼系数已达 0.458，超过了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严重的阶级对立，使官僚垄断买办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形同水火，到处有揭竿而起的斗争烈火，万恶的统治阶级已坐在随时喷发的火山口上。

5、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已蜕变为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是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党，它代表的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它的政权性质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它实行的统治是法西斯统治，它的政权机构是独断专行的寡头政治，它维护的国家是警察国家。保留共产党的躯壳，一是做贼心虚，二是为了继续蒙骗迷幻善良

的人民，因为共产党的老本还没有吃完，共产党的组织机构还有可以利用之处。尽管这个共产党是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已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水火不能相容，但反革命政变后的统治者还是要“挂羊头卖狗肉，既要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6、在国际上，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统治者已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割的小绵羊。“银河号”事件、印尼反华暴行、五·八炸大使馆、四·一撞中国飞机、总统专机被美国安装了窃听器、台独的升级、对台军售问题、钓鱼台事件、中越中俄中哈划界工作、对中东问题、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对伊拉克问题的态度、……，一桩桩一件件，都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都表现出反革命政变后的统治者对国内血腥镇压，对外则屈膝投降于帝国主义反动派，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这是叛徒嘴脸的真实暴露。

7、在反革命政变后的运河地区，情况怎么样呢？从以下当地民谣可窥一斑：“太白楼上向北看，满眼都是贪污犯；太白楼上向南看，下岗工人一片片；太白楼上向西看，工矿企业都破产；太白楼上向东看，大小业主一串串。”“运河官员年年换，换来换去搞妓院——蛤蟆生老鼠，一辈不如一辈。”（说明：①太白楼是运河旧城区的最高点，自古就有登楼远眺的作用。②如今运河城区的布局是：城北是党政机关所在地；城南多贫苦的劳动人民，下岗失业的工人无所事事，整天在太白楼南、老运河边游荡；城西，解放后建设了很多工矿企业；城东，是所谓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叫新开发区，中外私人资本麇集于此，

收敛运河的财富。③运河的官员频繁更换，大多在当地捞一把，然后调到省里高升重用。他们为了广开财路，竟允许乱开发廊、美容厅、洗头洗脚店，搞色情服务，不少街道平均十几米就是一个，这些暗妓的收入，大多以各种名目流入当官的腰包。）

总之，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政变后统治下的运河地区，已变得荆棘遍地，疮痍密布。政变后的统治者崇洋媚外，入主出奴，在中华大地上，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培植和养肥了官僚垄断集团和大大小小的新生资产阶级。如今的中国，如今的运河，布满了剥削和压迫的网络，已经演出并将继续演出一幕幕人间丑剧、惨剧。

三、运河的抗争

运河地区，这块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激烈战场。运河人民自古以来更有着不甘忍受剥削、压迫，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在奴隶社会，有春秋末年鲁国一带“盗”跖领导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严厉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不息”。在封建社会，有战国时期平陆（汶上）人民大量逃亡、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有西汉时转战苏鲁一带，由苏令领导的山阳（金乡）铁官徒起义；有北魏时期爆发于曲阜的王伯恭起义。在全国反隋的浪潮中，檀乡（兖州）人董次仲、徐圆朗部战斗最勇敢。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宋江起义和红袄军起义都曾在运河一带英勇作战。元末红巾军多次控制运河运河码头，攻克运河城。明末徐鸿儒起义转战于邹县、曲阜一带；起义军的丁惟岳、张尧中等转战于兖州一带。嘉祥满洞的宫文彩反明抗清，自称“擎天王”。清朝初年，

王伦起义时，在临清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乌三娘是出生在兖州的一位卖艺女子。

鸦片战争后，运河人民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踊跃加入捻军、幅军、邹教军及义和团、大刀会，以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前仆后继反抗中外统治者的壮丽篇章。“五四”运动时，曲阜、运河等县的青年学生英勇投入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运河地区民主革命崭新的一页。1926年曲阜省二师建立了运河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开始了党领导革命的新时期。抗战一开始，嘉祥县的刘星等共产党人便举行了永安寺起义，建立了抗日政权，率领人民抗击日寇。活跃在微山一带的微湖支队是抗日战争中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后盾，对日寇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泗水人民在戈山厂与日寇的一次激战更是英勇悲壮。解放战争中，运河人民与国民党还乡团和蒋匪军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出动大批民工，硬是用木轮车推出了运河的解放，支援了渡江战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运河人民艰苦奋斗，英勇前进，英雄模范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其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就出生在运河地区的金乡县。特别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运河人民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五十年代有刘少奇路线砍不倒的全省最早成立的光明农业社，有人民公社的一面红旗——鲍沟公社，有集体经济的标兵——沙土大队。在六十年代，有战天斗地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陈庄大队，有学大庆的

带头人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没有硝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河人民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冲杀资反路线，批判党内走资派，反击二月逆流，声讨林彪集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哪一次不是冲锋陷阵！经过反复的阶级斗争，运河人民百炼成钢，成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有较高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省全国都有着响当当的革命声誉。

现在，英明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党中央又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这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震撼着运河人民，也考验着运河人民。新的阶级大搏斗残酷地摆在运河人民面前。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清楚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以 B、D 为首的运河地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紧跟北京的反革命政变者，恶狠狠地向革命造反派举起屠刀。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造反革命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用对待恶霸地主和蒋介石匪帮的手段迫害广大革命干群。他们办的学习班就是阎王殿、黑地狱；他们大喇叭广播的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他们大会小会进行煽动：“有仇的说仇，有冤的诉冤。”“要象打黄世仁、南霸天一样来进行清查斗争。”；他们给革命造反派制造了莫须有的罪状，罗织了“三皮虎”的罪名——政治的、经济的、作风的。

善良的运河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人民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卑鄙可耻。

当运河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的时候，运河县人民医院的革命

职工，最先想到用向党中央写信的方式，表达对恩人毛主席的哀思，表达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封信，虽然被政变的刽子手们称为效忠信，写信的人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光明磊落，始终没有低下高昂的头，始终认为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向离开了革命人民的亲人毛主席写信表决心，是革命造反派的本份，虽有法西斯的屠刀放在脖子上，仍然面不改色，英勇不屈。

当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运河的时候，中共“十大”中央委员，运河电机厂工人张××立即发表谈话：“我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能参加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开天辟地没有的事，这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会实现。毛主席给了我这份权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了我这份权力。想不到主席尸骨未寒，反对毛主席的人就发动政变篡夺政权，这还有什么公道可言？你们如果有道理，为什么不召集中央委员开会，让我这个工人委员也听听你们的谬论，让我也有发言的机会。你们不敢，你们心虚理亏，你们这样做比法西斯还霸道。”当然，这席话招来的是杀身之祸——比死还难受百倍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残酷折磨。

兖州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是位老党员，全家都是为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人、干部、军人。就是因为他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母、兄弟、亲戚都受到株连，本人被非法开除党籍。他是在隔离学习班听到反革命政变的正式消息的。当然传达者是兴高采烈宣读逮捕“四人帮”的文件，而他听后却心如刀绞，立即挥笔

写下四句诗：“政变屠刀裂长空，万千人民苦无穷。人间自有正义在，尔曹难挡水向东！”

一位农机站站长因为反对反革命政变，身陷囹圄，并被栽脏诬告，摧残得苦不堪言，被逼得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他生前含着血泪写下五绝一首，以明心志：“悲中听枪声，我哭豺狼醒。挥泪祭领袖，昂首踏征程。”

曲阜县陈庄大队的陈以梅，是位钢筋铁骨的农民英雄，在五十年代就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曾高度评价陈以梅狠抓阶级斗争，带领广大社员发展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模范事迹，并题词：“搞农业，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以梅一直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时，陈以梅被党中央邀请参加座谈会，与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交谈，受到中央领导人的赞扬，所以运河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健康发展，与陈以梅有极大关系。当听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陈以梅气愤极了，逢人就骂，遇人就讲。好心人劝他注意点，别让当局听到。陈以梅正气凛然地说：“为了捍卫毛主席他人家的革命路线，我就拼上这把老骨头。”反革命政变者很快下令逮捕了陈以梅。在狱中，陈以梅宁死不屈，严词怒骂当权者，把审判他的人驳得哑口无言。反革命专政机关恼羞成怒，每天都给他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有病也不让治。最后判处陈以梅死刑，后来实在拿不出任何罪证，又改判无期徒刑。七十多岁的陈以梅已经被疾病，被酷刑折磨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夙愿，把生

命献给了伟大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给了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陈以梅逝世后，陈庄大队的贫下中农痛苦流涕，运河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肃然起敬，善良的运河人到处传诵。陈以梅永远活在运河地区革命人民心中。（陈以梅的备查资料：1956年1月毛主席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曲阜陈家庄农村合作社批示为“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在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了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他的学生樊迟向他问起从事农业生产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也办起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同样是那样贫穷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965年陈永贵到运河，与陈以梅交流办社会主义农业的经验。）

运河地区各中学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学生，这时虽然已分散到工厂、农村、城市，但他们听到反革命政变消息之后，不怕被当局盯梢，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秘密聚集在一起开会，个个义愤填膺，怒斥政变者是千古罪人，是斩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刽子手。一位老三届的学生还把他写的一首诗在会上朗诵：“秋雨秋风悲哀凝，今年月圆人无情。漫天思念弥环宇，马恩列毛一体同。白花黑带尚无痕，又闻屠枪向天鸣。江张铁骨世人仰，沉默怒斥皆雷惊！”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的运河，逐渐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

多少人在被隔离审查？有多少人进了全日制、半日制，各种名堂的讲清楚学习班？有多少人被拘禁、被逮捕、被判刑？有多少人被游街，被拉到运河地区十二县市巡回批斗？有多少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背乡离井，去当“盲流”？谁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时，如邓小平自称的还乡团一样，见了革命造反派就杀气腾腾，知道谁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了走资派的反，就成了“跳高分子”，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得牙痒痒，就要对他进行打击，进行报复，就要对他进行算账。所以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无一幸免，没有一个逃过这场反革命政变带来的大清查大报复的劫难。出门在外，言谈话语，人际交往，都忌谈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更不敢说自己造过反，因为所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言论、思想都成了罪恶，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浩劫。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前朝人民含悲恨。”

地方上是这样，运河地区的部队也处在血腥的清洗之中。上自运河军区副司令，各县武装部长，下至一般战士，只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支过左的，造过反的，都成了清查对象。例如滕县武装部副部长、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张××，因为支持滕县的革命造反派，就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运河地区各县市及滕县各公社轮番批斗，最后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开除军籍，遣送回山西省原籍劳动改造。还有支左模范，六一八九部队的一位连长王××，也以“四人帮”的小走卒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山东文登老家，最

后又逼得跑到东北当了“盲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无论地方和部队，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的党，提的干，反革命政变者一律不予承认，好像中国共产党没有开过“九大”“十大”一样，又好像中国共产党没有领导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整党运动一样。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听到“九大”“十大”，一听文化大革命，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一心想把 1966～1976 年这段毛泽东时代最辉煌的历史从党史中，从国史中彻底剜掉，才能解心头之恨。

{据 2000 年运河地区官方公布的材料统计，1976 年“10、6”反革命政变后，运河地区一级就组织了 2480 余次大型控诉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对 311 名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干群进行了轮番批判，对其中 3 人分别判了死缓和无期徒刑；6 人开除党籍；8 名地区干部撤职、16 名免职；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 51 人；责令检查交代问题的 93 人。同时，运河地区还对高校记录在案的 27 名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进行迫害。在排查所谓“三种人”（“三种人”是对革命造反派干群的污蔑，把他们说成是：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时，运河地区一级有 812 人受到清查，立案的 111 人，定为“三种人”的 6 人，严重错误的 65 人，一般错误的 40 人。

而运河地区所辖各县区的情况更加严重。在一本所谓《运河拨乱反正》（1999 年出版）的书中供认，反革命政变后县级被批斗审查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其中运河城区有 235 人被列为重点，曲阜县有 68 人，定为骨干分子 2 人，严重错误 3 人，泗水县 64 人，邹县

75 人，鱼台 12 人。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大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大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苦的大会、小会，更是层层开、级级开。仅有 30 多万人的鱼台县就开了 1.4 万多场，6 万多人被逼着发言；泗水县万人以上大会 33 次，中小型的会 5300 余次，金乡县大型的会 300 余次。}

“十·六”反革命政之后，一些人对于革命造反派的迫害，再次证明了那些为了捍卫个人或集团权力和利益的所谓革命者，是何等的肤浅、无知和可怜！再次彻底暴露了他们当年参加革命的可耻、龌龊、自私自利的目的！党内走资派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目的，就是为了整肃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队伍。而控诉文革、仇视革命造反派的人，无疑成了复辟狂的帮凶。一旦这些人不继续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被弃之如履。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运河地区革命人民不会忘记十年文革的光辉历史，不会忘记大救星毛泽东。每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纪念日，每年的九月九日毛主席的忌辰，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的诞辰，运河的一部分革命同志都自发地组织起来，采用聚会的形式，到运河市中心毛主席塑像前，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进行演说，写出诗文，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讴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的伟大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文件，毛主席像章，毛主席画像，革命造反派油印的传单，都珍藏起来，躲过政变者一次次大搜交的反革命行动，像传家宝一样，向知心的同志和战友展示，向子女进行教育，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火种，保存下来，传递下去。

运河抗争的主力军仍然是工农劳苦大众。反革命政变后的神州大地阴霾密布，群魔乱舞。被揪斗的党内走资派成了英雄好汉，被批判的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成了有功之臣，封、资、修的破烂货成了主流理论，牛鬼蛇神成了各种舞台的主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抛到九霄云外，毛泽东被丑化成“暴君”，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了“罪恶”，成了“浩劫”，成了“极左”。这样，人们一下子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泥坑。什么“革命信仰”，什么“集体主义”，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一心为公”，什么“努力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全成了过时的东西，都被践踏在脚下。劳苦大众在想：我们拼死拼活、流血牺牲为了什么？我们在生产队劳动、在工厂生产又为了什么？处于迷茫中的人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抗争，那就是“消极怠工”。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〇年是运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采用“懒、散、软”方法进行斗争的时期。所谓“懒”，就是只出工不干活、磨时间、熬工分；所谓“散”，就是人心散，再也凝聚不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集体主义精神；所谓“软”，就是领导班子软，积极分子软，他们再也挺不直腰杆去与阶级敌人斗，与坏人坏事斗，与资本主义倾向斗。因为地、富、反、坏、右统统摘掉帽子成了大红人，党内走资派都加官晋爵，坏人坏事没有了标准，资本主义的发家致富成了上级的号召。没有了真理，没有了信仰，还斗什么？还干什么？只剩下一条路：各人顾各人，走自私自利的道路。

其实，运河地区这个时期的工矿企业中广大工人也是这样的情况。

劳苦大众的这种抗争,认为解了气,发泄了对反革命政变者的不满。而这恰恰又被党内走资派抓住了口实:“大锅饭养懒汉”,必须砸烂铁饭碗,必须发展封建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殖民地经济。

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都知道,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根本不存在“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真正出现“大锅饭养懒汉”现象是 1976 年十月反革命政变后,也就是劳苦大众消极抗争的时期。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值得人们研究和深思的课题。

四、革命大批判悄然兴起

毛主席在《致江青同志信》中教导我们:“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那时”已经变为现实,利用枪杆子发动宫廷反革命政变的党内走资派,从一开始就陷入人民群众革命大批判的汪洋大海。

先看政变上台的官僚特权阶层内部分化和恶劣表演。华国锋的最先出局已不屑一提,1978 年邓小平正式上台后的情况,有一个批判材料写得非常清楚。只不过这个材料中的“左派”,虽有不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观点,但基本上还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代表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益的刘、邓路线的左翼,他们向往的是建立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他们曾经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中的右派则是刘、邓路线的右翼,他们维持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个过渡,最终是为了补资本主义课,复辟资本主义,发展官僚买办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中国上空还响着“共产党领导”的

口号，还飘扬着代表社会主义中国的五星红旗，这两派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并且总以所谓左派的妥协和右派的让步，取得暂时的平静。不过，这与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所进行的斗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与马、列、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目标相差甚远。

这个批判材料写道：

他（邓小平——抄者注）首先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抄者注），剥夺了群众的民主权力，继而又对老干部下手。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虽然对文化大革命有意见，但其主流仍然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认识到，靠这批老干部并不能顺利地推行他的路线，必须进行干部队伍大调整。为此，邓小平老谋深算，没有顺理成章地去当党的主席，而是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并借设立中顾委，迫使其他元老们退出政治舞台。与此同时，从上到下猛提年轻干部，以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名清洗工农感情深厚的老干部。这一刀切带来了干部队伍马列主义整体水准严重下降，党的优良作风失传。年轻干部平步轻云，根底不深，对邓小平感恩戴德，很自然地成了邓小平以改革开放名义实施资本主义复辟的驯服工具。

从组织上巩固了地位之后，邓小平全力推行自己的主张。但邓知道，改变中国这条社会主义大船的前进方向，是充满危险的，搞不好就会翻船，因此他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路线。他既讲改革开放，又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似乎照顾到了各种利益的平衡。但两点论中有重点，改革开放是重点，是核心，是方向，四项基本原则是辅助，

是外围，是牵制和平衡。也就是说，一手硬，一手软，一手实，一手虚，正是邓设计师的用心所在。

邓小平这一套手法很具有迷惑性。对于右派来说，他们相信邓小平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是以复辟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对于左派来说，他们相信引进资本主义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于是，在经济理论上出现了大量模棱两可的过渡性语言，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左派高兴的是社会主义，右派高兴的是中国特色，可以把资本主义当特色引进中国；又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左派高兴的是公有制仍然为主体，右派的重心却落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最终壮大私营经济，摆脱补充地位，消灭公有制；再如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左派高兴的是计划经济字样还在前头，右派却强调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直到取消计划经济；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左派觉得安慰的是社会主义字样还存在，而右派却到处讲市场机制要起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国家要退出市场，裁判员不能上场踢球，从而摆脱社会主义；更如国有企业股份化，左派被告知，股份化中，国家仍然占大头，仍然能保持控制权，右派却奔走相告实现了私有化。这样，左右两派就免不了经常交锋，经常打一般人看不懂的笔仗。右派觉得速度太慢，左派担心不断被抛弃的社会主义原则还能不能恢复。

然而，形势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了邓的想象。改革带来了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左派的压力迫使邓不得不舍车保帅，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被邓逼下了台，江泽民被推为新宠儿。邓小平看中江泽民的并不是他在上海如何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而是此人有政客作风，善

于见风使舵，又好名利，可以控制。相比之下，陈云识人的水平就稍逊一筹，被江泽民的表面文章所迷惑，于是江泽民成了左右两股政治力量共同认可的人物。但无论如何，江泽民是靠“六·四”镇压上台的。“六·四”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是向往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和反腐败的社会主义力量的一种奇特结合。此后不久，又发生了苏联垮台的严重事件，引起了老干部们的普遍震惊。到 80 年代末期，曾经支持邓小平复出的老帅们，如陈云、叶剑英、王震、李先念、彭真等，都认为邓小平已经走得太远。这样，江泽民一上台，就迎合暂时占了上风的以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的口味，大讲反和平演变，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六·四”事件后形势的发展使得邓深感不安，他看到自己不仅政治处于下风，经济改革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八十年代后期，赵紫阳采取的是“体制外包围体制内”的战略，即培植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来包围，消灭国有企业。所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突出体现了这一战略的存在。但是，到九十年代初期，体制外经济力量仍然不成气候，难以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因此，邓害怕了。他怕改革开放的核心地位被动摇，更怕这条路线遭到清算。邓小平是个敢冒险的人。他认准虽然反对他的老干部人数不少，但没有谁敢出面同他对垒。于是才有 1992 年春，邓小平在杨家将的护卫下南巡，亮出底牌，公开声称就是要搞资本主义，而且不许争论，就得照他的路线干到底，迫使支持江泽民的左派力量屈服。最终，老帅们和邓小平达成妥协，江李体制不变，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写入党章，彻底放弃计划体制，大规模引进外资，减让关税，借助跨国垄断资本来打垮国有经济，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地位。这一仗，左派保住了风派的江李体制，而右派在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经济力量和阶级基础上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由于有这一段故事，党内左派曾一度对江泽民寄予希望。不料，江泽民反和平演变乃是政治压力下的做秀。现在看来，江泽民在骨子里是个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意识形态上是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崇拜者，政治上是墙头草随风倒。邓小平长寿，反对邓的老师们纷纷死在邓之前。邓死时，党内左派政治力量已经大大减弱，而邓南巡后又亲自扶植起一大批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绝大多数都与党的省部级以上领导有密切关系，故右翼力量大大增强。这时候，江泽民看清形势，急向右转。十五大前夕，面对左派的几份万言书，江泽民叫嚣“我自巍然不动”，露出他中山狼的真面目。在政局上，能够约束江的左右两派元老都不复存在，江感到羽翼丰满，他开始排斥异己，伙同亲信，网罗党羽，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他的三部曲是，第一，把党和国家的一切实权全部抓到他一人手里，架空中央领导集体。他不准军队干部进政治局常委，以便他一人掌握军警大权。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变总理司政为总统制，收夺属于国务院的实权。同时，任用亲信，收夺其他常委分管的组织大权。第二，利用到手的权力培植网罗死党。第三，调动一切舆论工具进行新的造神运动。

“十五”大过后，江在加速私有化的同时，也加快了投靠国际垄断资本的步伐。他不惜一切经济代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接

轨，以挟洋自重，借助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巩固私有化和买办化的成就，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在中国各类企业均不掌握技术、又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加入世贸组织无疑于引狼入室。从此以后，中国彻底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条件，融入了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变成了新式的殖民地资本主义，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原材料基地，初级产品加工地和廉价劳动力库。相应地，政权性质成了彻底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

这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空前激化了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的抗议和斗争遍布全国。在这种严重局势面前，一向迷信权力的江饮鸩止渴，选择了独裁和镇压，从上到下加强“一把手专政”，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政变）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江泽民全面接管中央权力以来，军队不断减少，公安人员却增加到 270 万，而且每年以 30% 的速度递增。武警增加到 80 万，去年又有 4 个军转业成武警。此外，还有 46 万专职保安和更大数量的临时保安。就是军队，江泽民也要求把保护稳定作为第一任务。国家机器的枪口对谁，不是一目了然吗？

就这样，江泽民还不放心。为了堵民之口，江泽民还制定了一系列胜过法西斯的纪律和法规。针对军队离退休干部，出台了军委九条，其中规定老干部不能联名给中央写信，不准接触以前未见过的社会上的人等，将干休所就地变成了软禁所。针对工人农民的上访，规定上访不得超过 5 人，不得越级上访，并到处张贴“严厉打击非法上访”的大标语。针对互联网的兴起，制定了互联网管理规定，查封了大批谈

论时事的著名网站。针对报刊的迎合读者的市场行为，中宣部一天一个报道口径，对于违反口径者，轻则撤办其主编或社长，重则吊销刊号。众所周知，《真理的追求》，《中流》就是被江泽民下令秘密勒令停刊的，至今不敢向世人公布。可怜茫茫神州，只能听到暴力，色情和油盐酱醋的声音，此外就是江泽民一花独放的“三个代表”。

以上这个揭露批判材料是针对政变当局上层的，运河地区革命左派的大批判只能抓住具体观点，阐述看法。下面把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谬论，驳斥政变当局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议，以及响亮地提出“研究毛泽东后期思想”，这几个方面的文章摘录如下。

1、1976年的反革命政变者，为了让全国人民承认他们在血雨腥风中篡夺的政权这个既成了事实，首先抛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谬论。运河农民大学生杨慎听到广播中一再宣传这个谬论，气愤地给家人、给亲朋、给周围的人说：“这是修正主义理论，也就是咱们农村人常说的歪理：成者王侯败者贼。他们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就以为掌握了真理。其实，江青他们才代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才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杨慎又写出多篇短文，驳斥这一谬论。

杨的文章中写道：“真理的检验是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反复，逐步深化提高的整个过程才能完成。光强调实践检验的作用，并作为唯一标准，这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也就

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难道世界上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就不是真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真理，是马克思通过对几千年的阶级社会近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实践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中间有多次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更有列宁、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者的发展完善，还被苏联、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验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建成，就认为不是真理，就需要检验一番。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妄想检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真理；他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非常遥远的事，就是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去发展资本主义。所以说，邓小平一伙反革命政变者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

文章又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是毛主席的教导。什么是社会实践？它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抽去了社会实践含义的实践只能是空洞的实践，是一厢情愿的实践。邓小平一伙反革命政变者，就是一厢情愿，从一己之私出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实践，进行实践。所以经他们检验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一场浩劫；社会主义是渺茫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只有他们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世界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恶霸的美国富有，才是真理，才值得效仿。所以他们醉心于搞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中国，把毛泽东时代糟蹋得一无是处。”

文章还说：“邓小平一伙政变分子是十足的唯心论者。他们爱说

绝对话，爱做绝对事，只许他们一家，不许别人跟他们争论。‘唯一标准论’就是他们资产阶级学阀作风的表现。哪有什么唯一的标准？标准都是相对的。‘唯一标准’论者连资产阶级学者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没有，只能是封、资、修的大杂烩。”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反革命政变者的理论支柱之一。此论一出，全国哗然。运河地区一位中学教师邢之卓撰文予以深刻批判。

邢之卓的文章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一个，只有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就是贬低劳动者的作用。其罪恶用心是为了让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资产阶级分子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成为新生的资本家，而广大劳动人民则理所应当地沦为奴隶。他们把受欺压、受剥削、受奴役的原因归结到没有科学技术，完全抽掉了阶级内容，是十足的混蛋逻辑。”“宣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严重后果和必然逻辑是：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制度就越先进。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中国就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反革命政变者又找到一条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

文章说：“正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引导下，高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破旗，把社会的一切发展都归功于科学技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要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科学技术成了追逐最大个人利润的资本，形成‘一切向钱看，人人围着科学技术转’，把人们推向利己主义和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深渊。”“争相引进外资，拜倒在垄断了科

学技术的外国资本家的脚下，是反革命政变者必然的发展道路。他们做洋奴，当买办，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殖民地，都是打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招牌进行的。”“反革命政变者集新老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大成，视真正第一生产力的广大劳动人民为群氓，是两条腿会说话的工具，是不能掌握科学技术的下等人，是低贱无能的社会发展的累赘。在农村，或者把他们圈在两亩三分地上当牛作马，或者逼迫他们到城里拼苦力做下贱事，出卖精神、力气和肉体；在城市，或者把他们变成新时代的包身工，或者把他们赶出工矿企业的大门，沦落到下岗失业的悲惨境地。一句话，在反革命政变者统治下的中国，劳力者成了最卑贱的人，成了衣食无着任人宰割的奴隶。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没有所谓科学技术的专利，成不了第一生产力，连第二生产力也不是，只能是第三、第四生产力。这是历史的大颠倒。”

3、在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重提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那是会坐牢、死刑、“株连九族”的。但运河地区就有人敢于挑战反动政权，写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粗浅看法》的长篇文章。

文章首先引用了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毛主席病重期间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的谈话。毛主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

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是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文章大声疾呼，中国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正如打倒蒋介石一样，是成功的。至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的发展变化，那是反革命政变造成的，那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被颠覆。如果有一天蒋介石的徒子徒孙重新占领了北京，那也不能说毛主席领导的打倒蒋介石的革命工作没有成功。毛主席的预言“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是血雨腥风了。”已经变为残酷的现实，我们就经历了“血雨腥风”，今后仍将处于“血雨腥风”中，直到把毛主席临终交待的两件事，特别是后一件事，彻底完成，才能结束“血雨腥风。”

这篇文章主要是批驳反革命政变分子搞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个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决议》，谬论百出，颠倒了事实，混淆了黑白，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自供状。

文章以雄辩的事实，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逐条逐句驳斥了《决议》中的反革命观点。文章提出：“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也符合中国实际。”“二、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既有当时的经济基础，又有当时的政治基础。”“三、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否定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十七年的建设成就，也没有把大多数干部、大多数知识分子通通打倒进行迫害。”“四、文化大革命不是迷

误，而是历史的必然。”在这部分中，文章把《决议》中强加给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迷误”的谬论，批驳得淋漓尽致。

文章响亮而严正地提出，必须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名”，否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何况，反革命政变后的社会现实，已经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变成了“正确”，“动乱”变成“必要”，“祸国殃民”也成了“莫须有。”

文章把一个异常严峻的课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你要热爱和拥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你就应该热爱和拥护毛主席一生事业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成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要深恶痛绝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你就应该放喉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4、针对反革命政变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铁的事实，运河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张效芝，发表研究文章《关于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从理论高度批判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文章首先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在中华文明古都北京的宫廷政变，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是现代文明、现代民主的反动。这完全是一次反革命的政变。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特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次政变后进行的所谓改革，就是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东西革除掉，代之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是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成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把共产主义大目标改革成资产阶级的小康社会。它的开放是为它的改革服务的。单以政治思想、文学艺术而言，一切有利于它的改革的东西都引进，都大开绿灯，一

切不利于它的改革的东西，都闭关封锁，任意扼杀，例如，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不论政治的、经济的，都拒之门外，甚至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进行歪曲和丑化报道。再例如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对国际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就从来不正面向国人透露半点风声。相反地，却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敞开大门，一切反动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象洪水一样涌进中国。所以，反革命政变者的开放与它的改革一样，具有强烈鲜明的阶级性。

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后台老板邓小平，一贯标榜自己不搞阶级斗争，这纯属骗人的鬼话。他散布这个烟幕弹的真正原因和目的，就是反对和害怕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反对和惧怕毛泽东的后期革命思想。

毛主席晚年多次讲：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章说：“毛泽东的后期思想有这么几个要点：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还存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除了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之外，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除了在一般群众中会产生，更重要的是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产生，随后发展变化，就形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二是无产阶级要想继续革命，就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就必须打倒资产阶级，打倒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党内走资派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的革命者，后来蜕化变质而形成的。这些当年的革命者是如何一步步走

上走资派的道路的？主要是这部分革命者的私心私欲作祟。当年只是怀着简单的朴素的阶级要求，民族希望，走上了救国救民打天下的道路，只想着胜利后能够分享胜利的果实，而没有考虑胜利后还应该怎么办、共产主义大目标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思想境界没能升华到共产主义的高度。正因为如此，在战争年代，就表现为山头主义、机会主义，在革命胜利后就开始讲功劳，争级别，要求高工资，把所领导的单位看成自己的私人地盘，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把本来就很模糊的共产主义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整天热衷于权力的追逐，名和利的炫耀，处处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光不去学习和研究，反而对此非常厌倦和反感，从而发生了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这样，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以党内走资派为核心的官僚垄断阶级。资本家是用资本剥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他们则利用权力进行着同样的剥削。这个官僚垄断阶级的头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象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革命造反派一样。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阶级路线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大民主运动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其他任何革命，它完全是群众革命，这个群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阶级。所以，它要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当广大群众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它的一切行动都

带有革命的性质，都有合理的成分，都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任何苛求、任何挑剔、任何指责、任何说三道四，不是阶级偏见，就是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糊涂虫，再不然就是要“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同样，在总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时候，有人认为“运动发动得太仓促，事先准备不足；展开以后，又受到个别野心家及少数几个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极左路线的干扰，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错误”，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不仓促”无需多说，“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只是出现的问题和错误，绝没有形成游离于刘少奇、邓小平资反路线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之外的极“左”路线。实际上，这“问题和错误”，仍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派的干扰破坏，只不过假群众之手表现出来而已。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这正如马列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是相得益彰的。

尽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并不整天把民主挂在口头，让群众错把民主当成目的。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只给予那些“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斗争“党内走资派及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破除和打扫“封资修垃圾”、勇猛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一时各派面目无法认清、阶级斗争

不太明朗化的时候，各种代表人物都打着“大民主”的旗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上风的时候，党内走资派使用所谓的“大民主”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只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大民主”，才是真正的大民主，才是搞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大民主，才是革命造反派赖以产生、存在、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第一次无产阶级大革命坚决依靠革命造反派，开展无产阶级大民主，所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四是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象巴黎公社那样的权力机构，要做到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群众专政，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有益的尝试和很好的榜样。

五、要对全体人民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要斗私批修，要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加强人民群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能力，建立和落实巴黎公社原则的运行机制。

六、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必须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要使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必须对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改造、最后消灭；必须加强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最终进入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就是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进行多次，每次间隔不超过十年。”

文章说：“正是在进行第一次战役的时候，也就是进行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革命对象，不是承认错误，‘缴械投降’，而是负隅顽抗。当他们面临着灭顶之灾的时候，就孤注一掷，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而革命营垒中的叛徒就成了他们的帮凶。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轻敌和无知，给了他们成功的机遇。”

文章还说：“反革命政变的成功，得力于军队的支持。而文革值得吸取的教训是太偏重于‘文’的一方面，缺乏‘武’的内容。李德生、陈锡联是‘武’的代表，但他们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培养具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武’的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成功的关键。”

文章提醒人们：“这次血的教训，更加验证了毛泽东后期革命理论的无比科学正确，更加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该马上进行革命的第二步，决不能拖延时日，养虎为患，形成庞大的官僚垄断集团。”

文章最后写道：“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贯彻实行时，具体的方针、政策、策略可能有所变化，但它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革命大批判虽然还一时无法推翻反革命政变所篡夺的政权，但已

从政治上、思想上、意识形态方面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为唤起民众，进行新一轮无产阶级革命传播了火种。

五、人心所向

一九七六年十月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各阶层的人群进了大分化，大改组，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组合。

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接受了革命的大批判，大多数已经认识到错误，并作了认真改正，只要路线正确，他们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现在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他们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有些抵触情绪，但又不敢表露。他们的党性原则很强，理解不理解的都跟着执行，何况政变者还打着党中央的旗号，以毛主席的接班人自居。

只有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很好地认识错误的干部，听到反革命政变的消息是欣喜若狂，大有翻身得解放的感觉。他们脱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伪装，暴露出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不光竭尽全力吹捧歌颂反革命政变，而且积极主动地贯彻执行政变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了名符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

运河地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张呈震和王××

张呈震原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被作为党内走资派进行批斗后，有所认识错误，后来被提拔为运河地委副书记。反革命政变后，张呈震变化极大，懊悔当初承认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大诉文化大革命的苦，

大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疯狂地向革命造反派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张呈震乘改革开放的妖风，大发横财，欺凌百姓，与革命干群形成严重对立，不少人与他公开进行斗争，并向上级告状，揭发批判他的问题。张呈震恼羞成怒，重金收买杀人凶手，残忍地把举报人杀害。由于公安司法机关的腐败，既不走群众的路线，又竭力包庇当官的，根本不认真侦破这个骇人听闻的杀人凶案，致使张呈震不光逍遥法外，还飞黄腾达，被上级赏识，从运河地区提拔到山东省工作。这个恶性案件拖延了十几年，直到张呈震死去两年，凶手又犯案被捉，才供出张呈震当年买凶杀人、作恶多端的真像。此事在《齐鲁晚报》披露后，引起山东人民，特别是运河地区人民的极大愤慨。

王××，原运河地区运河市委书记，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镇压运河市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在运动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跳出来向革命造反派反扑，一有机会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革命政变后，王××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立即得到提拔重用，从运河调到济南，成了山东省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并不满足于当官所获得的个人利益，认为做一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不如直接成为腰缠万贯的资本家爽快。所以他要求提前退休，利用当政时结下的关系网络，下海经商，很快暴富，成了山东省首批大富翁。消息传到运河，人们都恨得咬牙切齿地说：“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搞资本主义复辟就需要这样的坏蛋。”即使原先受王××蒙蔽的群众也后悔地说：“怎么当初就没有看出来他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张呈震、王××一类人物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出去，是历史的必然，

是反革命政变引起的恶果。这样的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鞭策教育下，夹着尾巴做人，有可能变好，但在错误路线蛊惑下，劣性大发，只能越变越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些反面教育的作用，就是使人民猛醒，认清反革命政变后所执行的刘、邓路线的反动本质，从而更加怀念毛主席，怀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怀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运河地区绝大多数的老干部对反革命政变后的倒行逆施表示极大愤慨，但又悲叹无能为力。对于革命左派的书籍、报刊、文章他们是积极的阅读者、宣传者。A 是他们突出的代表者。

文化大革命前地委常委 A，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革命干部代表结合进运河地区革命委员会，担任第一副主任、主任的职务，为运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党内走资派把 A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反革命政变后立即对他进行批斗，让他交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问题。A 大义凛然，面对复辟的跳梁小丑，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斗争，保护了大批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和群众。

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岁月，A 不断跟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说：“要沉住气，好好保护自己，等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定会翻过来，决不是邓小平他们说否定就否定得了的。”

A 离休后常住济南市，运河的革命同志每次到他那里去都热情接待，和大家畅谈国内外形势。

A 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台一定得卖国，一定得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否则他们一天也混不下去，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分析

透了，他们正一步一步这样走。”

A 最早告诉运河的同志：“华国锋绝不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也是假的，如果华国锋真搞‘两个凡是’，就不会抓‘四人帮’了”。他又说：“毛主席晚年根本没有确定接班人，因为毛主席晚年认识到确定接班人的做法还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是正确路线，而不是一两个接班人。在正确路线引导下自然会推选出好的革命接班人。当然，毛主席这样做，有利也有弊，是英明的远见也给革命造成暂时的失误。”

A 还说告诉运河的同志：“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当政者还假借共产党的招牌，势必会把全国卷入说假话做假事，一切都造假的漩涡中。因为统治者带了头，底下的人能不都效仿吗？假共产党吃真共产党的老本，看似得意，其实后患无穷，最后会自己给自己掘下坟墓。”

A 对今后革命的看法是“决不能改良”。一是改良的路走不通，二是改良之后仍是重建官僚特权政治，这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A 还把他写的笃志诗让运河的同志传阅：“进了养老所，还有几天活。”“蓬头过闹市，白眼看达客”。“桌上一壶酒，醉倒醒方觉。舒服仰天啸，心事和泪说：疾风惊草木，弱苗多被折；荔萝侵垅亩，恶蔓欺稼禾。守我磐石志，天塌亦不舍。亡君不易君，亡国不易国。我君毛泽东，我国是中国。瑶琴变音不更弦，锦车难行不易辙”。

A 写了大量诗文寄给革命刊物，呼吁全国人民不要放下革命的思想武器。他自费订阅了《中流》、《天人古今》、《真理的追求》等

左派杂志，每种都十几份，送给自己的战友和同志阅读，到处洒下革命的火种。A 不愧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陶冶下获得新生的老干部的代表。

在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起来造反的人群，经过政变后的残酷压迫和反动统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革命造反派一直得不到各级官僚集团的支持，政治和经济地位又比较低，显得势单力薄，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全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精神支持，以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的骨干分子支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后盾，才争取到一九七六年春夏的大好局面。现在，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世了，毛泽东思想又被贬得一钱不值，反革命政变者的斗争矛头气势汹汹地对准革命造反派，他们的分化就是难免的了。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在分化，现在是更加明显和严重。虽然在反革命政变后所有的革命造反派都打入了另册，但当局为了统治的需要，对革命造反派也作了一些区别对待。这使一部分有各种关系的革命造反派首先当了俘虏，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另有一些革命造反派看到政治上无法上升，就一心搞经济活动和业务活动，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改变了生活条件，触动了思想变化。最可怜的是相当数量的革命造反派，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的熬煎。

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整个革命造反派中已分化出一部分最可悲的人。他们忏悔，他们埋怨，他们到处宣泄对毛泽东的不满，公开声称，革命造反是上了毛泽东的当，把自己不幸遭遇的账错误地记在毛泽东

身上。他们的觉悟和认识已远远低于当年保守派群众的水平，完全暴露了他们为“私”造反的可耻思想。虽然这样的人是少数，但他们丢了革命造反派的脸，他们绝对不能代表革命造反派，只能是革命造反派中的败类。绝大多数革命造反派都有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其中一些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还在不懈地苦斗。但是，不论有正确认识的也罢，继续坚持苦斗的也罢，他们头上都带着紧箍咒，严密地控制在反革命政变后的统治者所雇用的专政机关的视野之中，无法越雷池一步。

相反的，一些老干部，少数新老知识分子，开始从反革命政变后的法西斯统治下冲杀出来，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给铁幕下的中国带来了希望。这些人今后将会和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优秀的革命造反派结合在一起，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旗帜，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新天地。

与政变后的反动统治相抗衡的力量，还来自基层，来自农村。值得一提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和运河地区兖州县的刘××

南街村的存在、发展壮大，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唱了一首赞歌，也成了反革命政变后的统治者一块去不掉的心病。南街村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发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展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政治思想建设的辉煌成就和经济发展的神奇速度，惊世骇俗，雄踞中州大地，连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巧如舌簧的诡辩和铺天盖地的诬蔑，也无法掩盖它所折射出来的理想主义之光。统治者只得哀叹：南街村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

南街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做出了榜样：一是大力巩固、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做到富裕得人人没有一分钱的私人存款；二是分配制度朝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趋同，每年都在减少“按劳分配”的部分，加大“按需分配”的成份；三是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作，对人的思想革命化常抓不懈，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办学习班，已得到普遍的、卓有成效的应用；四是干群一体，能官能民，劳动人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巴黎公社的原则已深入到南街村人民心中。

正因为南街村是与反革命政变后的统治者对着干的，是一束革命的鲜花，是中华大地上的一方净土，所以才招来革命左派的喜爱，成了万众归心的地方。运河地区到南街村参观学习者，已不下数千人，有个人，有集体，有干部，有群众。他们参观归来，拿着学习材料，放着南街村的录像，到处宣传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还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研讨活动，让共产主义不灭的火焰，永远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

刘××是运河地区兖州县的一位农民，他的事迹就是与反革命政变后的统治者推行私有化唱对台戏，他的革命精神就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搞个人发家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运河地区这样的事例很多，反映了人心的向背。不过这些事迹还需要得到支持，还需要提高和升华。

与反革命政变者对着干的一切革命因素，不论以什么形式，不论使用什么方法，不论力量大小，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不论是个

人行为还是组织行动，也不论是文的还是武的，其重要意义都是应该肯定的。现在要重新燃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官僚特权阶级害怕政治运动，是因为每次政治运动都使他们失掉一些权利；一般群众厌烦政治运动，是由于几千年旧传统的影响和安逸生活的诱惑。革命者就是要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没有政治斗争何言革命！

在一九九〇年创刊的《中流》杂志，是公开举起的一面革命旗帜，其他如《天人古今》、《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也都尽了革命大批判的一份职责，反映了反革命政变后二十多年来人心所向。

运河地区除个人订阅这些杂志之外，还办起了“发行站”，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使共产主义的火种又在革命者心中燃烧起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当代著名作家魏巍的讨修檄文《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运河地区革命人民心中引起的巨大反响。

此文一传入运河地区，人们就如获至宝，争相传阅，有的自费复印多份，除散发给身边的同志，还寄送给外地外省远方的亲朋好友。

大家一致认为，此文写得好，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重新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纷纷预言，反革命政变者的末日到了，共产主义事业又有希望了。

该文首先把人们引领到幸福的回忆之中，把列宁和毛泽东先后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壮丽的画面，展现在世人眼前，以无可

置疑的事实，讴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指出：“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挫折和曲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咬住一点缺点和错误不放，喋喋不休，动辄以贬损诬蔑革命为能事，仿佛革命导师反不如他高明，这种人其实不过是‘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罢了”。

文章沉痛地写到二十世纪末期的世界悲剧，说由此“足见现代修正主义影响之深，泛滥之广，欺骗性之大，为害之烈，使历史至少倒退了几十年，使亿万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英雄儿女的鲜血付诸东流了！”

文章接着愤怒地指出现代修正主义的六大特征：“（一）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帜，走的资本主义的路子。”“他们有时甚至只做不说，或者做成再说。他们是从来不说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和目的的，仅仅以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眼前的利益吸引群众，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步一步地把人民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二）在国际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屈膝投降，实行无原则的和平共处。”（三）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只是幌子，搞“全民国家”，“全民党”只是为了麻痹革命人民，实际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四）他们组建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实行的统治是法西斯专政。（五）他们亦步亦趋，追随帝国主义，国际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推行殖民地经济。（六）他们口是心非，口喊依靠人民实际上依靠的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实行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文章用大量篇幅驳斥和批判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补资本主义课”的反动谬论，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生产力决定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也具有相对的决定作用。”并引用毛主席的话：“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然后文章写道：“毛泽东认为，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先造成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使新的生产力充分发展。”这就是有些同志说的：“思想革命领先，制度革命相继，新的生产力充分发展。”

文章的最后以“新世纪展望”为小标题，号召“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一齐对付”帝国主义；呼唤原社会主义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应深切理解，已经尝到社会主义甜头并已成为国家主人，随着他们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的恶化，以及面临的生存的威胁，是不会长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马列主义教育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也必然会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坚强地团结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巍巍这篇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十月反革命政变得逞之后，号召进行一场“没有完结的斗争”的新的里程碑，是颂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命运之歌的最强音。尊敬的巍巍同志，也成了广大无产阶级

革命派（包括山东省运河地区）一面光辉旗帜。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运河地区的命运与全中国的命运一样，必将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下去。

后记

佛家语：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俗话说：旁观者清。

我自认为既不关心政治，对人对事也能做到不偏不倚，清高得很。可是，自从十八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省运河地区，在工作环境中接触的同事、朋友，才使我回落尘埃，面对现实。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人们痛恨现实，追根求源，引出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话题。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我这个文革发生时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外地人，也成了运河地区当年文革中的造反派。随后一发不可自拔，竟萌发了写点东西，讴歌一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就产生了上面这些不像样的文字。

虽然耗时两年多，利用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得到众多亲历文革的朋友的大力支持，查阅了所能见到的流传资料，但是总感到没能写出运河地区文革十年的十之一二。这一点敬请知情者予以原谅。同时，行文出处大多没有注明，只用“文责自负”四个字来向大家交待。

写完之后，又有点后悔。这些文字流传出去，会不会引来杀身之祸，牢狱之灾？好在只是个别人传阅，成不了什么气候，造不出什么影响，当局会手下留情吧！如果有热心者出资印刷，我不得不心存感

激，又予以声明：我不负责。

编者 二 00 二年十二月